

俄羅斯研究

汪道涵 題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苏联形象

- 3 张晓东 / 父与子：后苏联电影中的苏联形象
- 20 张建华 / 《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
- 46 胡腾蛟 / 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俄苏·历史

- 76 郝娜 / 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 95 郝江东 /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 123 邱海燕 /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年）

经济·人口

- 154 伊万·沙拉法诺夫 任群罗 / 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荷兰病”
- 178 顾乐民 / 基于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的俄罗斯人口变化通道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张 昕、王海燕

本期编务：阎德学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年4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5年第2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н Сяодун

Отец и сын: обра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фильмах (3)

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

«Дерсу Узала»: «имидж Китая» 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е в годы конфликта..... (20)

Ху Тэнцзя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ША «образа врага» в лице СССР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46)

Хао На

Почему революция в России смогла произойт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и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76)

Хао Цзяндун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талиным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95)

Цю Хайянь

Оцен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и интерес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китайскими лидерами в принятии решений в политик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21- 1966 гг.) (123)

И.Сарафанов, Жэнь Цюньло

Как справляется Казахстан с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ью”? (154)

Гу Лэминь

Пути изменения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на основе полинома наилучшего приближения Чебышёва..... (178)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5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ng Xiaodong

Father and Son: Soviet Image in Post-Soviet Films (3)

Zhang Jianhua

Dersu Uzala: “China’s Imag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Soviet Films during Conflict Times (20)

Hu Tengjiao

The 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Enemy” Early in Cold War (46)

Hao Na

Why Di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ake Place?---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Perspectives (76)

Hao Jiangdong

Formation of Stalin’s “Dual-Track” China Policy Early after the War (95)

Qiu Haiyan

Balance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Party Interest during Chinese Leaders’ Decision-making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1921-1966) (123)

Ivan Sarafanov, Ren Qunluo

How does Kazakhstan Deal with “Dutch Disease”? (154)

Gu Lemin

Russian Population Change Path based on Chebyshev Approximation (178)

苏联形象

父与子：后苏联电影中的苏联形象

张晓东*

【内容提要】作者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并以后苏联电影中描写父与子代际冲突的代表性作品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影像叙事的分析和解构，来探讨“苏联形象”在后苏联电影中作为一个“想象的能指”，是如何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如何通过“父与子”的叙事，来进行创伤修复，重新塑造“理想的自我”。

【关键词】后苏联电影 苏联形象 父与子 拉康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751.2;J902(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2-0003(17)

一、“父与子”的俄罗斯文本

“弑父”(patricide)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传统母题。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在1897年10月15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他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分析，使用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术语，用来命名“杀父娶母”这种独特的、涉及禁忌与乱伦的意识。^①他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将此公布于众。“俄狄浦斯情结”也被他用来分析陀

* 张晓东，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艺》编辑部副编审，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15年度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6, vol1, p.265.

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著作。有人认为它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有关，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出埃及纪》中的摩西之死。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也接受了摩西是在荒野中被谋杀的假说。^①当然人们更多地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原型来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中的乌拉诺斯娶了自己的母亲，而作为部落首领，他又被儿子克洛诺斯阉割并取代之。俄狄浦斯故事中包含了恋母、阉割焦虑、父权认同等几个内容，这种原罪如同一个烙印、一个诅咒。西方文学艺术中常见的弑父故事，常常是这样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的，并被转换成隐喻的社会性符码。但是弗洛伊德常常过于简单地将文本与欲望嫁接，因而招致质疑与批评。实际上，这个原罪并不是简单的父子相残，其中包括子对父的反抗、父对子的压制、以及子对父由仇视到接纳认同的角色转换，更是包含着意识形态的秘密。而这个复杂文本的生成过程，只有到了拉康（Jaques Lacan），才能够以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揭示出来。

拉康是将“父亲”作为一个功能来理解的。众所周知，拉康把主体的形成过程分为镜像阶段与俄狄浦斯阶段。婴儿通过镜像获得了幻觉的“完美自我”的理想认知，而在俄狄浦斯阶段，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实际上是由他与周围主体的关系形成的，例如父亲的存在，因此是他必须接纳的。这种接纳带有压抑的特性，必然造成原来那个主体的分裂，“欲望的能指”也就从想象界滑动到象征界，继而到真实界。拉康理解的阳具，只是一种超现实存在的象征，是带有悖论性质的：既是欲望的不可满足，又是欲望的无尽追求。他所理解的“父亲”，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符码。他把所有的“无意识”都看作是一种语言结构。拉康的理论，同样为我们有效解读俄罗斯文本提供了支撑。本文的目的，就是以后苏联电影文本对父子冲突的书写为对象，分析子辈对父辈所代表的价值秩序的反抗、控诉与认同，以及父亲形象作为苏联时代的符号，其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秘密。

在进入后苏联电影文本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俄罗斯文学中的父子冲突。在俄罗斯文学中，父与子两代人的代际关系总是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而且，这种冲突往往就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交锋。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对于俄国青年来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们的“理想之我”被羞辱，需要找到

① 参见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出口。因此农奴制度、沙皇专制被年轻一代看作是父辈一代不可饶恕的原罪，因而要去清算和修正。这在作为青年人精神导师的恰达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的《哲学书简》^①中有充分的体现。十二月党人的反叛(基本上都是青年军官，也包括实质上参与了他们活动的普希金等青年名流在内)，亦可看作是子一辈对父辈罪恶的一次未遂的清算。而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父子冲突”可以梳理出一条完整的主线^②，这条主线也隐藏在俄罗斯哲学思想史中^③。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屠格涅夫(И.С. Тургенев)的《父与子》^④，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思想哲学类甚至时政类读物去读。这部小说的核心是两代人的代表，巴扎罗夫(子辈)与基尔山诺夫(父辈)的冲突，实际上是1860年代俄罗斯思潮的真实反映。巴扎罗夫是“新人”，基尔山诺夫是“老朽”。巴扎罗夫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并为此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这个职业也有着“修复创伤”的隐喻功能。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样也书写了子辈与父辈的冲突：老卡拉马佐夫甚至被描绘成一个荒淫、无耻、堕落的形象，堪称罪恶的渊藪。但是同样作为父辈的佐西马长老则是睿智的形象。^⑤在视觉艺术作品中，也常见到父子冲突的内容。^⑥

苏联文学艺术(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等)前三十年的叙事，充满了子辈对父辈的清算，以法捷耶夫(А.А. Фадеев)的《毁灭》和奥斯特洛夫斯基(Н. Островски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代表。主人公通常是意气风发、满

① Пётр Чаадаев.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 Эксмо. 2006.

② 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到莱蒙托夫的《恶魔》、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屠格涅夫的《初恋》、《父与子》、《处女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到别雷的《彼得堡》，都可以见到“逆子”类型的主人公。

③ 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中，所列举的俄国思想家大多也都是文学家。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④ Тургенев И.С. 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9.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开头就说，这类人不仅十分恶劣而又荒淫无耻……具有一种俄国民族特色的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5卷，臧仲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⑥ 十九世纪俄罗斯大画家列宾的油画《伊凡雷帝与他的儿子伊凡》堪称父辈之恶的突出视觉呈现。

身正气、俨然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年轻男子^①，他们对待腐朽落后的那些人（通常是他们的父辈）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帕斯捷尔纳克（Б. Пастернак）在《日瓦戈医生》（原名《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中，借年轻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之口，用对革命的评价终结了父辈的罪恶：“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非正义做了判决。”^②将革命比作外科手术，这是《未来主义宣言》^③的作者兼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将暴力看作革新的前奏，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未来主义诗人的代表，他本人也曾是那些男孩子们中的一员。他们后来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尤里·日瓦戈同样是一个外科医生，也具备“创伤救治”的隐喻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万恶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父辈进行清算的同时，父亲的形象悄悄发生了更迭。在一个集体主义叙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隐喻中，父亲是一个看不见、却又总是在场的存在。父亲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象征：他的存在总是和“爱国主义”等同起来，不爱这个父亲即等于不爱国。但其中蕴含的语言逻辑绝非偶然：在西方语言中，“父亲”（father）一词的词根源自希腊语，为 *patr, pater*。以 *patr* 为词根的 *patriot* 是“爱国者”，*patriotism* 是“爱国主义”。在基督教国家中，特别是古典时期，爱国主义经常和父权以及家长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在现代西方已经发生了嬗变。《圣经》中那个严厉甚至粗暴的天父，显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而西方文学艺术作品对“爱国主义”的反思，更是从未间断过。与此不同的是，“爱国主义”却是苏联文化艺术一直高扬的旗帜，旗帜背后隐藏着一个威严的、无声的父亲（想想苏联报刊关于斯大林的那个“父亲”的比喻吧。^④）。以结构语言学的思维来看，这在电影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拉康学派

①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是俄罗斯古代文学圣徒传形象的继承。

② 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③ 最早刊载于1909年2月20日的法国《费加罗》报。

④ 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作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曾说：“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将带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去描写和谈论他……我国的劳动者则把斯大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导师、朋友和父亲。”

的哲学家齐泽克所言，“就其根本的层面而言，意识形态不是用来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用来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的。”^①

苏联的社会政治秩序无疑需要强化父亲的权威性：在苏联电影中，父亲通常都是爱国的、正面的形象，父亲与国家合二为一，比如谢·邦达尔丘克（С.Бондарчук）改编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个父亲的形象便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或许，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就已经悄然改变了。1986年，全苏第五次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首先做出的举措是解禁一大批此前在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上有所争议的影片；其次，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由原先的逐级审查剧本改为制片厂单方通过，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此外，他们还改变了电影的生产、发行和放映模式。^②这些改革措施给当时的苏联电影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中的苏联形象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到了1989—1990年，俄罗斯电影便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随即泡沫破碎，俄罗斯电影走入窘境。而随着苏联政治秩序的坍塌，电影中那个负责任的、权威的、符号性的父亲幻象也随之坍塌。实质上，这种幻象是观众“理想自我”的投射，而这种“理想自我”的破碎，需要进行新一轮的修复与重新确认。后苏联电影中一再出现“父与子”题材的重量级作品，正是重新树立“理想自我”的过程。

我们在下文便以后苏联电影为考察对象，探讨“苏联”作为一种创伤记忆，如何通过父亲的形象，在后苏联电影中进行修复和重塑，^③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书写父子关系的电影作品很多，本文只以曾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当代俄罗斯重要导演的影片为案例。

①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② 参见《苏联研究》1990年第1期关于“苏联的电影改革”的系列文章。

③ 关于后苏联电影中代际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专著颇丰，可参阅Узевский М. Домашняя синематик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кино, 1918-1996. М, 1996; Helena Goscilo & Yana Hashamova, *Cinematernity: Fathers and Sons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Film*; Yana Hashamova, *Pride and Panic: Russian Imagination of the West in Post-Soviet Film*, U.K.: Intellect Books 2007; Denis J. Youngblood, *Russian War Films: On the Cinema Front, 1914-200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7; *Death of the Father, An Anthology of the End in Political Authority*, ed. John Boornema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二、父亲不在场：创伤的记忆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①，苏联电影是一种集体主义叙事，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发生的各种故事。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一个强大的象征秩序。与那个各民族共同的父亲的伟大形象相比，电影中的家庭里的那个爸爸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苏联电影中，爸爸的形象要么只是个配角，要么干脆隐匿不见。而在苏联时代并不完美的谢幕之后，俄罗斯电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各族人民共同的父亲”突然之间不见了，与之相应的是，俄罗斯电影中的家庭出现了一种现象：父亲的缺席。这不仅仅是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再现，而是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标志。家庭的缺口是伤痛的记忆，家庭中的母亲和儿子往往以被那个强大的象征秩序遗弃的面貌出现。

巴威尔·丘赫莱伊(П. Чухрай)导演、马什科夫主演的《小偷》(Вор, 1997)，是90年代俄罗斯电影的翘楚之作，曾获得1997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际青年评委会大奖，1998年奥斯卡奖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但其价值迄今没有被充分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巴威尔·丘赫莱伊有一个在苏联乃至世界影坛都很著名的父亲格利高里·丘赫莱伊。老丘赫莱伊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电影新浪潮中俄罗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他的《士兵之歌》、《第四十一》等影片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因《士兵之歌》获得列宁奖金，并曾多次获得戛纳电影节提名。在苏联，他曾是诗电影和实验电影的代表人物；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他曾担任苏联电影家协会第一书记。他的先锋和诗意，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玩味，而在思想和精神上，他是集体主义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坚定维护者。因此，小丘赫莱伊的电影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弑父”。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战后1952年的苏联，6岁的小男孩萨尼亚从一出生就没见过父亲。他和母亲卡嘉在一列光鲜的苏联时代的火车上，邂逅了一位

^① 列宁说过：“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之中，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主要的”。参见常青：“列宁和电影：纪念列宁逝世六十周年”，《电影评价》，1984年第1期。1922年，苏共十三大还通过了党必须全面掌控电影的决议。参见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苏联电影史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22-23页。

充满男性魅力的军人托利亚，他轻而易举将卡嘉连同小萨尼亚一并俘获，于是萨尼亚才有了父亲，并对他的男性气质顶礼膜拜。卡嘉也非常享受和托利亚的这种亲密关系。但有一天他们却发现托利亚其实是一个以军人身份做掩护的惯偷。尽管识破，他们依然依附于托利亚，并参与到托利亚的行骗中，每到一地，在一个地方混熟后，便制造机会把邻居家洗劫一空，然后又寻找新的目标。终于托利亚因为盗窃被抓，萨尼亚在大雪中追赶着囚车，呼喊爸爸。后来卡嘉死于难产，萨尼亚也进了孤儿院。七年后的一天，萨尼亚偶然见到出狱的托利亚，他已经不复昔日风采，潦倒、酗酒而颓唐。托利亚已经认不出他来了。最后萨尼亚用手枪射杀了托利亚。

我们不难用拉康的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在被遗弃的母子亲密关系中，闯入一个第三者，在这个破碎家庭中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强大的象征秩序。表面上看来，他是依靠自己的男性魅力，依靠自身浓烈男性荷尔蒙的气息，然而实际上，他是把自己和当时强大的象征秩序相互嫁接，比如军人身份、与斯大林的血缘关系等，重新建立了一个破碎家庭的秩序。然而，这种嫁接却是建立在偷窃和欺骗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故事的演绎就是偷窃和欺骗逐渐被发现、最后被审判的过程。当然，这种父亲权威的二次摧毁，可以说是对苏联的深刻反思。正如导演巴威尔·丘赫莱伊在《弗拉基米尔的导演》一文中所说的：

斯大林主义的男性气质：无家可归，或偷窃我们的幸福童年 ……
如今统治俄罗斯的这一代人，正是在暴力文化、警察化的价值观中长大的。^①

从政治秩序的象征关系来看，萨尼亚和妈妈处在被统治的位置。而小萨尼亚总会梦到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这是他意识中的父亲的图腾，也是他能进入政治象征秩序的途径。托利亚出现后，就产生了实现这种途径的可能性。然而电影告诉我们，这种可能性是创伤性的。片尾中，我们看到了青涩的萨

①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98. No.1. С.19-22; Helena Goscilo&Yana Hashamova, *Cinematernity: Fathers and Sons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Fil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140.

尼亚身上的那个刺青。这个刺青是一个创伤的记忆象征：从电影文本来看，年幼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刺青其实只有在苏联的监狱中坐过牢的人才会有。同样，他不知道托利亚胸前的那个斯大林头像也是苏联监狱的产物^①：粗糙的图案，劣质的墨水。这种监狱/警察化的男性气质或生存法则，就这样灌输给了毫无鉴别和防备能力的儿子，并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永久的暴力印记。这种创伤越深刻，象征着秩序的瓦解或坍塌就越快，带来的失望和仇恨也就越大。同象征秩序连接的高潮，出现在如下的场景：当小萨尼亚看到这个斯大林刺青的头像时，托利亚故作神秘地说，这是我的父亲。指认全苏联人民的“慈父”斯大林为自己的父亲，这从语言结构来看，当然是一种深层的无意识，然而其悖论在于，这种指认是建立在一个卡萨诺瓦式的草根骗子和强大意识形态象征秩序的核心之间。这种指认具有双重功能：其一，是对强大意识形态象征秩序的解构；其二，只有当这种指认的欺骗本质被揭露之后，主人公那个“理想父亲”的图腾才会破灭，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白日梦幻想才能显露出来。影片开头那辆温馨美好的、光鲜的苏联列车，到了结尾处则是肮脏而破败的；托利亚也暴露出原形，不再是人们臆想中的那个高大全的军人，而是一个肮脏、酗酒、邋遢的流浪汉。而这番形象，就是那个“理想自我”的、真实的苏联形象。萨尼亚的开枪射击，是一种“弑父”，宣告了这个“象征父亲”的破灭。而萨尼亚此时的“二次弃儿”的身份，无疑透露出了后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强大的象征符号坍塌后，新的“镜像”尚未建立。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一形象中认识到了自己，继承了带有暴力倾向的胎记。

三、父亲回来了：创伤的接纳

2003年，安德烈·萨金采夫（А.Звягинцев）导演的处女作《回归》（Возвращение），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故事片奖。因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也曾获此奖项，所以萨金采夫常常被拿来与塔尔科夫斯基作比较，而实际上他们大相径庭。《回归》讲述了一对十余岁的

^① Alix Lambert, *Russian Prison Tatoos*, Atglen, Pa.: Schiffer, 2003.

兄弟，某一天发现只在照片上见过的父亲回家了，这在他们的世界里掀起了波澜。在七天的时间里，父亲以一种男人的暴力方式训导他们，告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必须遵从的逻辑，比如在森林里如何支帐篷生存等方法。哥哥顺从，而弟弟反抗。三个男性之间的冲突，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意外死亡。最后，兄弟俩把父亲的尸体搬上小舟，顺流而下。

在讲述父子代际关系的后苏联电影中，有很多评论认为，《回归》有着关于苏联解体、苏联记忆的直接指涉。特别是由于这部电影的出现正好与普京在独联体成立十二年之后再次连任总统重合。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整个电影隐喻着普京上台后，在强权领导下，整个国家经历的一系列痛苦的成长历程，其中有着诸多的不和谐和冲突，影片成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现状的象征。不管上述看法是否牵强，《回归》无疑是一部具有象征和寓言意味的作品。与其他书写父子关系的电影不一样的是，《回归》有着明显的宗教象征意味。从星期一到星期日的七天时间，与圣经创世纪故事有关；父亲带儿子钓鱼这个行为，也隐喻着圣经里关于耶稣鱼（ΙΧΘΥΣ）的指涉。按照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解释，即耶稣、神子、救世主这几个字的缩写，是基督徒之间心照不宣的暗号。而电影所呈现的父亲的形象，也有非常明显的指涉。父亲“回归”后，第一个镜头调度的画面，就是这个爸爸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曼特尼亚所描绘的《哀悼死去的基督》中死去的耶稣一样的睡姿，以及儿子们崇拜但却很复杂的眼神。这决不是偶尔为之的。这也显示着这个爸爸的形象在影片中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假如我们同意别尔嘉耶夫的那句名言，俄罗斯是阴性的，是驯服的、女性的、大地，或者如同洛扎诺夫所说，俄罗斯是“村妇性”的，这种观点常常被解释为男性的缺失、父权的虚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而父亲和天父在俄语中是同一个词，即 Отец。强大的象征秩序的是世俗层面的父亲，而上帝则是精神层面的父亲。这两个父亲合为一体，才是这部影片构建的新秩序。或者按照拉康的看法，没有上帝就没有父亲，也就没有一切。而这部影片就是表达儿子如何接纳这种新秩序。而这个父亲必须被杀死——片头与《哀悼死去的基督》的互文，预示着这个父亲就是要“牺牲”的，儿子翻阅的书籍是多雷插图版《启示

录》，都强化了宗教性的这个方面。似乎儿子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纳这个突然降临的父亲。

然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这种接纳又是艰难的。和《小偷》中的托利亚类似，这个爸爸也用一种军事化的强硬要求儿子服从^①。大儿子安德烈虽有不快，但行为上是服从的，接纳也很自然，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的时候就喊出了“爸爸”。然而小儿子伊万却拒绝接纳这个父亲。

伊万无疑是这部影片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从头到尾，他对所谓“男子汉气概”都是拒斥的。在影片开头，男孩子们在跳水，只有他不敢，并且他并不介意被称作胆小鬼或娘娘腔。而实际上，他比哥哥勇敢得多，从一开始就对父亲的权威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哥哥在服从爸爸指令的时候，弟弟却总是与父亲有直接的、面对面的对抗，甚至是不惜持刀面对父亲的暴力冲突：恰恰就是在这个镜头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爸爸的镜像，他才是那个俄狄浦斯，就是他杀死那个“不完美的偶像”。包括最后，伊万正是在摆脱父亲对他的规训与控制的过程中，造成了父亲意外失足死亡。而只有在他父亲死了之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这是他的父亲。而且，这种认识中所包含的追悼和忏悔，其实是一种更为清晰的认知。电影中，父亲对他们大喊一句：你们裤裆里没有东西！实际上是化解了这两个儿子的阉割焦虑，使他们在意识深处接纳了这个爸爸。安德烈继承了爸爸坚定的眼神，戴上了爸爸的手表，握住了爸爸的方向盘。这个故事与其说是“弑父”，不如说是“牺牲”，父亲用牺牲换来了、或者说拯救了儿子，使之成为“真正的男人”。在承载着父亲尸体的小舟沉下去的时候，伊万才第一次喊出了“爸爸”。这也意味着，无论怎样拒斥，这都是他无法割裂、无法消除的一部分。而此时电影的图像呈现出浓烈的基督教意味，具有追悼的气息，和开头那一幕遥相呼应。

我们可以对《回归》试作如此解读：第一，对于旧权威的继承和接纳，特别是要勇敢承担自己该做的；第二，在这里，“苏联形象”依旧是带有创伤性的：有着遗弃和暴力，最重要的是没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引入是一种修复方案。

^① 按照拉康的理论，父亲训诫要求儿子遵循的法则是语言的法则，假如语言的逻辑被违背，必然带来肉体上的惩罚。

四、寻找父亲：创伤的修复

在《小偷》中，男主角扮演者是俄罗斯著名演员、导演弗拉基米尔·马什科夫（В.Машков）。马什科夫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性格男星之一，也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电影导演。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后，他执导或出演的电影多半是讲父辈与子辈的关系的。

如何书写苏联形象，其实是所有俄罗斯导演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假想敌。那种和世界头号大国对抗的自豪感荡然无存了，社会心理出现的想象落差带来的伤痛，甚或大于物质的短缺带来的伤痛。而对于强大苏联的怀恋或想象，就成为一种新的创伤救治方案。马什科夫主演、沙赫纳扎洛夫（Карен Шахназаров）导演的《美国女儿》（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дочь，1995）是苏联解体后不久出现的一部影片。《美国女儿》的剧情是：小酒馆乐手阿廖沙的妻子离婚后嫁给了美国富翁，三年后他决定去美国迎回七岁的女儿安纽塔。虽然安纽塔乐意，可是前妻爱伦和她的美国丈夫百般阻挠。他们试图用金钱诱惑阿廖沙，阿廖沙却不为所动，爱伦便报了警。安纽塔离家出走，赶到父亲那里。父女二人在美国的各公路车站间辗转，力图躲避警方的搜寻。计划就要顺利实现之际，安纽塔意外地生病了。为了女儿的健康与安全，阿廖沙不得不去向警方自首。这部电影的故事和形式明显借鉴了1973年的美国电影《纸月亮》。透过美国公路片的形式，这个俄罗斯父亲的形象颇为耐人寻味：他贫穷，地位低，有种种小缺点，还把女儿弄丢了——当然，女儿的失去，主要原因在于投靠西方的前妻（她连名字都改成了爱伦，让人们想起《战争与和平》中那个站在俄罗斯民族对立面的、负面的爱伦）和美国资本家联合的阴谋。并且，贫穷反而作为一种道德优势出现，连同其他“道德上的正确”，共同建立起一种我们所熟悉的苏联式的道德优势：这个父亲虽然已经进入了俄罗斯时代，思维依然停留在苏联时代。当然这里的“苏联形象”是几乎完全正面的，包括民粹主义、责任心、同情心等等。电影所展示的父爱与其说是一种救赎，不如说是一种白日梦，提供的是一种“苏联依然强大”的幻象。电影的矛盾冲突依然是“苏联公民”与“西方阴谋”的尖锐冲突，

依然是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在其中看不到反思与反省。小女孩的形象固然提供了“可爱”，但是她的抉择是无因的，仿佛宿命般地就要跟着爸爸，对于这个实际上是在美国长大的儿童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当然，导演要的就是这种非逻辑：一种接近原教旨主义民粹式的、对俄罗斯民族性的描述。因为这对于俄罗斯国内观众来说依然是奏效的。

与之相似的苏联父亲形象同样体现在马什科夫导演的处女作《喀山孤女》（*Казанская сирота*, 1997）中。这部影片看上去是一部老少咸宜的爆米花式的电影，如同圣诞合家欢的晚餐，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也广受欢迎。故事讲述一位即将进入新婚殿堂的孤女，在报纸上找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谁知在新年之夜，有三位中年男人来认她，上演了一场争女的戏码。当然，明眼的观众一下子就会联想到美国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故事。不同的是，《妈妈咪呀》有着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嬉皮士、女权运动的背景，而《喀山孤女》作为一部“献给所有的爸爸妈妈”的电影，是要在新年发出一张暖心的新年贺卡，用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去治愈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失意。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大多数俄罗斯人过得并不如意。所以这部影片能引起大多数人，特别是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中年观众的共鸣，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在新年老人与三个中年俄罗斯男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联想。这意味着，他们能给人温暖和惊喜，尽管生活中他们有各种落魄，可他们在这个夜晚依然是施与者，是那个正能量的爸爸。当误会得以消除时，在自然纯朴的乡村，在天使一般的女儿和孩子们中间，他们以些许的代价就重新获得了苏联时期的自信——在一种温情的回忆中，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图景慢慢浮现，并过滤掉了所有负面因素。影片作为一个“正能量”的新年礼物，又仿佛是一个临时的、乌托邦式的避难所，人们在其中得到了收容，社会现实矛盾一时统统被忘却。

马什科夫导演并主演的另一部“寻父”故事，影片《爸爸》（*Папа*, 2004）在 2005 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多少说明了在苏联解体的阵痛过后，大部分观众重新思考了苏联：并不是像外科手术一样，一刀就可以与不快的过去两断，还是要接纳那个过去的苏联，重新接纳其中可以接纳的价值观。2005 年莫斯科电影节金奖影片《自己人》，就让观众又

重温了那种集体主义的话语。马什科夫的《爸爸》在各电影节上显得非常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说，父亲非常爱我，而我却没有那么爱他。我这是在还债，还父母的债。因此他把这部作品“献给所有的爸爸”。的确，这部以代际关系为核心的影片，描绘的正是“爸爸”们的群像，同时这也是重新塑造的一个“苏联形象”。

《爸爸》的剧情以 1930-1950 年代的苏联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有惊人音乐天赋的犹太孩子和他父亲的故事。大卫从小就能够把小提琴拉得催人泪下，他是爸爸亚伯拉罕生活的全部。这个鳏夫、酒鬼对儿子施以棍棒式教育，梦想有一天儿子成为大音乐家，名满天下，并为此而倾其所有——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严厉而残酷地逼迫儿子，从未料到自己埋下的是恨。儿子终于成为他想象中的那个音乐家，给他的回报竟然是一记耳光。多年后，儿子终于理解了爸爸，殊不知爸爸早已原谅了他。

马什科夫在谈及这部影片的时候说：这是一部关于爱，古老而永恒之爱的电影。它引领观众去爱自己的父母，他们是世界上唯一无私地爱着我们的人。然而我们并不总是能回报这种爱。认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这是错误的。并不是那样的。我们的未来维系于父母——因为我们在走向他们，最后等待我们的都只能是一种结局。因此，这条路离父母越近，就越是真爱。孩子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是他们的明天。

因此，电影着力于对父亲形象的刻画。这部影片中的儿子大卫，实际上有三个父亲：他的生父、酒鬼亚伯拉罕，心灵上的父亲梅耶，还有精神上的父亲、音乐学院教授车尔尼雪夫。这三个父亲形象共同构成了“正面的”苏联形象。这部电影试图告诉人们，在被渲染为警察统治的斯大林苏联，依然是爱和良知共同支撑了人们的心灵，这才是更为真实的苏联形象。亚伯拉罕有一身的毛病：暴力、酗酒、粗俗，这也是千万个寻常的俄罗斯爸爸的写照，但是他给儿子的其实是自己的全部。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无私的爱，只不过是使用他自己的方式。梅耶弥补了亚伯拉罕不能给大卫的爱，给他平静、安宁。车尔尼雪夫不仅是大卫的伯乐、事业上的父亲，而且在那个对犹太人很严苛的时期，他作为某种官方的代表，部分地承载了斯大林那个“慈父”的功能。大卫同样有“弑父”的行为，最后导演呈现给我们的却是“理解之同情”：

爸爸早已原谅了儿子的大逆不道，儿子也理解并产生了对爸爸的真爱——看到这里，观众便得以释怀，这也是此片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原因。

号称“俄罗斯电影沙皇”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 Михалков）的《12怒汉》（2007）则表达了俄罗斯父亲的集体反思。这部电影翻拍自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的经典影片。然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翻拍片。吕美特电影中，12个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男人组成的陪审团要决定一个被控弑父的底层男孩是否有罪。如有罪，这个男孩会被判处死刑。一开始，这些人都漫不经心，急着回家，几乎没什么悬念就决定了孩子的有罪。这时有一个人举手反对，于是剧情急转直下，在争吵、冷静、反思过后，陪审团竟然逆转，改判孩子无罪。吕美特这部电影一直被列为世界电影经典，影片涉及到了对深层次的人性、民主制度、理性的探讨；同时因为紧张、紧凑的节奏，在形式上也独树一帜。再拍一部同题材电影难度可想而知，但米哈尔科夫却成功地把这部电影拍成了一部深沉而宽阔的史诗风格片。其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原作中那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拉美族裔的美国少年，换成了车臣男孩被指控谋杀俄罗斯继父的故事。这样一来，这部影片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叙事，获得了一种更有深度、更为宽广的时间与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美特有缺陷），借12个从苏联时代过来的老男人对一个车臣少年的接纳和对自己的反省，实现了对苏联解体以来创伤记忆的修复，以及对苏联过往历史的反思。吕美特电影中的法律公平、正义之要义，在米哈尔科夫这里并不是要表述的重点。相反，人们看到的是超越法律之外的道德，也就是俄罗斯文学艺术中常见的命题：“法律是永恒的，至高无上的，但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米哈尔科夫的家族在俄罗斯历史上非常显赫。在影片中他扮演一个画家，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的曾外祖父，十九世纪末的著名画家苏里科夫（В. Суликов）。他的爸爸谢尔盖·米哈尔科夫（С. Михалков），是苏联国歌歌词的作者。他是俄罗斯电影家协会的主席，同时也是世界各大电影节的常客，在威尼斯、戛纳、奥斯卡都曾折桂。如何向世界讲述俄罗斯，讲述苏联，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12怒汉》的核心，是他刻意安排的12个男人。他们都是从苏联时代过来的中年人，经历过苏联解体的严冬，代表了社会各

个阶层的俄罗斯人。而车臣少年的身份，又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他是儿子，另一方面，他是“非我族类”的儿子，更何况还被指控杀害了俄罗斯继父。在这个点上，父子关系被转换成这样一个隐喻：俄罗斯以有养育之恩的养父自居，而车臣却是个白眼狼。究竟是否要包容他？12个男人中11个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罪”。我们要注意的，同样发生在一个闷热密闭的环境中，吕美特电影是发生在一个会议室里，而米哈尔科夫的电影则移植到了一个中学的体育馆。这明显是对别斯兰恐怖事件^①的指涉。别斯兰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恐怖袭击，而且切切实实给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带来了创伤，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神话不仅破灭，更是产生了新的仇恨。在米哈尔科夫的《12怒汉》中，11个人指控车臣少年有罪，不仅是对闷热天气的不耐烦，不仅是种族歧视问题，更有一种“我要复仇”的集体无意识在驱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年人生动荡的种种不如意，对社会的抱怨，都会聚集在一起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在画家投票反对，驱使另外11个上了年纪的父亲反思之前，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对“这些年”的怨恨。而面对“谁该对我的不幸负责”这个问题，他们经过反思，最后都得出了自己的答案。理由各有不同，但最终都通过宽恕这个孩子而救赎了自我。第一个投出反对票的物理学家无疑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代表，在苏联解体后困顿酗酒，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女孩见到他的样子，问自己的母亲，这是不是个疯子，母亲说，他没疯，他只是非常难过。这个小小的同情拯救了物理学家，也让他在反思中省悟，只有爱是唯一的出路。犹太老人回忆起父亲在二战时爱上党卫军军官的妻子，并和她生了11个孩子的故事，想到偶然性或许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他投了反对票。社会地位最低的出租车司机反而最坚定地认为孩子有罪，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车臣人。他的老婆跟美国人跑了，把自己的不如意全部归咎于“外部势力”，不仅是美国人，还有犹太人、车臣人以及一切“外来的”人们。而最后对自己孩子的爱与愧疚，让他省悟到这个车臣少年是无罪的，并最终选择了投反对票。《12怒汉》的成功在于，它对苏联形象

^① 2004年9月1日，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劫持了12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到2004年9月3日事件结束，共计死亡326人，是当代世界最残暴的一次恐怖袭击（向少年儿童大开杀戒）。这次恐怖袭击的地点正是学校的体育馆。

的描述成功摆脱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民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定思维模式，而是截取苏联形象与俄罗斯精神传统最为贴合、并有宗教信仰意味的一面，这些苏联时代过来的父亲们借助爱与宽恕，找到了新的“理想自我”。

结 语

对于后苏联电影来说，“苏联形象”问题是历史观，也是意识形态和哲学问题。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后苏联电影对苏联的反思，经历了一个创伤控诉、接纳，到逐渐修复的过程，其中对苏联形象的认知逐渐摆脱了一元论与意识形态化，并逐渐趋向对“崇高”的肯定。如同当代著名哲学家施宾格勒说，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伊斯兰主义，不是主权扩张，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脱崇高”（*désublimation*）过程，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不会欲望，不再敢有崇高的信念，不会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苏联电影的这种反思与指向是弥足珍贵的。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film theory of Jacques Lacan's psychoanalys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generation conflicts in the post-Soviet films. By analyz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se image narrat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Soviet image", as an "imaginary signifier", appears as father in the post-Soviet movi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what ideological codes are hidden, how these codes are healed and how "ideal ego" is reshaped by narratives of "father and son".

【Key Words】 Post-Soviet Movie, Soviet Image, Father and Son, Jacques Lacan, ideolog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психо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Лака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ъекта изучения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е картин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а, изображающие конфликт поколений отца и сына; на основе анализа данных фильмов и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й, обсуждается «обра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фильм как «символа воображения», т.е. как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д скрывается за образом отца, и как через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отец и сын» заживляются раны, и воссоздаётся «идеальный 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фильмы, обра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ец и сын, Лакан, идеолог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德尔苏·乌扎拉》：冲突年代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中苏关系*

张建华**

【内容提要】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贯穿于中苏友谊高歌猛进时期，也表现在中苏关系阴霾满天的年代，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幻。1975年出品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以及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形象”，成为中苏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背景下的重要文化事件。《德尔苏·乌扎拉》的波折命运是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国家间政治”的副产品，也是曾经有着较大程度同质化的两国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

【关键词】中苏关系 《德尔苏·乌扎拉》 中国形象 反华电影

【中图分类号】D815;J905(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2-0020(26)

在苏联与中国两党两国关系由分歧发展为矛盾，由冲突进而形成对抗的特殊年代（1969—1989年）里，双方借力惯用的政治宣传武器，以宣示自身道统和政治路线，来建构自身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政治文化领导权，而电影作为大众通俗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德尔苏·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的“里海问题研究课题”，教育部国别与地区研究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金砖国家文化与历史关系”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项目批准号：11&ZD134）的阶段性成果。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乌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 デルス・ウザーラ/ Dersu Uzala)即是这种“国家间政治”漩涡中随波浮沉的一叶扁舟,在不同历史时期体验着大相径庭的历史命运^①。笔者试图运用英国著名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图像证史”(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的研究方法,从“图像本身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的视觉表象力量的最佳向导”^②的思路出发,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考察中苏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剧变在文化艺术上的体现,进而思考冷战环境和国际关系背景下政治与文艺的特殊关系。

一、“中国形象”在苏联电影中的缘起

中俄两国,种族和文化差异巨大,而且曾经相距遥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彼此形象和消息所知甚少,几近隔绝。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尽管有比丘林(Н.Я. Бичурин)、瓦西里耶夫(В.П. Васильев)、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这样的职业汉学家致力于对中国的不懈译介,有普希金(А.С. Пушкин)、列夫·托尔斯泰(Л.Н. Толстой)这样的大文豪对中国文化的极度倾慕,但是在俄国社会中,主流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落后”、“愚昧”、“停滞”和“黄祸”。

帝俄时代的“中国形象”基本表现为文化形象。“中国形象”在俄国的转变始于列宁(В.И. Ленин)和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命运和革命使命的理解。也正是由此时期开始,“中国形象”的特质,除原有的文化形象之外,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背景下的“政治形象”。1912年7月15日,列宁读了孙中山的《论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之后,就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一文。列宁认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③同年11月8日,列宁在《新生的中国》(обновленный Китай)中再次强调:

① 该影片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于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Chung Kuo-Cina)、法国导演让·雅南(Jean Yanne)于1974年拍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被1970年代的中国报刊称为三大反华影片。

②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7页。

“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不感兴趣。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开始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①

十月革命爆发后，旅居俄国各地的6万华工积极地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运动^②，并为此抛撒鲜血乃至献出生命，促进了俄国社会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全新的“中国形象”在俄国形成。^③《乌拉尔工人报》

（Уральский рабочий）写道：“在我们战线上作战的中国团，以其坚强和极端坚忍不拔的品质而著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部队。”^④《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ы）载文：“中国团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⑤

1926年，迈耶尔霍尔德剧院（Театр имени Вс. Мейерхольда）演出了戏剧《怒吼吧！中国！》（Рычи, Китай），在苏联舞台上首次出现了正面的和积极的“中国形象”。俄共（布）领导人兼理论家布哈林（Н.И. Бухарин）评论：“戏剧《怒吼吧，中国！》非常生动感人，其轴心是干活的牲口变成了革命的无产者。”^⑥1927年，莫斯科大剧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又上演了芭蕾舞《红罂粟》（Красный мак），内容为苏联舰船来到中国港口，鼓动和领导了中国穷苦工人的革命行动。

1929年12月，苏联导演特拉乌别格（Илья Трауберг）拍摄影片《蓝色特快列车》（Голубой экспресс，又名《南京—苏州特快列车》（Экспресс Накин-Су Чжоу）。故事虚拟在1920年代中期，由南京开往苏州的“特快列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8页。

② 《申报》（1921年9月26日）：“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五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③ 在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时期，在红军中活跃着由6万华工组成的孙福元中国营、任辅臣中国团、张福荣中国营、伏龙芝中国独立团、包其三中国营、桑富阳中国营、韩喜顺中国支队、敖德萨中国独立支队、比里修诺夫中国支队和别尔米中国支队，他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得到了列宁和俄共（布）、苏维埃政权的嘉奖。参见 Попов Н.А. Они с нами сражались за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 М., 1948; Китайски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боях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власть (1918-1922). Москва, 1961.

④ Ураль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сен.1918.

⑤ Коммунисты. 4.окт.1918.

⑥ Правда. 02.фев.1926.

车”上爆发了革命运动。这部电影是苏联电影中臆想的“中国题材”，电影中的中国人只是展现革命运动的工具，剧情、场景、服装、道白等与中国情况有极大的差异，同话剧《怒吼吧，中国！》的样式和内容极为相似，影片的艺术水平也较低。英国《泰晤士报》（1930年10月23日）评论道，“这是为中国拍摄的莫斯科电影”，“目前在柏林莫扎特剧院上映的电影《蓝色快车》，由苏联电影公司拍摄，旨在反映世界革命。它煽动中国人以暴力对抗白人，如果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团伙为袭击火车、射伤传教士的行为寻找动力，那么这部电影完全可以提供。这部电影以丰富的戏剧冲突展现了白人阶层与下层中国民众的冲突，在柏林有着特殊的观众，每当一个白人被杀死或扔出车外，人群中就会爆发出喝彩。这并不会对德国观众产生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类电影是为大量市民拍摄的。”^①然而，这部57分钟的无声电影，整片除一直用激昂的《华沙革命曲》和《国际歌》伴奏外，仅用极少量的俄文字幕解说，不识俄文的中国观众是无法完全理解的。事实上，查阅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有关资料，也未见该片在上海、北京、广州、哈尔滨等城市放映。这是中国人形象首次出现在苏联电影之中。

苏联电影中完整的“中国形象”首次出现在1933年列宁电影制片厂（Ленфильм）拍摄的《我的祖国》（Моя родина）^②中。《我的祖国》是苏联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以1928年中东路事件为背景。中国青年“王流浪汉”（Ван-босьяк）^③生活在中苏边境城市的贫民窟里，身边是鸦片鬼、俄国妓女、

① *The Times*, 23.Oct.1930.

② 该电影名还为《桥》（Мост）和《红旗远东特别军》（Люди ОКДВА）。

③ 他的扮演者是乌兹别克族的演员巴里·阿季佐夫维奇·哈依达罗夫（Бори（Барри）Азизович Хайдаров 1909.12.23-1986.5.21），他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培训班毕业后，一直在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Узбекфильм）工作。他一生参加拍摄电影10部，除扮演乌兹别克族角色外，还扮演过日本人。

高利贷者以及红胡子^①，他在金钱和女人的诱惑下加入了国民党军队（东北军）中。在中苏界河的另一侧驻守着苏联红旗远东特别军，军中有一位与“王流浪汉”年龄相仿的红军战士瓦西卡（Васька）。战斗打响后，“王流浪汉”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在苏军战俘营中，“王流浪汉”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人道待遇，他在逃亡路上坚定地杀死了一直欺压他的东北军长官，在瓦西卡的鼓励下返回了苏联一方，并与其他中国人一样，与根据《中苏伯力会议草约》（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短期占领远东地区的苏联红军和谐相处。

1935年，苏联著名导演多夫仁科（А.П. Довженко）在斯大林的关怀下拍摄了电影《航空城》（Аэроград），讲述苏联准备在太平洋沿岸的东部边境建设航空港。共青团员、集体农庄庄员和退伍红军战士站在新政权一方，而商人、原白卫军和日本浪人竭尽破坏，由此爆发了激烈和殊死的斗争。中国人王林（Ван Лин）^②在片中并非主角，但在烘托剧情方面不可缺少，影片的结尾是王林为航空城的建立引吭高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外交上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在中苏党际和国家关系的蜜月期（1949-1958年），苏联电影扮演了中苏友好的文化桥梁以及先进的“苏维埃文化”的双重角色。

1949年9月初，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正式邀请苏联电影专家帮助拍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纪录片。25位苏联电影专家来到中国，一队是以格拉西莫夫（С.А. Герасимов）为首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后方摄影队，这一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徐肖冰负责协助，以拍摄后方建设为主。另一队是以瓦尔拉莫夫（Л.В. Варламов）为首的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的前方

① “红胡子”（Хунхузы）是苏联早期电影中涉及远东和滨海地区经常出现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红胡子并非仅指中国土匪，实际上是包括中国人、朝鲜人、俄国匪帮和日本浪人在内的特殊群体。美国记者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后担任美国政府远东司司长，曾力主“满洲开发计划”）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访问中国东北辽宁牛庄新民屯的“红胡子”。他写道：“新民屯是混血儿出生的绝佳地点，鱼龙混杂，充满了传奇故事，日本人装作是中国人，俄国人装作是德国人，美国人却被误认为是俄国人，美国人、波兰人、希腊人、犹太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间谍各怀鬼胎，随时准备拔枪一决生死。这真是惊险刺激的高品质生活。”（Herbert Crole, *Willard Straigh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4, pp.149-150.）

② 该角色的扮演者是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生并长大的苏联朝鲜族人崔（Г. Цой）。

摄影队，这一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总队副队长吴本立协助，以拍摄解放战争为主。^①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两个摄影队拍摄了大量的素材，其成果即是两部里程碑式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②和《中国人民的胜利》^③。《中国人民的胜利》在莫斯科完成后期制作，导演瓦尔拉莫夫在1951年以此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一等奖。^④

1949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欢迎苏联电影》。他强调：“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能够大量供给我们这种优秀的文化食粮。有了苏联的帮助，我国电影事业的革命，新的人民电影事业的建设，可以加快速度。”^⑤随后，大量的苏联故事片和纪录片被引进中国。^⑥仅1949年至1953年，中国放映的苏联影片多达200多部，观众高达18602万人次^⑦。苏联电影“还被各级学校和社会团体用作群众思

① 吴本立：“《中国人民的胜利》五彩片摄制经过”，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第136-140页。

② 俄文名：Освобождённый Китай，苏方导演格拉西莫夫，中方导演徐肖冰、苏河清，摄影：布拉日科夫（А.Бражков）。

③ 俄文名：Побе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导演：瓦尔拉莫夫、吴本立、周峰，摄影：沃龙佐夫（А.П.Валонцов）、郝玉生、李秉忠、徐来、李华、叶惠。

④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的电影胶片，因随意丢弃烟头引发的火灾而几近全部被焚毁，几个小时长的开国大典原始胶片只抢出了几分钟。后以残余的这段彩色胶片，进行了补充拍摄，剪辑成了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电影专家在中国开创了“补拍”、“表演”纪录片的历史。按照苏联电影专家瓦尔拉莫夫制定的拍摄提纲，补拍了辽沈、平津、淮海、渡江四大战役。中方的助理导演吴本立此前已经拍成了黑白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又跟着苏联专家补拍了一遍彩色的“渡江”。苏联专家还精心设计和重拍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著名的长镜头。（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第140-145页）

⑤ 陆定一：“欢迎苏联电影”，《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0日，第5版。

⑥ 1922年陕南驻军在南郑县汉台南边驻地放映苏联纪录片《集体农庄》，此为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最早记载（陈一愚：《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896-1949）》，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年，第26页）。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电影已在中东铁路沿线的俱乐部中放映，但属非营业性质，只供内部职工看，社会影响不大。1926年，由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在上海南市西门方派桥共和影戏院放映了爱森斯坦的著名影片《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田汉认为这部影片“是为真正苏俄艺术影片入中国之始。”（田汉：《田汉文集》第14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第264页）。1931年4月，上海百星大戏院上映的普多夫金导演的《成吉思汗的后代》（Потомок Чингисхана），为首部在中国公映的苏联故事片。（程小莹：《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⑦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想教育的教材，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①，同时也配合了建国初期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例如《普通一兵》（Рядовой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第三次打击》（Третий удар）、《伟大的转折》（Великий перелом）等影片，“在部队的指战员中造成了学习运动，产生了马特洛索夫式的人物。”^② 1949-1959年，苏联从中国进口电影102部，同期中国从苏联进口电影747部。^③

尽管在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但直至1960年代初，中苏双方在电影中展现的对方形象，仍然是以友好和友谊为基调的，这其中包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拍摄的《欢庆中苏同盟十周年》^④、《伟大的友谊》^⑤和1961年拍摄的《兄弟的友谊》^⑥。

二、《德尔苏·乌扎拉》与“中国形象”的转变

1960年代末，随着珍宝岛事件^⑦爆发，中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初期口诛笔伐式的“论战”演变成了军事冲突式的“敌对”，两国电影中对方形象的基调也由“同志+兄弟”突变为“敌人+叛徒”。1974年，苏联筹拍故事片《德尔苏·乌扎拉》^⑧。该电影以及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形象”立

① 李明滨：“中国与苏俄文化交流志”，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中外文化交流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② 王阑西：“苏联电影在中国”，《人民日报》，1952年11月5日第3版。

③ 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④ 《欢庆中苏同盟十周年》，编导：李坤，摄影：韩浩然。

⑤ 《伟大的友谊》，编导：王永宏，摄影：王德成。

⑥ 《兄弟的友谊》，编导：李坤，摄影：陈锦侗。

⑦ 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事件”（Событие на острова Даманский）。

⑧ 《德尔苏·乌扎拉》在1961年由苏联亚美尼亚族导演巴巴扬（Агаси（Агасий）Арутюнович Бабаян）执导，首次拍成电影。该电影被归类为“艺术影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фильм），苏联电影导演、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书记库利扎诺夫（Л.А. Кулиджанов）在1971年底曾对黑泽明说“不过那是一部非常枯涩的影片”（《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63页）。美国电影史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在《黑泽明的电影》中提到黑泽明称巴巴扬的作品为“电视片”，黑泽明认为：“这部电视片只是一个肤浅的冒险故事，并没有唤起对中心人物的道德共鸣”（参见[美]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万传达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

即成为中苏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背景下的重要文化事件。

《德尔苏·乌扎拉》取材于俄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В.К. Арсеньев）^①的游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由该书第二部《德尔苏·乌扎拉》（Дурсу Узала）改编而成。

1902-1907年，时任帝俄西伯利亚第29火枪团上尉的阿尔谢尼耶夫开始了在乌苏里边疆区的第一次考察。主要目的是为帝俄政府制作军事地形图，并考察当地的道路、地质、植物、动物和居民。足迹遍及帝俄和苏联所称的滨海省南部（Южное Приморье）、希霍特—阿林山脉（Сихотэ-Алинь，中国称“老爷岭”和“内兴安岭”）、及远乌苏里区（За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至圣奥尔加湾（залив Святой Ольги）北部。1908-1910年，阿尔谢尼耶夫得到俄国地理学会（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的资助，除继续沿希霍特—阿林山脉考察之外，还到过滨海省北部：包括乌苏里地区北部到阿穆尔河（中国称黑龙江）的鞑靼湾（Татарский залив）和乌苏里江下游沿岸。随后，阿尔谢尼耶夫将考察结果写成两卷本《乌苏里边疆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简报》（Краткий военн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在1911-1912年出版。

阿尔谢尼耶夫在1902和1907年两次到乌苏里地区探险，都是由当地的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Дурсу Узала）为其充当向导。善良、坚强、机智和乐观的德尔苏·乌扎拉以他对泰加森林环境的熟识和他特有的野外生存能力，以及他视万物（水、火、风、野兽）为灵长和人类朋友的性情，感染了阿尔谢尼耶夫，两人冲破地位和阶层的巨大差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当阿尔谢尼耶夫再次回到乌苏里地区时，听到了德尔苏·乌扎拉遇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埋藏了德尔苏·乌扎拉，在他的坟头轻声自语：“你是在森林里出来的，又在森林里结束了你的一生”。^②阿尔谢尼耶夫在其他的文章

① 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俄国和苏联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作家和民族学家。1903年和1909年，他先后被选入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十月革命后，他在新政权下获得很好的地位和待遇，两次担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博物馆馆长职务（1910-1918年，1924-1926年）。

②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56页。

中也多次谈起：“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现已去世的乌苏里江上游赫哲人德尔苏·乌扎拉的身影便出现在我面前。只要我一想起他以及我跟他徒步旅行的共同生活，我的心便哀痛欲裂。”^①他将八年的考察日记整理成游记《沿着乌苏里边疆区》（По Уссурийскому краю）和《德尔苏·乌扎拉》，在1921年和1923年公开出版。游记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极大反响，高尔基于1924年亲自给阿尔谢耶夫写信，称赞此书具有“毋庸置疑的巨大的学术价值”，“为它的表现力而入迷，而倾倒”。高尔基认为此书“成功地体现了布雷姆^②和库珀^③的结合”。^④1926年海参崴的“书的事业”出版社（Книжное дело）将两书合集出版，书名为《在乌苏里的莽林中》。^⑤此书亦受到国际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自192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它陆续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其中，日本翻译家长谷川四郎（長谷川四郎）根据1930年俄文版《在乌苏里莽林中》，将其翻译为日文并出版，分别为《穿过西伯利亚大森林》（シベリアの密林を行く）（列入《现代世界报告文学全集》（現代世界ノンフィクション）^⑥和《德尔苏·乌扎拉》（デルス・ウザーラ）（列入《平凡社东洋文库》（平凡社東洋文庫）^⑦。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有“电影天皇”之称的黑泽明早在1940年代就已经阅读过《在乌苏里的莽林中》^⑧。他在1951年拍摄完《白痴》^⑨后，曾邀

① 阿尔谢耶夫：《在乌苏里莽林中》，黄树南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

② 布雷姆（Alfred Brehm，1829-1894年），德国动物学家和科普作家。

③ 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年），美国惊险小说作家。

④ 阿尔谢耶夫：《在乌苏里莽林中》，译者前言，第2页。

⑤ 1951年，该书改由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地理文献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再版。

⑥ 《穿过西伯利亚大森林》，アルセーニエフ著，長谷川四郎訳：『シベリアの密林を行く』，現代世界ノンフィクション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6年。

⑦ 《探險記》，アルセーニエフ著，長谷川四郎訳：『デルスウウザーラ：沿海州探検行』，東京：平凡社東洋文庫，1965年。

⑧ 黑泽明回忆说，他读过当时全日本只有上野图书馆收藏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参见《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63页。

⑨ 故事改编于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将场景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社会，讲的是自称白痴的退伍军人龟田与妙子和绫子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这是黑泽明第一次改编俄国作家作品。

请日本左翼剧作家久板荣二郎（久板栄二郎）将《德尔苏·乌扎拉》改编为电影剧本。黑泽明回忆：“那时想都没想过要在苏联拍摄，所以背景和人都换成日本的，写成的电影剧本却不大对头。总之，在日本拍是搞不好的。”^①

1971年12月，黑泽明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ь），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第一书记库利扎诺夫邀请黑泽明来苏联拍摄电影，黑泽明立即表达了拍摄《德尔苏·乌扎拉》的愿望。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由黑泽明创作电影剧本，再由苏联剧作家纳吉宾（Ю.М. Нагибин）改写，最后由两人共同协商定稿。影片耗资400万美元，制作为时四年，其中两年是在苏联进行实景拍摄。在此期间，黑泽明与5名日方工作人员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均极其艰苦的西伯利亚地区，美国电影史学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评价说：“在零下40度的西伯利亚的天气中，这简直是一个折磨”^②。

仅就《德尔苏·乌扎拉》的艺术水平而言，黑泽明及其创作团队无疑是成功的。这部电影以极高的艺术水准迅速赢得了国际艺术界的承认，并获得了一系列国际大奖。这部电影不仅在1975年获得第九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金奖，同年还获得国际电影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esse cinématographique）奖。1976年获得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第48届“奥斯卡奖”（The Oscars）的最佳外语片奖。1976年由苏联“宇宙—电影”股份公司（Космос-фильм）提交给芬兰电影节，获得了“芬兰批评家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финских критиков）的“尤西奖”（Юсси）。1977年，黑泽明获得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大卫迪多那太罗奖/Ente David di Donatello）最佳外语片导演二等奖，该片获得电影制作“专业奖”。1977年，黑泽明获得意大利国立电影记者联合会（Итальян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индикат киножурналистов）评选的外语片最佳导演“银丝带奖”（Серебряная лента）。1977年，该影片获得西班牙国立作家和戏剧家协会（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исателей и сценаристов）评选的最佳外语片奖。1977年，该影片获得西班牙电影评论家协会（Союз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62页。

② 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第286页。

испанских кинокритиков)最佳外语片奖。1977年,该影片主角德尔苏·乌扎拉的扮演者木祖克(М.Мунзук)获得法国电影评论家奖。1980年,该影片获得秘鲁电影评论家评出的“1970年代最佳电影”称号。《德尔苏·乌扎拉》在日本放映时更名为《乌苏里江猎人》(ウスリーハンター)。

在电影中,黑泽明用精致的长镜头处理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了乌苏里的严冬和盛夏,色彩斑斓的树林、篝火、风雪,脚印和河流,展现相信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珍惜生命、保护环境和爱憎分明的德尔苏·乌扎拉的人性,展现阿尔谢尼耶夫与德尔苏·乌扎拉超越阶层与等级的友谊。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与游记有所不同,电影为了更艺术化地展现故事情节,增加了一些虚构的内容。如:当阿尔谢尼耶夫和德尔苏·乌扎拉第二次相遇时,德尔苏·乌扎拉因年老体弱再也不能生活在山林之中,在阿尔谢尼耶夫的劝说下他终于走出森林,来到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阿尔谢尼耶夫家居住,但终因不习惯城市生活,在返回森林的路上遇害。又如:多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重返乌苏里地区时,发现德尔苏的坟墓已找不到了,德尔苏·乌扎拉视为生命的山林正在被改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城镇,阿尔谢尼耶夫不免发出声声叹息。

在将《在乌苏里莽林中》改编成《德尔苏·乌扎拉》电影剧本以及后来的拍摄过程中,苏联政府的政治干预和外交考量就已经突显出来。

在原著中详细描写了阿尔谢尼耶夫多次深入中国人聚居区,记录了居民和中国文化在当地的长期存在,即:“哪儿没有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哪儿都有中国人。不管往哪儿走,到处都能碰上他们”。^①阿尔谢尼耶夫描写了中国人的友善和勤劳,记录了他多次受到中国人的款待,甚至多次住在中国人家里的故事。他感受到,“各地的中国居民养成对过路人非常关怀的习惯。每个过路人都可以在别人的房子里无偿地居住三昼夜,但如果他继续住下去,那就必须做工或分摊大家的伙食费。”^②“我们在(中国人)房子里安顿下来,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中国人殷勤地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只请求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01页。

② 同上,第113页。

不要把马放出去践踏庄稼。”^① “在河对岸大榆树的荫影下，有一座中国房子。我们见到它，高兴得就像见到了头等旅馆一样。当好客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已经饿了两天时，就急忙准备晚饭。对我们来说，清油大饼、小米稀饭和咸菜比城市里最精美的菜肴还好吃。我们得到默许，决定在这儿过夜。中国人收拾自己的被褥，把多半截的炕让给我们。……”^②阿尔谢尼耶夫难忘与中国人一起迎接1907年新年的场景：“我们在去比金河上人口最多的居民点西沟（西河谷）的路上，度过了1907年的最后一天。这里清一色住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宰了猪，恳切地留我们明天再住一天。我们的粮食储备已经耗光，能够在比普通的野营地更为文明的环境里迎接新年，这一前景使我的士兵们喜笑颜开。我同意接受中国人的邀请。”^③但是，以上的重要情节均未在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中得到体现。

在原著中出现有名有姓的中国人超过二十多个，包括李唐贵、徐乌福、齐锡武、孙才、张保、金柱和李春平等重要人物。人们尊称为“大善人”的齐凡给阿尔谢尼耶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中国人以善良著称。当洪水第一次淹了庄稼时，他就来帮助他们，并给他们种子重播。谁有困难，就找齐凡。他不管对谁、对什么事都不拒绝。如果不是齐凡，新来的移民无论如何也活不下来。……现在齐凡几乎破产了，他想离开乌苏里地区回老家去。当我们到达后，黄昏已经降临了。在齐凡的屋子里点上了灯。我本想在露天睡觉，又怕下雨。齐凡在自己的炕上给我腾出一个位置。我和他交谈了很久。他很乐意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语言诚恳，没一句废话。从这次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决定回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报告他及时对俄罗斯移民给予帮助这件事，为他申请某种奖励。”^④但是在电影中仅保留张保和李春平两个中国人形象，而阿尔谢尼耶夫及其7个俄国队友却成了画面中的绝对主角，经常出现的唯一的黄种人面孔只有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

在原著中多次记载“就在山口，一条小路的右侧，有一座用圆木搭成的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05-106页。

② 同上，第112-113页。

③ 同上，第154-155页。

④ 同上，第116页。

小庙，里面有画着中国神像的木版画，画前摆着两个剩有香头的木盒。旁边还放着几片烟叶和两块糖。这是给林神上的供。在邻近的树上挂着破红布，上面题词是：‘山门镇威，昔日齐国为大帅，今在大清镇山林’”。^①然而在电影中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场景和画面，蕴含着有意删除原著中所透露的具有中国领土主权的信息的嫌疑。

对此，黑泽明也表达了不满和担心。他承认，“在角色上，省略和改变了人物，把三次探险并成两次。此外，和历史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也很多。”^②“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是（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也非常关切的。”^③“电影剧本以我写的第一稿为主，经过苏联方面的尤利·纳吉宾加工，我重新改写一遍，两个人又进一步研究了一些细致的地方。”^④这表明，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主席叶尔马什（Ф.Т. Ермаш）和苏联官方在剧本编写和电影拍摄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苏联试图通过这部电影表明其对历史上乌苏里江流域的归属的态度，并借以表明在中苏边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态度。

另外，电影《德尔苏·乌扎拉》本身属性的变化也说明了问题。它从最初的日苏合拍变成了最后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独立出品。影片在意大利放映时，拷贝被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剪掉 20 分钟，这使得“黑泽明勃然大怒，宣布说，他没有同意剪掉这 20 分钟，这是苏联人在捣鬼。他声称，他再也不愿意与俄罗斯人一起工作。在他眼里，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对这个伟大的苏联英雄（德尔苏·乌扎拉）的同情’”^⑤

苏联政府明显地借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宣示俄国和苏联对乌苏里江流域的历史属权和主权，它与 1972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发布《更改远东地理主体名称法令》（Переимен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72 году）密切相关。此法令宣布将通过 1858 年《中俄璦琿条约》和 1860 年《中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21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同上，第164页。

⑤ 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第286页。

俄北京条约》攫取的中国领土（苏联的滨海边疆区）的地名大规模地由原世代通用的中文名称更改为俄文名称，如将滨海边疆区的“游击队员区”（Партизанский район）的“中国山”（Китайская гора）更名为阿里霍山（Ольховая гора），将“波扎尔斯基区”（Пожарский район）的锡霍特山（гора Сихоте）更名为索勃林卡山（гора Соболинка）。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苏联还出现了大量出版阿尔谢尼耶夫著作、纪念文集和以他的名字命名远东和西伯利亚城市的热潮，将滨海边疆区的一个行政区（городской округ）命名为“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ский），将流入乌苏里江的刀毕河（Даубихе，俄文发音即为“刀毕河”）改为“阿尔谢尼耶夫卡”（Арсеньевка），名义上是为纪念曾经在此流域考察的阿尔谢尼耶夫，实则是在该地区实施法律上的“去中国化”进程。尽管阿尔谢尼耶夫热情欢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表示“革命是所有人，也包括我的革命”^①，并且很快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他的前帝俄军官的身份是无法抹掉的。因此，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志业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此时大张旗鼓地纪念一个前帝俄军官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此外，苏日合拍《德尔苏·乌扎拉》也暗含了在外交上拉拢或接近日本之意^②。1970年代初，苏联出于与中国对抗、与美国争夺亚太的战略和军事目的，以及东部经济开发的多重考虑，从1973年开始建设横贯西伯利亚与远东全长达3145公里的贝阿铁路（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ая магистраль）。贝阿铁路的开建，标志着西伯利亚开发进入新阶段，表明苏联已将西伯利亚开发列入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组成部分。在开发和利用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时，苏联迫切需要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因此，在外交上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的日本就成为可与之开展战略和经济合作的对象。苏联也希望日本积极参与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因此，美国电影史家唐纳德·里奇评价，邀请黑泽明合拍《德尔苏·乌扎拉》“整个计划

① http://ru.wikipedia.org/wiki/Арсеньев,_Владимир_Клавдиевич

② 1974年，苏日合拍《莫斯科之恋》（Москва, любовь моя/モスクワわが愛），导演：导演：亚历山大·米塔（Александр Митта）和吉田宪二（吉田憲二），主演：栗原小卷（栗原小卷）和奥列格·维多夫（Олег Видов），联合出品：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

是苏联领导人对日本人献殷勤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日本参与西伯利亚——自然资源丰富但缺少金融资本的土地——资源的开发”^①

三、中国方面对《德尔苏·乌扎拉》的反应和批判

早在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两国政府就已经将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两国的政治宣传机器也完全抛弃了以往纯理论化的政治论战和隐讳式的政治攻讦，毫不掩饰地张扬己方的政治主张。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苏联电影的角色和作用自然发生了变化。上海工农兵电影译制厂革命造反派与复旦大学中文系《井冈战鼓》造反派联合撰写了题为《引进资、修影片，推行反革命复辟的大阴谋》的文章，文章质问：“十多年来大量引进的资、修影片，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这类影片肆意攻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把斯大林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诬蔑为‘没人性’。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丑化为十足的‘官僚主义统治’的天下。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全面的猖狂进攻，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开始大泛滥。苏修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不但大反斯大林，大反苏联卫国战争，大反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竭力散布‘战争恐怖’论和‘阶级调和’论，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三和’路线。”^②

从时间顺序上看，对苏联出资、黑泽明拍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德尔苏·乌扎拉》的批判最初源起日本国内、继而转移至香港文化界，而后才在中国内地引起重大反响的。

黑泽明与纳吉宾完成《德尔苏·乌扎拉》的电影剧本后，于1974年5月7日将其发表在日本《电影旬报》（キネマ旬報）（增刊，黑泽明专号）上。随后，先是引起了日本文化界的关注。“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在《日本与中国》周刊（1974年9月23日）发表文章，题为《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丑恶企图——明显的反华，国际性的大阴谋，连黑泽明都

① 唐纳德·里奇：《黑泽明的电影》，第276页。

② 《解放日报》，1967年6月25日。

拉拢》。文章称：“读了这个剧本，我们了解到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以反华为目的的政治影片，包藏着想动员世界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观众参加反华行列的丑恶企图。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但是我们重视这部影片，因为它暴露出他们想打着与黑泽明等人合作的幌子，把日本人民的命运拴在他们的战车上的罪恶阴谋。”^①该文指出影片的反华画面的情节：1、“如果这是一部抗议环境的影片，那倒还有点现代意义。然而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在末尾描绘杀害这位谁都喜欢的德尔苏·乌扎拉的场面，以便让人们看上去杀害他的罪犯好像是中国人。”^②2、电影恶意篡改《在乌苏里莽林中》的内容，处心积虑地把中国人描绘得卑躬屈膝和丑态百出的奴才相。原著中出现的背井离乡的天津老人李春平第二天离开营地时，把自己的手镯送给前夜请他喝茶的阿尔谢尼耶夫作为答谢，并对四方天地行大礼。电影中曾简化为“深深地向阿尔谢尼耶夫鞠躬，头都要挨着地了”，因此“这是秉承那些希望现代中国遵照这样的规矩行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领导人严厉的旨意办的”。^③3、影片中篡改乌苏里江流域原属中国并以汉语命名的领土标识，这在原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中处处可见。阿尔谢尼耶夫承认：“在乌苏里地区，河流、山脉和海岬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是因为，鞑子按鞑子的叫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叫法，而俄国人又给它们取了俄国名字。”^④

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在《日本与中国》周刊（1975年2月17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再论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所谓“合拍影片”，实际上是苏联影片，它恶毒地制造反华舆论，这部影片对日本来说也不容忽视》（中文译本即如此）。文章认为：“此片毫无疑问是苏联电影，只不过是聘请了号称‘世界电影界泰斗’的导演黑泽明。也就是说，苏联方面是让日本人来充当挨批判的活靶子”。^⑤该文指出电影中的反华情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66页。

② 同上，第167页。而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德尔苏·乌扎拉》中涉及到此问题时的表述是“凶手多半是一些俄国人。他们搜刮了德尔苏身上的钱，抢走了枪。”（参见《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82页）

③ 同上，第168页。

④ 同上，第118页。

⑤ 同上，第171页。

节，德尔苏·乌扎拉轻易地认出中国猎人和商人为了利益而设下置未成年的动物于死地的鹿寨和陷阱。因此，“德尔苏恶狠狠地骂中国人，因为他们既然放弃了鹿寨，却不设法用土把陷阱填平。”^①并透过阿尔谢尼耶夫探险队员的口说出：“一不提防，那些家伙（指中国人）指不定扩张到哪儿去呢！”^②该文揭露苏联政府“假借‘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名拉拢日本人，用开发西伯利亚作诱饵，企图迫使日本充当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跳板和走卒。日本人绝不上他们的当。我们也完全没有跟他们共命运的意思。”^③

此外，日本《东风》（東風）月刊（1974年10月号）也发表了署名“日本《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的文章《关于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背景——乌苏里地区》和《批判苏联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黑泽明导演将变成丑角吗？》。文章认为：“……电影剧本（定稿）是以这个故事展开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俄国领土为前提而写的，所以只能使人认为，中国人是流落来的，或逃亡过来的，要不就是入侵进来的！电影剧本里，中国人设陷阱乱捕野生动物，中国的毛皮商人、红胡子等等的‘野蛮行径’，的确是起了印证这一点的作用。”^④

日本《国际贸易》（國際貿易）（1974年10月19日出版）刊登了署名为“铃木猛”（日文为“鈴木孟”）的文章《彻头彻尾诽谤中国——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发动宣传》^⑤。该文的结论是：“在中苏边境问题受到各方面重视的今天，这部影片所具有的反华本质是不能忽视的。又因为这一阴谋也有日本人参加（不管是否自觉地参加），我们是不能毫不关心的。”^⑥几乎与此同时，香港《大公报》（1974年9月24日）也发表了署名为“龚念年”的文章《黑泽明·苏联·反华片》，提出了同样的结论：“这部彻头彻尾反历史、反人民、反中国的恶毒影片，目前尚未出笼，但是它的丑恶嘴脸清清楚楚暴露出来了。”^⑦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22页。

② 同上，第175页。

③ 同上，第175页。

④ 同上，第199页。

⑤ 该文于1974年12月2日转载于香港《大公报》。

⑥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212页。

⑦ 同上，第216页。

细查批判文章的作者，其身份虚实和政治态度值得思考。

“日本《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和“日本《德尔苏·扎拉》批判组”以及“铃木猛”是来自日本的批判声音，然而其不明的身份给时人和后人留下了些许疑惑。^①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无从查证，但从其文中使用的特殊词汇“苏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战车”以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对历史上俄国侵略中国的有关论述的方式来看，这两个组织应该是日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亲华团体。“铃木猛”亦不是常见的日本人名，较大可能是笔名而非真实姓名。

龚念年是香港《大公报》的著名国际时事评论家赵泽隆的笔名，他同时兼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国际评论作家。^②他的笔名还有梅之、尤其、龚耀文、施君玉等。此人精通英文、法文和日文，著译甚丰，译著有《延安 延安》（原作者丰田正子，香港华章出版社 1968 年出版），《伟大的道路》（原作者史沫特莱，三联书店 1979 年出版）《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一个英国外科医生的回忆录》（原作者洪若诗，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0 年出版），《苏联的海洋战略》（原作者大卫·费尔浩，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3 年出版）《北京漫笔》（原作者西园寺公一，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0 年出版）《美利坚帝国》（原著者法劳·朱立安，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1 年出版）《西哈努克回忆录——我与中央情报局的战争》（原著者诺罗敦·西哈努克，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5 年出版）。龚念年本人著有《东翻西看集》（1-12 册，香港大光出版社 1972-1975 年出版）、《西方大企业内幕》（香港四海出版社 1971 年出版）、《谍海浮沉录》（香港文教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美国黑人运动史》（香港义声出版社 1973 年出版）。从他的著译作品来看，此人是接近中共政权并持

① 《日本与中国》周刊是日中友好协会的内部会刊，发行量较小。1960年代中期，日中友好协会内部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而产生重大分歧，最终分裂为两个日中友好协会。另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刊是《日本与中国新闻》，该组织严厉批判中共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日中友好协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② 赵泽隆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季鸾奖学金”。随即到重庆《大公报》任翻译和编辑，负责编辑《大公晚报》。1949年5月，他南下香港，在香港《大公报》任编辑、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等职。直到90年代中期退休，才离开《大公报》，移民奥地利，2005年6月8日病逝在奥地利维也纳。为纪念他，燕京大学香港校友会出版了《赵泽隆文集选》。

反美反苏反帝立场的著名作家。

1975年3月，中国方面才正式和公开地对《德尔苏·乌扎拉》作出反应和批判。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小册子《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将日本两组织、铃木猛和龚念年的6篇文章收录其中。^①在“编者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个反华电影剧本一出笼，就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②因为，“苏修叛徒集团也不放过利用文艺为他们的扩张政策制造舆论。最近他们勾结日本资产阶级导演黑泽明炮制的影片《德尔苏·乌扎拉》，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电影剧本是根据沙俄军官阿尔谢尼耶夫的两本书改编的。苏修叛徒集团自以为得计，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剧本不但描述了老沙皇侵占我国领土的种种活动，而且也暴露了新沙皇今天对我国领土的野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③

《在乌苏里莽林中》的中文节译本最初出现在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中，摘译自1951年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Географиздат）的俄文版《在乌苏里莽林中》，全文仅2万字，目的是为了对照黑泽明编写的《德尔苏·乌扎拉》电影剧本。《反华电影〈德

① 《反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内容包括：1、《德尔苏·乌扎拉》电影剧本（全稿，叶维、文洁若根据日本《电影旬报》1974年5月7日刊载剧本翻译）；2、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丛林中》与电影有关段落的摘译（由北京大学苏修文学批判组翻译）；3、拍摄《德尔苏》是我三十年来的梦想（摘译）（黑泽明，载日本《电影旬报》1974年5月7日增刊，万兰译）；4、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丑恶企图——明显的反华，国际性的大阴谋，连黑泽明都拉拢（[日]《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原文刊载于日本《日本与中国》周刊，1974年9月23日）；5、再论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所谓“合拍影片”，实际上是苏联影片，它恶毒地制造反华舆论，这部影片对日本来说也不容忽视（《德尔苏·乌扎拉》研究会，1975年2月17日）；6、批判苏联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黑泽导演将变成丑角吗？（[日]《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日本《东风》月刊，1974年10月号）；7、关于苏联影片《德尔苏·乌扎拉》的背景——乌苏里地区（《德尔苏·乌扎拉》批判组，日本《东风》月刊，1974年10月号）；8、彻头彻尾诽谤中国——苏联借影片《德尔苏·乌扎拉》发动宣传（[日]铃木猛，转载自香港《大公报》1974年12月2日，原文刊载于日本《国际贸易》1974年10月19日）；9、黑泽明·苏联·反华片（龚念年，原载香港《大公报》1974年9月24日）；10、苏联延聘黑泽明拍摄反华影片（原载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74年10月号）；11、《德尔苏·乌扎拉》原著中有不少记述证明乌苏里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

②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5页。

③ 同上，第2页。

尔苏·乌扎拉)在当时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仅供县处级以上干部阅读。

1977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①全文翻译的1951年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在乌苏里莽林中》,翻译时参考了苏联“回声”(Эхо)等出版社的版本,凡与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1951年版本不一致之处,均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同时将作者自序和苏联汉学家什库尔金(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куркин)特别撰写的中俄文地名的说明翻译出来,附在中文版内。

中文版上册卷首附有编者1976年10月写的“出版说明”,该文特别强调,“阿尔谢尼耶夫是老沙皇殖民扩张政策的忠实鹰犬”,因为从“19世纪末起,阿尔谢尼耶夫就在沙俄军队中供职,从事军事考察活动,经常以‘旅行’、‘探险’为名,在沙皇侵吞的我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搜集军事、地理等情报,为沙俄侵略者统治和掠夺这一地区提供资料,出谋划策。由于侵略有‘功’,短短几年,他便从一个普通的士官学校毕业生晋升为俄军中校。同时,他还披着学者、作家的外衣,著书立说,推销他那一套沙文主义的黑货。”此外,“据作者自供,他的这些活动经费全部由军方提供,人员从陆军中抽调,并一再得到海军舰只的支持。在本书里,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极力丑化、污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真正主人——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各族人民,恬不知耻地颂扬沙俄侵略者的‘文治武功’,千方百计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尽管阿尔谢尼耶夫多方掩饰,他还是无法抹杀下列严峻的事实:‘考察队’所到之处,‘到处都能碰上中国人’,处处都是用中国各族语言命名的地方,古道是中国人开的,狩猎用的礁子房是中国人搭的;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一切的一切,全是中国的,而俄国移民却只不过是在‘异国的土地上’。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队’到处碰壁,完全淹没在中国各族人民仇恨的海洋之中。入侵者竖立的标记被拔掉,他们那些为侵略强盗树碑立传的地名根本得不到承认,‘只是标在地图上的,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阿尔谢尼耶夫这部书,在这些方面正是沙俄殖民

^① 参加译校的人员有王士燮、卢康华、张大本、张寰海、李石民、李景琪、沈曼丽、姜长斌、俞约法、黄树南、鲁桓。

主义者侵略扩张的一个可耻罪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对于研究沙俄侵略乌苏里地区的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①

尽管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事件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但编译者还是在“出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今天，苏修新沙皇正在‘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重温老沙皇的旧梦。他们怀着卑鄙的政治目的，更改远东地区的中国传统地名；他们狂热吹捧阿尔谢尼耶夫，说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又把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改编成反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到处放映，疯狂进行反华。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他们肆意篡改历史、美化老沙皇、制造舆论的丑恶表演。但是，新沙皇的这种卑劣行径，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终将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下场也决不会比老沙皇好一些。”^②

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中的“苏联形象”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珍宝岛冲突当年连续摄制完成了反映苏联当局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华挑衅、中国边防军民予以坚决回击的纪录影片《新沙皇的反华暴行——苏修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的挑衅》^③和《珍宝岛不容侵犯》^④两部影片。

1970年代，为反击苏联的文化攻势，中国也拍摄了一些反特（苏）影片，如《熊迹》、《黑三角》、《东港谍影》、《猎字99号》和《傲雷·一兰》^⑤等。有趣的是，同样是惊险样式的反特片，与50-60年代的《秘密图纸》、

①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翻译：《在乌苏里莽林中》（内部发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上册，出版说明，第1-2页。

②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翻译：《在乌苏里莽林中》（内部发行），第2页。

③ 《新沙皇的反华暴行——苏修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的挑衅》，编导：郝玉生、应小英，摄影：封永迎、张家渊、任福棠、陈凯初、温炳林、李连祥、吴余华、李学明等，1969年。

④ 《珍宝岛不容侵犯》，编导：郝玉生、王程帆，摄影：封永迎、苏德福、吴金华、刘锡喜、王锡朝等，1969年。

⑤ 《熊迹》：导演赵心水，长春电影制片厂1977年出品；《黑三角》：导演刘春霖、陈方千，北京电影制片厂1977年出品；《东港谍影》导演沈耀庭，上海电影制片厂1978年出品；《猎字99号》：导演林默予，八一电影制片厂1978年出品；《傲雷·一兰》：导演汤晓丹，上海电影制片厂1979年出品，该片获得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

《铁道卫士》、《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虎穴追踪》^①等影片中的“特务形象”有较大差异，特务不再是来自美国或台湾，而是来自于“北方某国”、“北方某邻国”和“北方某大国”。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谁都知道“某国”指的就是苏联，因为电影中的特务和间谍的名字不是叫“彼得罗夫”，就是叫“伊凡诺夫”，特务接头的暗号也经常是具有苏俄特征的“白桦林”、“天鹅湖”、“北极熊”等。最终，5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苏联老大哥”、苏联“红色灯塔”、“国际共产主义首都”形象退隐，“苏修特务”、“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叛徒”形象登场。

四、《德尔苏·乌扎拉》的奇异命运

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家、亦是著名影像史家的马克·费罗（Marc Ferro）认为，研究电影时，“要把电影和生产它的社会结合起来考察。让我们假设，无论是否忠实于现实，无论资料片还是故事片，无论情节真实可靠还是纯属虚构，电影就是历史。”“一部影片，无论什么类型，都含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每一部影片，除影像本身所展现的事实外，都能帮助我们触动历史上某些迄今仍然藏而不露的区域。”^②

“电影毕竟是一种电影艺术”^③，这是《德尔苏·乌扎拉》电影剧本发表时，黑泽明写在前言里的一句话。他还声辩：“作为国际电影工作者，我们是站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口号‘为了电影艺术里的人道主义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这个立场上来拍摄这部影片的。我坚决表示不愿把政治搬进影片中去。”^④

对于来自中国的猛烈批判，黑泽明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1974年5月7日出版的日本《电影旬报》增刊上曾著文表达了这一担心：“难办的事情

① 《秘密图纸》：导演郝光，八一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铁道卫士》：导演方荧，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国庆十点钟》：导演吴天，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羊城暗哨》：导演卢珏，海燕电影制片厂1957年出品；《虎穴追踪》：导演黄粲，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

② 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19-20页。

③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2页。

④ 同上，第2页。

之一是对中国人的处理办法。从写剧本的时候起，这就已经成了问题。只有读一下原作和电影剧本就能知道，阿尔谢尼耶夫探险的那个时期，乌苏里是和中国国境没有划清的地区。……然而现在，中苏问题与其说是微妙的，毋宁说已经是极其严重的，因而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在电影剧本里就成了问题。我自认为写得公平，对方却说我过于出力描写好的中国人了。……对中国人的处理方法是（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也非常关切的。在编电影剧本的期间，这是最困难的问题。”^①这里说的对方是指“苏联”。

对于黑泽明而言，他无意介入中苏两国两党之争。他一再强调：“把当前的政治搬进电影里，不是错误的吗？”^②黑泽明创作剧本和拍摄电影的第一标准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关注的是青年时代就心驰神往的西伯利亚“那些有着令人惊异的宽阔而优美的大自然景色”，^③黑泽明关注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亦是他改编原著的基本原则。对于身居艺术象牙塔里的黑泽明来说，他或许是无意间介入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说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之中。

政治毕竟是政治，电影不仅仅是电影，尤其是在冷战大背景和中苏关系严重紧张乃至冲突的年代。苏联方面投巨资并邀请国际著名导演拍摄《德尔苏·乌扎拉》的首要目的，显然不是为艺术而为政治。中国方面评价此部电影的首要标准，显然也不是艺术而是政治。

而游记《在乌苏里莽林中》和《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也是无意间被国际关系裹挟在其中，经历了“国家间政治”的云谲波诡。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事隔三十年后，《德尔苏·乌扎拉》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命运，形象发生了改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在乌苏里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1902-1906年锡霍特山区考察记》。此版沿用当年由王士燮、沈曼丽和黄树南等人翻译的版本^④。此版图书还附上了苏联画家库兹涅佐夫为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在1970年出版的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所配的22幅彩色插图，书末附上文中提到的大量植物与鸟类的彩

① 《反华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第165页。

② 同上，第165页。

③ 同上，第4页。

④ 同年，台湾胡桃木文化有限公司引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并出版。

色照片。在书的封面上标明：“黑泽明经典影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德尔苏·乌扎拉》原著·可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一位乌苏里‘人猿泰山’的世纪悲歌”。在该书的扉页介绍栏中，编者再次特别强调《在乌苏里莽林中》“是一部可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再次提及“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引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①，但却无片言谈及当年中苏两国因这部书和电影引发的文化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1975年商务印书馆版本，新旧“译者前言”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主要译者、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组长、现为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的黄树南撰写了新的“译者前言”。黄树南教授经历了当年中苏关系的风云变幻，更亲身体会了这部译作的多变命运。但是，他在新“译者前言”中还是回避了当年中苏之间的“德尔苏·乌扎拉”之争，仅仅提及“1975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把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特别强调，“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乌苏里地区及其原始森林，当时还处于没有遭到破坏和污染的原始状态，对广大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题材的新颖、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细致入微、严格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描写的准确生动、文笔的清新自然是阿尔谢尼耶夫创作的特色”。“《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还着力刻画了一位传奇性人物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德尔苏·乌扎拉是当地的一名赫哲族猎人，曾为阿尔谢尼耶夫做过向导。他孤身一人，以原始森林为家，独来独往。他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绝技，能根据各种征兆准确预测天象，能根据踪迹辨认人兽的活动，能在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地逃脱厄运，奇迹般地生还。他多次救过阿尔谢尼耶夫和考察队员们的生命。他善待生灵万物，认为一切都有生命，与飞禽、走兽、草木为友，虽然以狩猎为生，都绝不滥杀滥捕。在当今世界，生态平衡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阿尔谢尼耶夫早在上世纪初，就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这个形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呼吁人们保护自然，这是难能可贵

^①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莽林中》，封面及扉页。

的。”^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乌苏里莽林中》在2005年2月首印7000册，结果到当年年底全部售罄。

《德尔苏·乌扎拉》的波折命运是典型的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国家间政治”的副产品，也是曾经有较大程度同质化的中苏两国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在当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笔下，它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即：“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文化传播来让其他国家想己之所想”^②，但也可能是落入了大名鼎鼎的苏联问题和中国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预言的“崛起之后的自我错觉”^③陷阱之中。

东西方冷战和中苏冲突年代背景下苏联与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与“苏联形象”，既存在着对抗性，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即此时期电影中所展现的“对方形象”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借以彰显己方的“伟大”、“正确”和“正义”。游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与电影《德尔苏·乌扎拉》无疑都是优秀和伟大的作品，时间足以证明它们的价值。但是，它无法置身于“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之外。或许这一事件再次为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那句著名的史学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作了绝妙的注解。

【 Abstract 】 “China’s image” in Soviet films is an important theme no matter when Sino-Soviet relations are good or bad. It varied with the changing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Dersu Uzala*, the Soviet film produced in 1975, and “China’s image” in it, became significant cultural ev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ino-Soviet political conflicts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The tortuous fate of *Dersu Uzala* is not only a by-product of special times for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politics among nations”, but also a normal phenomenon for political culture between two homogenized countries.

① 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莽林中》，译者前言，第4-5页。

②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1990, Vol.80, No.5, p.166.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 Key Words 】 Sino-Soviet Relations, Dersu Uzala, China's Image, Anti-China Films

【 Аннотация 】 «Образ Китая»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в советском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период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дружбы, но также и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ыли не на лучшем этапе сво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н менялся вслед за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ышедший в свет в 1975 г. советский фильм «Дерсу Узала» и отражённый в нём «имидж Китая» стал важным культур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в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и в военн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Поворотная судьба «Дерсу Узала» стала побочным продуктом особой эпох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нормальным явлением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и однород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ультур двух стран.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ерсу Узала», имидж Китая,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е фильмы

(责任编辑 王海燕)

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胡腾蛟**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捍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利用各种可能的媒介手段对苏联形象进行系统的歪曲，将其描述为“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总的看来，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话语结构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与“扩张”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藉此反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美国对苏形象宣传在本质上是一种歪曲与颠覆。

【关键词】冷战 美苏关系 敌人形象 塑造

【中图分类号】 D7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5)02-0046(30)

*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冷战背景下美国图书的海外传播及其形象宣传研究（1945-1961年）”（项目批准号：14YBA017）和长沙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争夺心灵的利器：冷战时期美国之音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项目批准号CDJJ-12020203）的阶段性成果。

**胡腾蛟，长沙学院，副教授。

敌人形象，即指“对‘他者’非常消极而带有偏见的评价”。当极端威胁出现时，“他者”也就转变成为“敌人”。^①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日趋恶化，美国在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中逐渐将苏联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不遗余力地对苏联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歪曲，建构所谓的“敌人形象”。总的来看，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deconstructing）话语当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红色殖民主义”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②充当主要的形象塑造者，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大量的宣传材料，系统地刻画了苏联“独裁落后”和“红色殖民主义”^③两大形象。目前，学界对敌人或他者形象的研究着墨不多。^④笔者拟利用美国官方新近解密的档案^⑤，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早期美国如何塑造苏联“敌人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梳理，从一个新的层面透视美苏冷战形态。

① Ragnhild Fiebig-von Hase and Ursula Lehmkuhl, *Enemy Images in American History*,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7, p.2.

② 美国新闻署于1953年8月成为独立机构，此前隶属美国国务院，称为国际新闻署（IIA）。其海外分支机构称为美国新闻处（USIS）。

③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DDRS.

④ 代表成果主要有：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Emanuele Castano, Simona Sacchi, Peter Hays Gries,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or the Polarizing Effect of Entitativ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3, Vol.24, No.3; Emesto Laclan, "On 'Real' and 'Absolute' Enemies",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2005, Vo.15, No.1; Rodney Barker, *Making Enemi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敬菁华：“浅析‘外族敌人’形象在俄罗斯文化中形成的心理机制”，《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3期；张建华：“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张建华：“政治动员背景下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张建华：“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陈余：“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文献主要来源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以下简称DDRS）和美国国会文献集（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数据库。

一、冷战与苏联“敌人形象”的确立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苏维埃俄国宣告诞生。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美国很快将苏俄看作自己的敌人。著名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分析道：“最初在1917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西方国家被迫暂时放弃对苏意识形态偏见，转而奉行战略合作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变。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决策者面临着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合作吗？然而，1945年7月，在与斯大林的首次会晤中，杜鲁门“深受斯大林产生的氛围所干扰”，他上台后，“确信战后世界是敌对的”，^②因此，美国政府不再继续将苏联当作战略盟友，而是逐渐“强化了自1920年代形成的‘苏联敌人形象’”。^③

1946年1月22日，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的长电文，呼吁实施“遏制”政策，美国政府开始强化对苏意识形态攻势。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演说，他强调：“战争之所以发生，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④这次演说被华盛顿众多官员解读为一种“挑衅行为”。保罗·尼

① 文安立著、牛可等译：《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1页。

② Roberts, Walter R.,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Past Practices, Present Conduct, Possible Future*,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007, Vol.18, No. 4, pp.36-52.

③ 张建华：“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④ 转引自[美]梅尔文·P·莱弗勒、孙阅欣等译：《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茨 (Paul Nitze), 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的制定者, 将其称为“迟到的战争宣言”。^①实际上, 斯大林此时并没有决心与美国为敌。弗兰克·科斯蒂里奥拉 (Frank Costigliola) 为此解释道: “认为1945至1946年期间斯大林对美政策是矛盾的这种说法是可靠的。他似乎沿着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确定的立场, 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进行大国合作。然而他也怀疑, 由于罗斯福的去世, 美国 and 英国将会骗取他在战争中已获得的收益。他因此准备在单边的基础上追求苏联的安全, 导致与美国和英国的疏远但并不必然与之敌对。”^②

斯大林的迟疑显然没有被杜鲁门当作是一种维持双边合作的机会。1947年3月12日, 杜鲁门呼吁国会对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进行援助, 同时鼓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 冷战由此爆发。事实上, 希腊、土耳其、伊朗已沦为美苏双方敏感的宣传战场。临近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苏联电台“民主军队”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将希腊当作“攻击苏俄的军事基地”, 苏联必须充当“人民民主”的捍卫者。而在土耳其, 从1945以来, 苏联及东欧的电台不断地宣称“美国正统治着这个国家, 正在向土耳其人民贩卖华尔街‘帝国主义’”。^③美国政府渲染苏联的扩张行径严重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 遏制苏联的思想逐渐浮出水面。迈克尔·克伦 (Michael L.Krenn) 指出, 早在1946初, 作为昔日盟友的苏联, 已被美国看作是“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而到1947年初, 由于希腊问题, “反苏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已经成型”。^④诺曼·格雷布纳 (Norman A.Graebner) 对美国的此种行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究, 认为此时美国奉行

① Robert P. Newman, “NSC(National Insecurity)68: Nitze’s Second Hallucination”, in 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e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 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 2000,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p.63.

② Frank Costigliola, “The Creation of Memory and Myth: Stalin’s 1946 Election Speech and the Soviet Threat”, in Martin J.Medhurst and H.W.Brands, e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 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 2000, pp.38, 47.

③ [Near East] Factors Significant for or Conditio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U.S. Information Program. IV. Greece, Turkey, Iran. Report. Department of State, Jan 28, 1949. CK3100425795.DDRS.

④ Michael L. Krenn. ed., *Race and U.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iami,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8, p.189.

的反苏政策是建立在“慕尼黑综合症”之上的，将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①

苏联的实力相对有限，但美国决策层轮番强调它“统治世界”的野心。1948年3月30日出台的NSC7号文件、11月23日的NSC20/4号文件，都认定苏联的目标是“统治世界”^②，意味着美苏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压倒了双方的地缘政治考量。

随着美国在战略上强化对苏联的敌意，苏联在对外宣传中逐渐将美国当作主要的攻击对象。1949年11月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表纪念十月革命32周年的演讲，斥责美国寻求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这样一份将所有的国家和大陆美国化的丧心病狂的计划，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希特勒和戈林首先寻求欧洲德国化、尔后整个世界德国化的疯狂计划呢？”演讲最终将美国塑造成为“对人类的生活、自由和快乐构成严重威胁的令人恐惧的形象”，标志着战后苏联的宣传攻势主要从针对德日转向了针对美国。^③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东西方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强化。4月，美国NSC68号文件出台。作为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强调苏联帝国意欲摧毁西方文明本身。^④在美国看来，任何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家都是民主自由的致命威胁，都是美国的敌人，而苏联正在扮演这种危险的角色。因此，美国必须对苏联加以全面遏制。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苏、中走向全面敌对。1950年成为“冷战的不归点”。^⑤

① Norman A. Graebner, “Myth and Reality: America’s Rhetorical Cold war”, i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 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 pp.25-26.

② “U.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 Security”, NSC20/4, 23 November 1948,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US, 1948, General; the United Nations (in two parts), p.663, Histor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CK3100280 463, DDRS.

③ 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49-54.

④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68.htm>

⑤ Robert P. Newman, “NSC(National Insecurity)68: Nitze’s Second Hallucination”, p.61.

与美国遏制战略相呼应，美国不断指责苏联丑化美国形象的宣传行径，逐渐转向“强势的（hard-hitting）反共宣传”。1951年1月21日，美国宣传决策咨询机构——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认定苏联正在发起密集的“仇恨美国（Hate-America）”宣传运动，肆意丑化美国的形象：“一位苏联发言人声称发现了‘新的档案’，证明‘美国人的手上沾满了俄罗斯人民的鲜血’。在演讲数小时之后，苏联报刊充斥着所谓的档案、相片、目击者的证词、统计资料、历史分析，全都严厉地斥责美国佬的血腥之手。……控诉美军自1918年苏俄内战以来对其的干涉，……同样的事情正在朝鲜上演。以‘事实’的技巧建构美国暴行的虚假历史。美国干涉主义者彼得斯在乌格诺沃亚（Uglovoye）村庄抓捕党员博卡列夫（Bokarev），枪杀并埋葬了他。在这群暴徒离开之后，他的母亲和妻子挖出了他的尸体，她们几乎认不出他的面貌。他的脸部已被毁坏。耳、鼻和嘴已被割掉，下巴已被打落，头颅已被刺穿，眼睛已被挖出，整个身体已被砍断烧毁。另一则‘事实’描述了一群美国人用一位女人的头发塞满她的喉咙，尔后在其喉咙上戳穿一个洞，将头发从中扯了出来。”^①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医生都收到了一份由北京中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委员会（Chinese People’s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印制的档案“美国政府从事生物战犯罪行径的证据”，内容为中共俘获的美国战俘的声明和坦白，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行径。^②

上述举动无疑加剧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反击苏联心理宣传战政策的重要依据。1952年7月24日，美国制定NSC127/1号文件。这是一份美国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案，表明它对苏联这个敌人作了最坏的预想。NSC59/1号文件^③第6份进度报告（涵盖时间为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1月31日）显示，负责国家安全政策执行的部际协调

① “Seventh Semiannual Report of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Feb.23, 1953, p.12,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② “Communist Propaganda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IX-External Propaganda Media, CK3100237873, DDRS.

③ 1950年3月10日杜鲁门批准“对外信息项目和心理战计划”（NSC59/1）。

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要求对苏联的“仇恨”宣传展开调研，为美国揭露与反击此类宣传确定政策框架。^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强调，出于反击苏联持久宣传的需要，美国政府必须理解共产主义关于“美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的宣传主题，应持续宣传“共产主义是撒谎者”的消极主题。^②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德·巴莱特（Edward W.Barrett）于1951年3月提出“心理战紧急计划（苏联）”，对美国信息项目的宣传主题加以调整，要求美国之音全面揭露“苏联政策及其后果的残酷性”。^③美国国务院关于“共产主义敌人”形象的宣传也全面上演。国务院1952年10月1月出台的报告显示，“揭露共产主义关于美国和自由世界总体宣传的荒谬性”成为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USIE）的主要任务。在过去的宣传中，美国71个驻外使馆将共产主义界定为“民主的首要的意识形态敌人”，揭露“共产主义帝国主义”。^④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先后向西方递出了和平橄榄枝。但美国决策者将苏联的缓和行动视为“和平攻势”与“和平策略”，认为它更加邪恶。1953年10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认为，苏联统治者仍然秉持着“共产主义集团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这一基本信念；苏联的基本目标仍然是“继续巩固与扩大其权力范围和最终统治非共产主义世界”。^⑤1957年6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5707/8号文件强调美国“从军事的角度”将核武器视作“常规武器”。^⑥文件宣称，美国发

① “Psychological Warfare Planning (NSC 59/1)”,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Program and Note, James S. Lay, Jr., Exec. Sec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eb.20, 1953,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p Secret. CK3100395581, DDRS.

② Sixth Semiannual Report of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July 1, 1952, pp.7-12,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③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3.

④ “Analysis of U.S. Ambassadors' reports throughout the world”, Report.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1, 1952, CK3100101175, DDRS.

⑤ “NSC 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ober 30, 1953)”,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c-hst/nsc-162-2.pdf>

⑥ “NSC 5707/8,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June 3, 1957, FRUS, 1955-57, 19, pp. 507-524.

展核武器是为了捍卫世界和平,阻止共产主义将世界拖入大战之中,消除“世界紧张的根源”。可见,对共产主义持久的敌意仍然弥漫在美国决策之中。1959年,NSC5811/1号文件要求美国继续利用“共产主义的弱点”,尽可能地实施各类行动,以“削弱由民族主义自豪与理想培育出来的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声望与影响”,通过“持续利用南斯拉夫独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案例,以及采取相似的行动以危害或削弱”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揭露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与邪恶”。^①因此,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退出冷战此时已无可能。

不难看出,敌对性的观念在美苏双方相互猜忌中螺旋式上升,进而形成了结构性平衡的“冷战图式”。对此,马修·赫什博格(Matthew S.Hirshberg)指出,冷战模式的信奉者将世界事务看作是“美国与苏联、民主与共产主义、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邪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决。与“邪恶、压迫的”共产主义形象相反,“仁慈、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形象深入持久。^②这种二元对立的敌我形象认知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并且因为危机事件而时常凸显。因此,“敌对关系的心理”无疑成为整个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主宰。

二、“独裁落后”

就内部形象塑造而言,美国将苏联界定为“独裁者”,代表着“落后”与“邪恶”。在实际宣传活动中,美国炮制大量的材料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低劣”,认为这是造成了苏联人民“生活困苦”与“精神压抑”的根源。藉此向世界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满足人的需要与捍卫其尊严上的“优越性”。

(一)“经济落后”

苏联经济相对落后、消费品相对短缺的事实成为美国官方极其重要的宣

^① “Report on Soviet-dominated nations in Eastern Europe”,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 Jan 7, 1959, CK3100265347, DDRS.

^② Matthew S. Hirshberg, “Consistency and Change i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Political Behavior*, 1993, Vol.15, No.3, pp.250-251.

传主题。美国借此谴责共产主义制度的“低劣性”，旨在表明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民众创造“富足”的生活。1956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 NSC174 和 NSC5501 两份文件的进展情况，主题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苏联东欧卫星国的弱点”。副国务卿胡佛谈及他的2月柏林之行，认为90%的东德人都愿意投票支持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因此，美国应宣传“苏联在东德的所作所为充满罪孽”，这是“苏联铠甲上的弱点”。他还发现西柏林人“丰衣足食”，“对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所取得的境遇感到自豪”，胡佛因此断言西柏林是“世界上反共最彻底的地方”。艾森豪威尔总结说，“将维持解放东欧卫星国的希望作为我们的动力是极其重要的”。他进而要求将西柏林建设成为“繁荣的橱窗”，向其居民输送大量的牛排、猪肉和大米，充分展示美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物质”。^①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弱点”，主要是指苏联消费品的匮乏。

在经济方面，新闻署对苏联农业集体所有制及农业政策层面的缺陷展开集中攻击。1953年，新闻署报道“由于卫星国大众的抵制，苏联承诺推动‘改革’与‘让步’，特别是承诺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苏联政府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承诺而承担义务”。^②为了反击“共产主义改善社会和经济”的宣传，1953年，新闻署联合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举办了四场大型展览《铁幕后面的生活》，参观者逾200万。^③新闻署除了宣传“苏联人民同样经历着低工资、加速生产、无法容忍的警察控制”等内容外，还反复强调“卫星国地区的动乱源于严酷而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并且利用卫星国的发展态势“鼓动大众对苏联官方的宣传持批评态度”。^④1955年，新闻署“特别强调苏联

① Discussion at 3/22/56 NSC meeting: U.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satellites in Eastern Europe; exploitation of Soviet and European satellites vulnerabilities; Secretary of State reports on SEATO meeting; implications of anticipated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rogram.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P SECRET. Mar 22, 1956, CK3100232035, DDRS.

②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③ Ibid.

④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农业政策的问题与失败，以及当局为了大幅度提高食品生产而采取的措施的不稳定性”。^①

美国大量的宣传材料强调苏联的“经济落后”和“物质匮乏”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严重挫伤了苏联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与向往：“家庭生活的文化影响与自主性已经被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规范、物质需求和母亲必须工作、强迫性的政治活动以及将小孩作为其父母亲的告密者所破坏殆尽。”^②新闻署宣传手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女性》（*The Soviet Woman Under Communism*）直白地反映了这一点。手册详细描写了一个名叫尼娜·札伊采芙的苏联妇女的日常生活，将其刻画成苏联妇女生活的缩影。尼娜当年30岁，与工人伊凡结婚，育有两个小孩。一家四口与另外三家蜗居在一套四房间的公寓内。上班期间，小孩由工厂日托所照看，晚上下班后才接回家。尼娜必须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来到市场，排队等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购买“孩子的奶粉、一片奶酪、些许枯萎的蔬菜、一片黑面包和一些茶叶”。尼娜几乎买不起肉，即使买了，也无法“确保它的质量或得到清洁的处理”。手册最后谴责共产主义制度使苏联女性失去了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可能，成为“精神与肉体都被俘虏”的“国家的奴隶”。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是一种“饱受折磨和精神困苦沮丧的无休止的循环”。^③

（二）“政治独裁”

美国将“政治独裁”界定为苏联社会的“本质特征”。各类宣传材料对此进行了极其夸张的叙述。“一党专制”、“政治压迫”、“钳制思想”，成为美国政府歪曲苏联政治形象的最典型表述。

关于“一党专制”，1952年5月，美国之音将“斯大林顽固而牢靠地控制权力”与“杜鲁门不适宜再参加总统选举”进行大张旗鼓的比较，强调“国际新闻署基于人民的意志阐释美国对外政策，不可能因为选举结果的改变而

①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② Vulnerabilities of the European satellites summarized. White House. Secret. CK3100287456, DDRS.

③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151-152.

改变”。^①与此相呼应，1954年，美国之音在报道苏联的选举时说：“很难理解民主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这里没有争论。……供选民选举的是由共产党精心挑选出来的唯一候选人。很难理解为何还被称之为立法机构，既然不要求代表提议新法律，那么就仅仅是一种听从政治局或内阁会议命令而采取的橡皮图章行动。”^②

关于“政治压迫”，对美国宣传者而言，共产主义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对人民的生活实施“严密的监控”，无疑是“反动独裁的”。1953年，国际新闻署发布一份制裁名单《你不能赢!》(You Can't Win!)，上面圈定的37名“意识形态犯罪分子”受到了东德法律的制裁。名单上所谓的“帝国主义分子”则包括“任何反对苏联政策的人”和“反对苏联政策的任何人”。^③

关于“钳制思想”，新闻署诬称共产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非民主、非自由的”，“扼杀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的举动依托学校教育系统完成。1952年，海外新闻处发布宣传手册《苏共对教育的威胁》(Soviet Communism Threatens Education)，“揭露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教育手段实现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与奴役”：“共产主义政权的目标之一将是学校系统。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要想生存就必须摧毁自由的思想。当民主在一个自由的民族内运转时，共产主义必须拥有盲目的、没有思想的臣服者。共产主义者通过严密管制的命令和对自由思想的残酷镇压来确保人民的臣服。”^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代表作《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成为美国反共宣传最重要的工具，甚至由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Committee)“钦点”改编。《动物庄园》旨在“揭批苏联神话，进而推进到谴责一切暴君的高度”。完成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同样是一部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发出警告的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起，美英两国政府联手扩大这两本著作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以“揭露共产主

①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78-79.

②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108.

③ Ibid, p.110.

④ Ibid, pp.107-108.

义的极权本质”。至50年代末，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共产主义国家除外）的162个城市的图书馆内都收藏有《动物庄园》。西方宣传者还处心积虑地要将这两本著作渗入东欧地区，以期影响东欧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至冷战结束之际，《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销售4000万册。两者还多次被美国改编成电视和电影，译成多种语言后在世界各地放映。1950年，奥威尔去世后不久，美国中情局从其遗孀手中购买了《动物庄园》电影改编权。1952年1月，电影脚本送至心理战略委员会评估，委员会为此确定的宣传立场为“务必控诉苏联政权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者”，从而不惜对原著精神作了重大篡改。《一九八四》的改编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两本书的广泛传播，的确与美英两国政府的强势推动密不可分：“有史以来没有哪一本著作被挑选出来受到伦敦和华盛顿如此对待”。^①

（三）“精神迫害”

鉴于“物质力量无法替代信仰”，美国在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强化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建构，以满足“总体外交”的需要。在这种战略考虑之下，1951年，美国决策者制定关于在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中发展精神与道德因素的政策，强调在实际宣传中应以“客观实际的方式”揭露“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偏狭而寡廉鲜耻的手段”。^②

关于“共产主义对精神和宗教自由的威胁”的材料，如《你应该了解共产主义在宗教方面的100件事》（100 Thing You Should Know about Communism in Religion）、《佛教与共产主义》（Buddhism and Communism）、《苏联内部的冲突》（Ten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含“共产主义对宗教团体的迫害”内容）、《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向宗

^① Greg Barnhisel, “Cold Warriors of the Book: American Book Programs in the 1950s”, *Book History*, 2010, Vol.13; Tony Shaw, “‘Some Writer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George Orwell, the State and Cold War Privilege”, in Rand Mitter & Patrick Major, ed., *Across the Blocs: Cold War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 Portland: Frank Cass, pp.150-152. 参见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读书》，2002年第5期，第96-103页。

^② Development of a policy for dealing with moral and spiritual factors and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USIE) program.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 Jun 22, 1951, CK3100210894, DDRS.

教开战的共产主义》(The Communist War on Religion)等,广为传播。^①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被美国解读为苏联对其他宗教的“残酷镇压”。例如,在整个东南亚传播的宣传手册《苏联枷锁下的佛教徒》(Buddhism Under the Soviet Yoke)描述了苏联是如何对僧尼进行迫害的,包括强行没收其寺庙财产、禁止焚香祭拜、以及购买香烛等祭品。^②1954年,在锡兰,新闻处精心炮制了特殊的隐蔽性手册,以解释“共产主义的反宗教性”。^③新闻署还刻意宣扬穆斯林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美国之音在阿拉伯世界播报了长达9个小时、包含16个系列的节目《伊斯兰和共产主义》(Islam and Communism),揭露“共产主义对穆斯林的压迫”。新闻处制作的《苏联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行动》(Genocide of Muslims in the USSR)在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传播;《苏联训练的伊玛目正在向伊斯兰渗透》(Soviet Trained Imams are Infiltrating Islam)和《将伊斯兰贬斥为邪恶的苏联宣传手册》(Soviet Pamphlet on Islam Denounced as Evil)则通过巴士、航空公司和旅行机构向麦加朝圣者散发。^④这些材料无一例外地强调苏共的反伊斯兰形象。

尤其要提到的是,美国大肆炒作匈牙利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Jozsef Mindszenty)事件,宣称苏共对宗教充满“仇恨”,是“精神与人性的压迫者”。1948年12月27日,匈牙利政府宣布逮捕明曾蒂及13名教徒,指控他们从事“阴谋、叛国以及非法的货币交易”行径。美国国务院命令美国之音将此案塑造成为铁幕背后“摧毁个人自由”的证据。美国之音立即模仿苏联的语调,揭露“苏联查封清真寺、禁止穆斯林参加世界性集会与朝圣活动,以及清洗苏联境内伊斯兰领袖的事实”。^⑤天主教制作的12.6万份漫画手册《对红衣主教明曾蒂的审判》(The Trial of Cardinal Mindszenty)送到了马

① Sixth Semi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January 8, 1952, p.10,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②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107.

③ Progress report on NSC 5409,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prepared by the OCB.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Jul 29, 1954, CK3100132901, DDRS.

④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314.

⑤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103.

尼拉。好莱坞还以明曾蒂为原型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展现了“共产主义的不公正和天主教遭遇的清晰而令人关注的形象”；另一部则描述了一名匈牙利音乐教师由于拒绝让其班上的学生在逮捕明曾蒂的请愿书上签字而被共产主义政权折磨至死的情节。此类关于“独裁政权迫害教徒”的主题电影无非是为了体现“共产主义东方的强迫性无神论”与“民主西方的宗教和政治自由”是如何的不同。^①

（四）“人民的地狱”

对苏联人民话语的解构成为美国宣传的又一个重要层面。美国大量的宣传材料攻击苏联的“经济落后和政治压迫”，说它非但不是“工人的天堂”，反而是“人民的地狱”。1952年1月，另一家宣传决策咨询机构——美国教育交流顾问委员会（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ducational Exchange）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表明，《强迫的苏俄劳工》（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苏联劳动法的要素：俄国工人在工作中遭受的惩罚》（Elements of Soviet Labor Law: Penalties Facing Russian Workers on the Job）等在海外获得了广泛的宣传。^②1954年，国际新闻服务处（IPS）面向海外输出的54本专题集中，同样包括《强迫的苏俄劳工》一书，继续“揭露共产主义的黑暗面”。^③这些宣传材料“揭露”苏联工人过着非常糟糕的生活，他们被迫劳动，动辄接受严苛的劳教、体罚，“毫无人权可言”。所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共产主义社会是“工人的伊甸园”，是完全不存在的。

冷战早期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挑唆和鼓动，苏东国家一部分民众逃至西欧等地，寻求“自由世界”所谓的美好生活。美国政府将这一部分群体称之为“叛逃者（defectors）”。仅在1953年，就有多达

① Tony Shaw, “Martyrs, Miracles and Martians’: Religion and Cold War Cinematic Propaganda in the 1950s”, in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211-226.

② Sixth Semiannual Report on Educational Exchange, January 8, 1952, p.19,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③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12.

7000名“叛逃者”被美国成功地安置在海外。^①“叛逃者”群体成为美国宣传机器解构苏联社会形象的主要手段。1948年7月16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向驻东欧和苏联的美国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就是否将来自“铁幕国家”的政治难民作为美国之音的宣传素材一事进行咨询，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美国驻苏大使解释说：“来自铁幕后面的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政治难民不应该被利用……在目前情形下，美国之音使用任何政治难民的材料将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将毫无疑问地激发他们的不满和对我们广播的嘲讽。”在大规模实施心理战之前，这是美国官方最后一份拒绝公开利用政治难民进行宣传的文件。^②然而，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迅速恶化，“叛逃者”很快沦为美国政府向苏联施压、“体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工具。1951年4月3日，NSC 86/1号“美国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叛逃者的政策”（U.S. Policy on Soviet and Satellite Defectors）出台，强调利用苏东民众的“叛逃”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③

按照美国决策层的意图，新闻署在鼓动苏联民众叛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它的宣传价值，强调美国为难民提供可靠的庇护政策，表明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其提供锦绣前程。^④为了推动NSC86/1号文件目标的实现，美国电台聚焦“叛逃者”的福利，展示他们“在自由世界中过着成功而具有建设性的生活”。^⑤关于叛逃者之于美国宣传的意义，1955年3月新闻署的报告进行了很好的强调：“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心理发展就是约瑟夫·斯威斯特

① Report on the U.S. Escapee Program for refugees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free world. White House. SECRET. Aug 17, 1954, CK3100103659, DDRS.

② Richard H. Cummings,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1950-1960*, Jefferson, North Carolim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ybkusgers, 2010, p.7.

③ Report to the NSC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n U.S. policy on Soviet and Satellite defector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P SECRET. Apr 3, 1951, CK3100062072, DDRS.

④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⑤ Appraisal of status of key USIA programs in various areas as of 6/30/5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1, 1955. NSC5525, Part 6, CK3100309162, DDRS.

罗的背叛为新闻署在东欧的活动提供了很有效的材料。”^①

在美国宣传者看来，正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非人性”造就了苏联劳工的“非人”的生活，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逃离“残酷”的统治。1952年5月22日，美国各海外新闻处流通的《迈向败亡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s Losing)描述了“成千上万惨遭蹂躏的人民逃离了所谓的‘工人的天堂’”的“残酷事实”。^②新闻署出版的连环漫画册《逃向自由的他们》(They Escaped to Freedom)描述了“叛逃的理由”。这份手册讲述了13名东德工人在捷克青年律师卡内尔·哈维利克的帮助下“大胆逃离共产主义压迫、奔向自由”的故事。手册最后总结道：“共产主义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信仰、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因而成为“极不快乐的人”，哪怕“通过最危险的方式，寻求重新获得仅是自由的人民才拥有的珍贵的权利”。^③

美国在强有力地解构了苏联人民话语的同时，极力塑造一幅“自由世界”的美好图景。他们一再宣扬这些难民最好的归宿就是“自由世界”；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无论来自日本、巴基斯坦、古巴的运动员，抑或逃离东欧的体育运动员移民至美国同样获得卓越的成功。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发明家伊戈尔·西科斯基(Igor Sikorsky)、生物学家希尔曼·沃克斯曼(Selman Walksman)、作曲家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难民都成为新闻处重点颂扬的对象。^④这些特定的宣传材料通过媒介向世界报道，无非是在解构苏联“非人性”形象的过程中进而形成关于美国的“积极看法”。^⑤

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美国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于东德人

①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②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112-113.

③ Ibid, 114.

④ Ibid.

⑤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06, pp.259-260.

的大批逃离所引发的：“分裂的柏林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柏林市民在占领区之间的自由出入导致了东德人的大批逃离”。^①美国新闻署自然不会放过东德难民这一难得的宣传素材。1958年8月中旬，署长埃德·R·穆罗（Edward R. Murrow）到访柏林，目睹东德正在加固柏林墙，便命令新闻署利用墙下的东德难民大做文章。新闻署立即抓拍了一系列东德难民的形象，其中包括一个著名的镜头：一名边境守卫正穿越矗立在半空中的铁丝网，奔向自由。这些照片成为柏林美国新闻处策划的图片展览《墙》（The Wall）的核心内容。新闻署还制作了10套海外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各新闻处驻地展览，“柏林墙”的形象因此传播到了像泰国乌隆这样的边陲城镇。^②

三、“红色殖民主义”

对外形象层面上，美国将苏联界定为“红色殖民主义者”，认为它代表着一支“扩张的”与“非和平”的力量，注定寻求“统治世界”，是“世界紧张的根源”和“邪恶的冷战煽动者”。共产主义的和平理念被美国宣传者加以完全解构，苏联的和平因此被美国贴上“虚假的”、“模糊的”、“空洞的”标签，以此反衬美国对外形象的“光辉”与“正义”。

（一）“穷兵黩武”

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和平诉求通常被美国斥之为“险恶用心”。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和平形象的颠覆尤其突出。1951年4月1日，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UAA）出台的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战后以来苏联所谓的“和平”攻势。报告认为，“由国际共产主义分子阴谋集团策划的最危险的骗局就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攻势”，并且它已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自成立以来就将“这一运动置于压倒一

① The Berlin Crisis, 1958-1961,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BerlinCrises>

②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00-201.

切的地位”，命令世界上每一位共产党员（包括美国共产党员）将其作为主要的任务加以执行。其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美国解除武装并击溃美国”。^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指责共产主义国家的“假和平”、“真侵略”：“苏联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国际合作承诺。它已经摧毁了它的邻居的独立。它寻求它不能统治的那些国家的分裂。它已成立了超出自身防御需要的庞大的军队。共产党帝国主义祈祷和平但实行侵略。”^②

为了反击苏联的“和平攻势”，1950年7月，美国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制作了新闻影片《联合国对大韩民国的援助》（United Nations Aids the Republic of Korea），并以22种语言向亚洲地区输出，强调“战争是对北朝鲜侵略的联合反应”，估计受众高达3000万。^③美国之音在1951年3月6日的专题新闻中强调，“铁幕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将其国民收入的18%用在……军事开支上”。23日，美国之音推出的系列特别新闻节目《铁幕后面》（Behind Iron Curtain）认为，冷战的解决之途捏在苏联领导者的手中。节目对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森·布列恩·麦克马洪（Sen. Brien McMahon）、乔治·凯南进行了访谈，宣称“三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铁幕是每一个人最为关注的事，（因为）它危及世界和平，直至它被撬开，否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拥有持久的和平。”^④

1951年秋，国务院将下一年度的宣传主题定为“确保迈向和平和自由的力量”，并制定了一份名为《警惕！红色的和平之鸽》（Beware, the Red Dove of Peace）的特殊传单，以揭露“克里姆林宫伪和平背后的真相”。传单封面上画着一只猛禽，栖于克里姆林宫墙上，一支翅膀拎着枪，另一支翅膀则拿着橄榄枝，宣称“斯大林将一只可怕而具有攻击性的共产者秃鹰伪装成红色

① Report on the Communist “peace” offensive: A Campaign To Disarm and Defeat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25, 1951,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1,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② Ibid.

③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5-56.

④ Shawn J. Parry-Giles, “Militarizing America’s Propaganda Program, 1945-55”, in Martin J. Medhurst and H.W.Brands, e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 Linking Rhetoric and History*,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9.

的和平之鸽”。为了重新从苏联手手中夺回“和平”话语权，1952年上半年，国际新闻署将“确保迈向和平和自由的力量”推进到第二阶段。国务院将“力量”分为“侵略已被阻止”、“自由世界不可战胜”和“奴役制度注定失败”三部分内容。在大量的宣传材料中，宣传手册《致命的平行线》（*The Deadly Parallel*）以长达16页的篇幅“比较了纳粹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电影《和平与自由》（*Peace and Freedom*）则炮制了“值得拥有的和平、维持和平与捍卫和平”三个概念。^①

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遇”（*Chance for Peace*）的演讲。对苏联展开了猛烈地抨击：“他（斯大林）30余年的独裁统治见证了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张……现在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②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更为强势的“原子和平”（*Atom for Peace*）演讲。其中强调：“严峻的现实已经出现：第一，苏联已拥有充足的原子资源，对其选择的任何国家可实施可怕的打击。第二，它拥有巨大的核武器数量优势、破坏性的报复能力。在全力以赴地偷袭中动用原子弹。”^③

1955年7月，日内瓦峰会召开前夕，为了“展示苏联和平宣传的虚伪”与“苏联政策的侵略本质”，总统心理战顾问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向总统提交了《日内瓦裁军谈判心理战建议概要》（*Summa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roposals fo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Geneva*），指出，自二战至今，“共产主义侵略的内容”包括发动五次主要的“和平攻势”：1948年的和平攻势，柏林封锁之际；1949年的和平攻势，朝鲜战争前敌对性宣传高峰时期；1951年的和平攻势，1952年对细菌战和虐待战俘的指控之前；1953年的和平攻势，印度支那战争高峰之前。文件因此揣测，今年

①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66,76.

② Third draft 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 following the death of Josif Stalin. TOP SECRET. CK3100326127; Sixth Draft, 4/3/53, 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 CK3100326088; Eighth draft of Eisenhower's "Chance for Peace" speech following death of Stalin. CK3100326135, DDRS.

③ Press Release, "Atoms for Peace" Speech, December 8, 1953 [DDE's Papers as President, Speech Series, Box 5, United Nations Speech 12/8/53]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3.pdf

的苏联和平攻势，是否已经发动？^①洛克菲勒对苏联和平举动的偏见成为美国制定和宣传“开放领空”计划的理由。这种形象认知也推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裁军谈判当作一场宣传游戏。

（二）“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

美国宣传话语当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便是“卫星国”一词，旨在表达苏联建立“红色帝国”、推行“殖民主义”和“对弱小国家进行剥削压迫”的含义。1949年底，美国新闻处的宣传手册《谁是帝国主义分子？》（Who Is the Imperialist）列举了“苏联自1939年以来吞并的所有国家的领土人口和面积的事实”，并且描绘了“共产党在北朝鲜、波兰、北越和西藏的帝国主义行径”。另一份宣传手册《反动的俄国》（Russia the Reactionary）则强调苏联在文化上的“侵略性”：“整个苏联及其卫星国范围内，所有教育、信息、法律结构都被用于清除妨碍完全皈依莫斯科党的立场的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信仰、每一个人。所有处于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国家的经历证明了，在这些国家之中仅有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容忍苏联生活方式。……这里仅有一种爱国主义——苏联爱国主义。”^②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艾森豪威尔政府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宣传斯大林的“邪恶”；同时警告说，若马林科夫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将会引发“政治动乱”。美国之音立即以强硬的立场谴责“斯大林的暴君统治与国际侵略”，以及作为“无数苏联人民的谋杀与奴役者”。^③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演说，严厉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残暴行为”；他还对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加以否定，直接引发了东欧地区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草根

① Summa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roposals fo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Geneva. White House. Secret, Jul 12, 1955, CK3100192371, DDRS.

②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101-102.

③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90;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55-56.

运动”。^①3月22日，获悉这一情报后的美国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为美国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应“公开和秘密地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宣扬“斯大林的暴虐”，从而“迫使苏联政权政治自杀”。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要求国务院将秘密报告文本透露给《纽约时报》，并于6月4日印制出版。^②5月17日，行动协调委员会要求利用非官方材料发起宣传运动，要点包括“斯大林主义是民主的反面”、“西方多年以来的指控已得到苏联政府的证实”、“共产主义分子宣称的绝对正确的领导和思想已被粉碎”等。^③6月7日，美国新闻署长西奥多·斯特瑞伯特（Theodor Streibert）向69个海外新闻处发去电报，要求它们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自己说话”，以“揭露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独裁统治”，推动它们的最终“解放”。^④

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总统心理战顾问C.D.杰克逊（C.D.Jackson）致信艾伦·杜勒斯，强调美国应将此事件作为打击苏联的心理宣传战工具。^⑤为最大可能地影响世界舆论，新闻署和美国之音不间断地进行“现场报道”，强调“匈牙利事件揭露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⑥所有的宣传文本强调“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民主性”和“苏联镇压的残酷性”。例如，新闻署在《生活》（Life）杂志上刊载《为自由而战的匈牙利》（The Hungarian Fight for Freedom）的专题，并将其改编成为电影，“第一次”用24

① Khrushchev and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956,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khrushchev-20thc-congress>

② Discussion at 3/22/56 NSC meeting.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P SECRET. Mar 22, 1956, CK3100232035, DDRS;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p.69-70; Khrushchev and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956,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53-1960/khrushchev-20thc-congress>

③ Report by the OCB Special Working Group on Stalinism. Washington, May 17, 1956,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9/d198>

④ Editorial Note,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9/d199>

⑤ Letter to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director Allen Dulles from C.D. Jackson regarding ways in which the U.S. can psychologically use the Hungarian revolt as a propaganda tool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Letter, White House, Dec 11, 1957, CK3100519893, DDRS.

⑥ The Twelfth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p.5,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种语言向 81 个国家播放“真实的画面”，以揭露“苏联对东欧集团民主改革的镇压”；宣传手册《苦涩的收获：匈牙利十月革命及其后果》（*Bitter Harves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Hungary and Its Aftermath*）认为，苏联无法满足匈牙利成立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要求的举动“已经暴露了他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欺骗性”。为了充分影响世界受众，美国之音还以“听写的速度”对事件进行日常播报。^①

（三）“作为苏联帝国附庸的红色中国”

自 1950 年中苏两国结盟以来，美国政府设法将中国诬称为“苏联帝国的附庸”。1953 年，为了宣传“苏联对中国的剥削与控制，以激发中国民众对苏联的厌恶感”，新闻署向中国民众输出了“北京对莫斯科的臣服”、“苏联对中国的剥削”和“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生活的困苦”三组攻击性材料。内容包括“无法容忍的税收、强制参加会议；共产党对中国价值、传统和美德的攻击，开展不同形式的恐怖运动和充当警察国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食品短缺和令不同群体感到沮丧的生活水平”。^②1954 年，美国新闻署再次宣传“中国是苏联帝国的附庸，接受苏联的控制”，认为“该党一贯屈从于克里姆林宫更高的命令”和“将中国人民的粮食输送至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并不信任的俄国”。^③

50 年代中期以后，为了离间中苏关系，美国明显加强了对“红色中国”是苏联“附庸”的形象的塑造。1955 年，NSC5501 号文件要求新闻署利用共产主义的“弱点，攻击其目标与政策”。^④NSC5525 号文件要求继续通过

①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31, 140; Laura Ann.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102.

②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③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④ Appraisal of status of key USIA programs in various areas as of 6/30/5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1, 1955. NSC5525, Part 6, CK3100309162, DDRS.

宣传以“促进中苏之间的摩擦，向中国大陆输出对苏联的不信任感，鼓励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的厌恶”。^①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应“毫不松懈地揭露国际共产主义”，利用档案材料宣传“国际共产主义是世界紧张的根源”，强调“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中心，结束共产主义阴谋的责任主要在于苏联”。^②美国信息决策机构——海外信息活动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则强调，在共产主义世界形成的控制秩序当中，苏联居于“帝国中心”，与中国一道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指手划脚：“揭露这些领导者接受来自莫斯科和北平的命令与扶植，揭露共产主义充满阴谋和颠覆性项目的本质，展示共产主义者如何在民主社会中滥用允许的自由，其目的正是为了摧毁民主本身。”^③同时强调中国是“苏联的傀儡”：“中国人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共产党统治背后站着的一个外国强权，……成为苏联的傀儡。整个东方人民对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有相当的感知。……很明显，苏联将中国当作对南亚和东南亚渗透的一块跳板和一种工具。”^④在宣传活动中，美国千方百计地培育中国民众的这种认知。

按照美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美国新闻署向东南亚、近东和拉美地区输出大量的宣传材料，“致力于削弱苏联的声望和影响”；还实施特别行动计划，“不动声色地利用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憎恶”，^⑤尽可能地离间中苏关系。他们的逻辑是，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性本质”决定了苏中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权力争夺”。为了让“世界人民”明白这一主题，新闻署推出的宣传材料不断渲染中苏分歧：“提醒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关于卫星国地区，如刚果

① Appraisal of status of key USIA programs in various areas as of 6/30/5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1, 1955, NSC5525, Part 6. CK3100309162, DDRS.

② Report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ugust 31, 1955,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5-57v09/d191>

③ Space, Operations Plan for Outer. Bromley Smith, Exec. Officer, Cover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SECRET. Dec. 23, 1960, CK3100446026, DDRS.

④ Suggestions for the U.S. psych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with respect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other Communist countries. Memo.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fidential, CK3100544767, DDRS.

⑤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和朝鲜的分歧、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的缺乏、战后苏联对满洲的掠夺；向苏联输出的信息暗示，中国权力的快速发展可能最终会对苏联的重要利益产生威胁；如果共产主义中国推行侵略性政策，由于蓄意或误判导致的军事冲突，没有人能够确定不会带来所有人都希望避免的、可怕的摧毁；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援助将危及苏联国内绝对需要的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项目的扩大；中国不顾还有很多中国人民挨饿这一事实向苏联运送食粮。”^①对于中苏 50 年代的分歧与论战，新闻署认为这是“红色中国与苏共之间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应“间接地利用事实依据，力图模糊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形象，……加剧非集团内共产主义组织潜在的派系纠纷”。^②

（四）“寻求统治和控制世界其他地区”

自 50 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冷战逐渐扩大至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美国的“红色殖民主义”主题更多地着墨于刻画苏联意欲“统治世界”的形象。1955 年，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新闻署强调，将继续探讨“国际共产主义分子阴谋的性质和图谋”与“揭露和反击共产党殖民主义者”，作为“全球性的主题”。^③在所有的宣传材料当中，新闻署电影的典型特征就是炮制大量血腥和恐怖的“事实”，强调“共产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如影片《菲律宾新人民军（Huk）》，就讲述了“国际共产主义对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④

在远东地区，1954 年，美国新闻署强调：“在印尼和缅甸，共产党已成功地将自身塑造成反殖民的和‘进步’的形象，已经将美国塑造成一种充当经济和殖民剥削工具的形象；在日本，他们质疑自由世界结构内经济复兴的能力，并质疑美国对亚洲的干预。在马来亚和印度支那，他们已经用‘解放’

①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② USIA program as of 6/30/60 outlined.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Jun 30, 1960, CK3100321103, DDRS.

③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④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08-109.

的谎言来掩盖红色中国向南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①为此，新闻署将东南亚信息项目扩大到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向它们输出大量的档案电影、新闻纪实、照片、展览、电台节目和宣传手册，强化“美国对外政策的非殖民性和苏联与红色中国的侵略扩张性”主题。^②新闻署秘密支持泰国警方举办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而完整”的展览，以揭露“共产主义在亚洲和欧洲的犯罪纪录”。展厅天花板上绘有一幅亚洲地图，一只硕大的纸型蜘蛛匍匐其上，整幅地图上的国家被一张蜘蛛网覆盖着，寓意国际共产主义正在“诱捕这些国家”。^③随后，泰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密集的反共宣传活动。活动不但渗透到泰国村镇一级，而且扩大至东南亚其他地区。^④

在中东地区，心理战略委员会要求美国宣传机构“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技巧”揭露共产主义是对“苏联民族帝国主义的一种掩饰”，以及本土共产党沦为“外国人手中的工具”。^⑤新闻署利用电影、电视、图书、展览等各种手段致力于揭露“阿拉伯的自由和独立受到中苏帝国主义的威胁”。1953年12月，巴格达美国新闻处向伊拉克宣传部长伊卜拉希姆（Ibrahim）提供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国际层面”的秘密材料，伊卜拉希姆要求当地报刊、杂志和电台进行广泛的宣传。新闻署和伊拉克政府还联手制作宣传手册《我们处在危险之中》（We are in Danger），渲染“共产主义的扩张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严重威胁”。50年代早期，埃及领导者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与美国新闻署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相互探讨“红色殖民主义”主题。至50年代中期，埃及电台近一半的对外广播内容都是由新闻署提供的。^⑥

① Status of USIA program from 8/1-12/31/53 and of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Program from 6/30-12/31/53 (NSC 5407, Part 7 and 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r 1, 1954, CK3100003262, DDRS.

②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③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p.122, 223.

④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⑤ NSC161, Evaluative summary of the status of U.S. n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grams as of 6/30/53. WHITE HOUSE. TOP SECRET. CK3100224713, DDRS.

⑥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p.135-139.

在拉美地区，1954年11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 NSC5432/1 号文件，要求扩大与拉美地区的信息和文化交流，以反击苏联的渗透。1956年4月，行动协调委员会参照 NSC5432/1 号文件，制定了《反击共产主义在拉美的行动纲要》（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against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detailed），要求“采取一切行动揭露共产主义行为的颠覆性、阴险性、欺骗性和残酷性”。^①美国新闻署明显地加大了宣传力度，向拉美地区输出 800 本反共著作和 9 万册反共漫画。^②仅在 1954 年 6 月，美国新闻署就将 200 余篇文章和脚本送至海外媒体，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对“共产主义渗透进行原验性（original verified exposes）揭露的档案”。^③关于“共产主义颠覆策略和矛盾”的材料则以专题文章、图片故事、宣传手册和漫画周刊的形式航空邮寄至拉美地区各美国新闻处。如戏剧《最后出局的人》（Last Man Out）长达 24 集，揭露“共产主义试图接管和颠覆自由制度的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④

结 语

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捍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决策者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了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将苏、中描绘成“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美国利用一切可能的攻击手段，无限夸大苏联的弱点与缺陷，这使得作为敌人的苏联形象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其他敌人形象都要丰满。

① 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against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detailed. Apr 18, 1956, CK3100322372, DDRS.

②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6, p.148.

③ USIA program covering period from 1/1/54-6/30/54 (NSC 5430, Part 7).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2, 1954, CK3100084242, DDRS.

④ Appraisal of status of key USIA programs in various areas as of 6/30/5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Aug 11, 1955, NSC5525, Part 6, CK3100309162, DDRS.

美国强势塑造苏联“敌人形象”的背后，隐藏着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冷战目标。对此，负责美国之音事务的施拉姆委员会（Schramm Committee）在1955年的研究报告中说得非常直白：“新闻署的广播正在欣然地完成他们指派的、有助于维持希望的任务，撒播对共产主义政权疑虑的种子，报道政权意欲镇压的新闻，制造一种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促进我们在铁幕后面的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①从更深层次上看，美国之所以热衷塑造敌人，主要在于它感知到作为“与美国价值相对立的另类镜像”的“他者”，对“美国生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观成为美国界定敌友的分界线。^②正因为美国认定苏联对“美国信条”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而将苏联视为“战略敌人”。既然对苏联形象的描述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击败共产主义为要务，那么，此种描述就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美国既不愿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更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因此，美国全面抹黑苏联形象，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正确的、真正值得效仿的制度。苏联“敌人”形象既已深嵌于美国决策者的信仰体系之中，作为另类的他者而存在，这就决定，歪曲、解构与夸大其词成为美国塑造苏联“敌人形象”的本质特征。

针对美国的妖魔化宣传，苏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击。总的看来，苏联将美国的宣传斥之为无耻的谎言。1957年2月24日，里加电台（Radio Riga）向海外播报了一则苏共新闻发言人的演说：“世界反动分子正在失去心理平衡，他们变得疯狂起来。近来，他们已经发动了一场鲁莽的反苏、反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无数的电台、报纸和杂志，夜以继日地口诛笔伐。它们以象征的手法，利用各种语言，炮制了大量关于苏联与社会主义的流言蜚语与谎言，传播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与恶意的诽谤。……这犹如戈培尔再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世界反动分子利用的最重要的和最大的谎言制造机构就是美国电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解放电台，等等。”^③在实际宣传中，

① USIA program detailed.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Feb 17, 1955, CK3100007014, DDRS.

② Ragnhild Fiebig -von Hase and Ursula Lehmkuhl, *Enemy Images in American History*,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7, pp.9, 15, 40.

③ Donald Dunham, *Kremlin Target: U.S.A. Conquest by Propaganda*, New York: Ives Washburn, Inc., 1961, p.151.

苏联反复强调美国对外政策的荒谬性、虐待少数族裔的行径以及虚假的和平姿态，借此塑造美国黑暗、邪恶的反革命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苏形象宣传是战略性的、长期的，绝非策略性的、临时的。美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且非常注重宣传效果的评估。从美国官方的自我评估中可以看出，持久的对苏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指出，新闻署关于该事件的宣传获得了外界的积极认同。危地马拉雷塔卢洛州（Retalhuleu）州长说：“在参观你们举办的展览当中，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参观了‘失败的胜利’和‘现代先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因为‘充斥在每一幅图片中的严酷、残忍的现实主义’显示匈牙利的悲剧是如此地触动着世界。”杰拉帕市（Jarapa）的一位市长助理甚至宣称：“在目睹匈牙利事件之后，如果还让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上台，我们无疑就是一群白痴。”^①而新闻署 1960 年出台的 report 再次强调了对苏形象宣传的有效性：“在拉美地区，各新闻处利用新闻、出版、电台、电视和其他手段反击和揭露国际共产主义，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在学生和劳工群体中，显示了揭露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推动这些群体更加接近民主原则。”^②

总之，美国对苏形象塑造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成为其争夺人心的重要手段。特别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从心理攻势转向文化渗透，极力向共产主义国家展现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敌人形象修辞与美国意识形态灌输密切结合，最终使苏联长期以来宣传的美国敌人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应该说，这种文化压力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从这个意义上看，冷战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就是一场美苏之间的形象宣传战。

① The Fourteenth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 p.25,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② USIA program as of 6/30/60 outlined.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 Jun 30, 1960, CK3100321103, DDRS.

【Abstract】 After WWII, due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ascist enemy, the U.S.-Soviet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became more obvious. The ac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securing itself, were interpre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expansion of communism. The rivalry between these two states i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the trilateral U.S.-Soviet-China relations moved towards complete rivalry. The U.S. launched an aggressive anti-communism propaganda, employing every possible media means to distort the Soviet image, describing it as “dictator” and “red colonialists” to sensationalize the “evilness” of communism. In general, in the American deconstructing discourse structure on enemy images, “dark”, “authoritarian”, “cruel”, “closed”, “backward” and “expansion” become core elements in identifying the Soviet image as “evil empire”, mirroring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refore, the rhetoric of the U.S. was essentially distortion and subversion against the Soviet images.

【 Key Words 】 the Cold War, U.S.-Soviet Relations, Enemy Images, Character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связи с уничтожением фашизм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США стал ещё более отчётливым, действия СССР по защит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были истолкованы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как расширение коммунизма, враждебность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усиливалась изо дня в день.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враждеб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итаем приняли полномасштаб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ША развязали серьёзную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ую кампанию, используя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кажали имидж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зывали его «диктатором», «красным колонизатором», «зло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щим коммунизм. В целом, в структуре лексики СШ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образа врага, «темный», «диктатура», «жестокий»,

«закрытость», «отсталость»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стали основны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СССР в качестве «империи зла», чт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лос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 законност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Ш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имидж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 сути, являлась искажением и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браз врага, создавать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苏·历史

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郝娜*

【内容提要】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主义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和格申克龙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重新追溯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如基督教的救赎情怀），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

【关键词】文化主义 民粹主义 结构主义 阶级斗争 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2-0076-(19)

革命是一种宏观社会变迁的类型，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路径，是20世纪以来不同后发国家的共同主题。人们常常将革命发生的原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精英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财政危机与经济困难，以及国内或国际政治体制的衰微等等。解释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路径大致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社会心理学三种。“相对剥夺感”概念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典型表述，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文化研究路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都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力图构建宏大而整全的宏观理论，文化主义强调

* 郝娜，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构成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规范、价值、共识乃至信仰，对革命的发生进行诠释性的理解；而结构主义倾向于寻找普遍性，强调制度背景下行动者之间的静态与动态关系，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①

艾森斯塔德 (S.N. Eisenstadt) 认为，有关革命的结构主义研究缺少了一个总体性的、容纳各种结构与历史条件的情境，亦即文明框架。他提出，革命的发生与某些轴心文明的特质相关，只有具备此岸世界愿景或此岸与彼岸世界愿景都具备的文明，才能提供进行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方案重建的乌托邦愿景和革命意象，才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生伟大的革命。俄国革命的发生在于其处于东正教文明的范围内。^②金雁认为，俄罗斯民间宗教的分裂运动与东正教独特而浓厚的弥赛亚（即拯救、救赎）情结，导致了俄国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或 narodnichestvo）的滥觞，这是俄国 1905 年革命、更是 1917 年革命发生的原因。^③艾森斯塔德对文明类型的划分与革命发生之关系的研究，因突破了单一研究对象的范围，其文化主义路径所固有的研究对象特殊化、静态化和循环论证的弊病尚不明显，这些局限性在金雁以一国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思想史研究上则十分突出。

与此相对的，结构主义将阶级视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摩尔 (Barrington Moore) 寻求将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其他类型的国家和政体的后果联系起来。与其一脉相承的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则采用强结构主义宏观分析，兼用马克思 (Karl Marx) 式的阶级分析、韦伯 (Max Weber) 式的国家分析来研究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④结构主义的弊病在于立场太过欧洲中心，

① [美]马克·I. 利希巴赫、阿兰·S. 朱克曼编，褚建国等译：《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 [以]S.N. 艾森斯塔德著，刘圣中译：《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43页。

③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0-431页。

④ [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生硬地应用于欧洲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理论的有效性值得商榷。本文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路径和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与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力图重新对俄国革命——这一代表了不同于欧洲现代化与现代政治发展方向的晚近革命新榜样的共产主义革命及体制——的性质及后果进行评价。

一、文化主义的解释（一）：轴心文明与此岸愿景

艾森斯塔德认为，既有的革命研究都未触及更宽泛的历史文明背景问题，革命更容易发生的主要文明框架，几乎都是轴心时代文明的某种类型。“在这些文明中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和文明前提，激发着许多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式和普世论导向的社会秩序新类型的愿景。同时，这些文明形成的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性特征创造了让这些愿景得以制度化的框架。”^①早期革命发生在基督教文明的框架内，也就是信仰新教与天主教的欧洲文明，而后向东扩展到东正教范围的俄国和儒教文明圈中的中国和越南。这些社会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在所谓轴心文明的框架中形成的。^②“救世与乌托邦思想的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文明中的统治者的责任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衍生的制度。”^③

艾森斯塔德发现，单纯以彼岸世界（如印度）或单纯以此岸世界（如传统中国）为取向的本体论愿景的社会，在早期现代化时期没有产生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革命活动，它们的文明的中心，要么是宗教仪式，要么是政教合一（儒教中国和伊斯兰教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形成了解决超验秩序与世俗秩序之间张力的主要舞台，所以无法孕育出对政治领域的原则上重建的社会新类型、新的现代文化方案的强烈的先验愿景。^④革命意识形态具有普遍主义

① [以]S. 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5页。

② 同上，第43页。

③ 同上，第53-54页。

④ 同上，第27、60-84页。

和传教士精神的维度，^①这对于革命的发生起着关键作用，但印度、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缺乏这一要素。尽管现代国家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革命来产生，但是，“现代政治和行政机构的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扎根于革命中的基本的意识形态前提密切相关。”^②而未曾历经革命涤荡便进入现代社会的德国与日本，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法西斯主义所吞噬。“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面临的悲剧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革命就进入了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③

所有的现代政体都面临着如何吸纳或者拒绝不同的革命象征与主题的问题，这首先在于如何对待并将社会主义的阶级象征与民族主义的象征，融入到它们各自政体的集体认同和合法化的认知框架中。不同的融合与吸纳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现代性秩序和多样现代性的主要特性。其次，所有的政体都面临着潜在的和事实的革命运动对它们制度框架的连续性挑战。^④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象征在另类现代性中非常突出，常常被许多专制的政体采纳。它们否认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的普世性要素，但却试图使自己也适合于社会主义象征。^⑤

不过，艾森斯塔德认为，在多样现代性的方案中，“共产主义者是现代性经典模式的最极端的替代模式的传承者”。^⑥受到主要的激进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拥护的另类现代性，形成了晚近革命的核心，在这种现代性中，社会主义的激进象征被完全接纳和转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被置于现代文化方案的框架中，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框架中。它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依照现代方案的不完整性来展开的，在这种社会中，这种“最耐久和最持续的另类现代性”成为了现实。^⑦共产主义革命及政体采取的，是一种总现代性的方式，以类宗教式的救赎主义的使命对人类和社

① [以]S. 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 14 页。

② 同上，第 134 页。

③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第 523 页。

④ [以]S. 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 165-166 页。

⑤ 同上，第 169-170 页。

⑥ 同上，第 213 页。

⑦ 同上，第 170 页。

会进行总体性改造和重建，试图建立一个由工人和无产者组成的现代的普遍共同体，从而以救赎主义愿景为名，要求个人在全面性极权主义体制内的整体沉没。^①

对于许多非欧洲社会中的精英和其他阶层来说，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吸纳社会主义象征并采用社会主义政策的策略，使得他们能够“在新集体认同中吸纳一些现代化的普遍性要素，同时又不需要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或者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批判”。^②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是“科学唯物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以不同的方式被吸纳到不同社会的智识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中。（1）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象征成为了它们基本的文明前提，它们的智识地图是普遍性话语的一个构成要素；（2）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古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它们存在的政治前提、智识地图的核心和主导性的要素；（3）在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国家，社会主义象征已经成为了它们集体认同的重要要素，但并非其智识地图的基本要素。^③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开启了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唯物主义”变成革命与革命政权政治生存的前提，乌托邦的信仰与承诺以类宗教般神圣化的方式，^④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和基础。

艾森斯塔德认为，尽管知识分子和宗教团体都是革命愿景的构想者，但有关革命的文献更偏向于强调重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阶级关系，却不太重视特殊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⑤在社会转型中，精英的特性，“特别是他们反对被嵌入到不同的特殊团体的自主性，他们所宣扬的本体论愿景和这种精英之间以及他们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催生社会变迁的革命或者非革命过程和同时进入现代性的现代制度与文化框架的不同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⑥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疏离与隔绝，知识阶层整体上对工业化与现代化采取的否定与批判态度，就非常恰当

① [以]S. 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 171 页。

② 同上，第 178 页。

③ 同上，第 186 页。

④ 同上，第 171 页。

⑤ 同上，第 20、42 页。

⑥ 同上，第 158 页。

地证明了这一点。金雁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恰以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为核心。金雁认为，17世纪末开始的彼得一世的政治改革与尼康的宗教改革所激发的民间东正教的分裂运动及其民粹主义遗产，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提供了独特的精神营养，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20世纪的革命运动，都须从此处追根溯源方能解惑。^①

二、文化主义的解释（二）：分裂教派与民粹主义

金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表面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同化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②不过，格申克龙认为，将俄国民粹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或农业社会主义也并无不可，它们都对分配而不是生产有着道德上的强烈兴趣，且对西方资本主义与工业发展的成果与后果持强烈批判态度。^③金雁指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列宁的思想资源中源自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东西远远多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民粹化，“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上的民粹主义，由否定的民粹主义到肯定的超民粹主义”。而斯大林时代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借壳上市”的外包装，最大限度地借用沙皇专制制度中的旧的文化方式，以传统的东西混合苏联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内容。^④所以，20世纪俄国革命之发生，与马克思或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社会主义实在是关系不大。

金雁有关俄国革命的观点，恰与结构主义对革命发生的因果机制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一，到底是东正教、是历史更为久远的民间分裂教派，还是分裂教派的遗产民粹主义，才是革命乌托邦的来源？金雁认为，激进的革命乌托邦是

①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42-55页。

② 同上，第243页。

③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3页。

④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563-565页。

与东正教一元论结构相一致的逻辑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求完整性与统一性的行为与民族心理导致了激进主义。^①但《倒转“红轮”》通篇都在论证分裂教派与分裂运动具有宗教性与激进性，不是东正教的一元论结构，而是与东正教相对抗的民间分裂教派，才是俄国革命乌托邦的来源。作为基督教的分支，俄国东正教的歧义性、落后性与封闭性，没有哪个教派可以与之相比，分裂教派与近现代俄国政治和宗教一体化趋势的对抗，所凭恃的是文化保守主义（亦即民粹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裂运动是“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②分裂运动及其“人民崇拜”的民粹主义经由 60 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 19 世纪后期的俄国盛行，到了 19 世纪末，俄国社会与知识群体在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中迷失了方向。^③

作为俄国激进主义与革命乌托邦的源头，东正教的一元论结构，与分裂教派或其民粹主义遗产，三者能否等同？摩尔认为，用停滞、不变与稳定性的文化视角来解释事件和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论证，^④或者无限追溯。而在金雁看来，东正教的一元化追求，分裂教派的多样性与反专制反西化，分裂教派 19 世纪的遗产——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后来的民粹主义，似乎都是可以等同或换用的，都是俄国近代宗教与文化的内容。这种往前无限追溯的方式，甚至将对立的两个要素随时替换作为根源的文化研究，凸显了文化主义路径的解释过于宽泛庞杂，而无法建立明确的因果机制。并且，任何社会的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都是打掉地方性、多样性而迈向一体性、统一性的过程，^⑤尼康宗教改革所确立的官方东正教的唯一合法地位，是俄国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俄国现代国家政治一体化建设的一部分，是政治现代化

①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 430-431、593 页。

② 同上，第 43、685 页。

③ 同上，第 168 页。

④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第 501-502 页。

⑤ 且不说欧洲近代的宗教改革与宗教统一运动激起的农民反叛运动绵延不绝，即使如中国般世俗化的国家，近现代也一直存在着国家与民间争夺正统信仰的斗争。参看（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将其归因于官方东正教或民间东正教甚或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十分牵强。

第二，如何评价 1906 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与农民解放？革命既是社会多种功能性障碍的产物，就远非单一群体的行动所能达成，需要有人运作，也需要所有群体的参与，包括统治者。既然俄国自 19 世纪以来知识界总体的倾向是反西化和反现代化，——无论是稍显西化的 19 世纪 40 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及其 20 世纪的继承者“路标派”（1909 年集体写作发表《路标文集》的知识分子群体），^①还是 19 世纪 60 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及其民粹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后继者们，——而俄国革命又是另类现代化的替代模式，因此，俄国知识分子和金雁对斯托雷平改革的评价就非常奇特。土地公社化、农民农奴化和国家集权化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在彼得一世时期建立起来，土地的使用与兵役制挂钩，军功贵族土地上的劳动力靠农奴制来解决，以满足这个幅员过于辽阔的国家军事征战与内外安全的需要。^②1762 年准予贵族免除劳役的敕令颁布，这个敕令“最终切断了农奴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原始联系”，农奴制被永远定格为经济进步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③

贵族解放以后，俄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沙皇，都在不断地反对农奴制，与金雁所强调的不同，知识分子的反对不仅不具有特别的显著性和决定性，这一群体赋予村社制度的过高的道德色彩，甚至客观上阻碍了农民获得经济独立的自由与权利。1861 年农奴解放以后，农民可以拥有土地，却仍然没有自由迁徙权，村社制度使得农民仍然要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到了 19 世纪末，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危机日益严重，并在日俄战争中全面显示了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对于经济与工业发展的阻滞，土地富余的农民反倒时时以村社共同体为单位发起集体反叛，旧体制的能力限制了俄国的国家野心，于是斯托雷平改革启动。应该说，斯托雷平的改革既生逢其时，而且改

①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 17、153 页。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evich Solzhenitsyn）在《二月革命反思录》中指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路标派既反对民粹主义和激进革命，也反对世俗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② 同上，第 319、299-305 页。

③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158 页。

革措施得当，一战前俄国农业与工业产出均在稳步快速增长。格申克龙在研究俄国工业化时不断假设，假如改革未曾因一战的打断而继续顺利推进，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会逐渐平息。但金雁则认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专制主义市场化”，是“父”夺“子”利、独霸“家产”的不公正改革，积聚民怨以致社会情绪激进化和民粹主义大爆发，终至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1917年的“二月雪崩”。^①

最后，到底是村社制度，还是村社制度的解体引发了革命？在1825年俄历十二月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之后，土地公社化与村社制度一直被视为俄国传统的正向遗产，但实则与俄国的工业化需求相悖反。金雁认为，斯托雷平推进的改革导致了农村的分化，摧毁了“公社精神”，失地农民因失去村社制度的庇护和丧失对沙皇“慈父”形象的敬畏与依赖而成为革命主体。^②按照金雁的逻辑，如果不是斯托雷平改革改变了传统村社制度对农奴、农民的保障，沙皇的慈父形象还不会丧失，知识分子的革命宣传也不会深入人心，农民也就不会成为革命的主体。从1861年农奴解放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前，村社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农民仍然必须固着在土地上和村社中，不能自由流动，一旦离开村社，其土地所有权将被收回。^③但客观上，人地矛盾突出，农民对土地的渴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却又无法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

于是，村社制度决定了农民既没法供应城市工业紧缺的劳动力之需，也无法凭借土地耕种改善经济境遇，所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效果上来说都是个不良制度，何以会成为道义上仁慈而温情脉脉的良善的专制旧制度？斯托雷平改革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地紧张的状况，允许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客观上使得农民再也不可能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改革反而减缓了农民叛乱对沙皇体制的冲击。所以，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发生，尽管可以从艾森斯塔德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乌托邦愿景的角度，或者金雁的俄国分裂教派与民粹主义的斯拉夫民族独特性的角度，去断定其内含革命因

①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19、137、211、259、268-269、562页。

② 同上，第265页。

③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158页。

子，因而必然会发生；但实则革命的发生是可能性与偶然性的因缘际会，一旦遭遇，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便与更好的历史机会失之交臂。

三、结构主义的解释（一）：阶级结构与农民革命

戈德斯通（J. A. Goldstone）的观点最能简单明晰地表明结构主义对革命发生机制的认识：（1）国家财政负担的加剧与财政危机的发生；（2）精英内部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与行动力削弱；（3）民众反叛的兴起；（4）社会纠偏和政治转型的意识形态变得日益突出。^①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政治上是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的后西方系统的创建和发展。^②摩尔将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根据土地精英阶层与农民之间的不同关系，摩尔将现代国家转型划分为三种类型：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确立了民主制度（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往往导致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出现（君主改革与立宪），而发生农民革命的国家则大多建立了共产主义极权国家体制。^③摩尔的思想后来又更精致化地落实在斯考切波的革命研究中。

摩尔在他的研究中恰好回答了金雁研究中神秘化的一个东西，即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保守性与其反西方、反工业化的独特性。在摩尔看来，所有社会的乡村都是人们用来判断和谴责现代工业文明的那些含糊混乱的道德标准的一个重要来源，客观上是因为“所有地方的乡村都在现代冲击到来之前实行佃农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着平均分配资源的内在倾向”，摩尔称其为“加图主义”。加图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社区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接触到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对社区应尽的义务，社区则依靠集体的努力来维持其生存。^④“农

① [以]S. N. 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 34、134、180 页。

② [美]马克·I. 利希巴赫、阿兰·S. 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第 117-119 页。

③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前言》，第 3-6 页；第 500 页。

④ 同上，第 514 页。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是典型的保守派人物，著有《农业志》，他歌颂农民，反对社会分化。

民的风俗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本质，是有关平等的最粗略概念，它强调公平也强调为了完成基本任务而拥有最低限量土地的必要性。这些标准通常会带有某种宗教性的惩戒，因而农民可能会强调他们的宗教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的宗教。”^①这也正是金雁所说的俄国分裂教派或者斯拉夫主义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它是由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不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旦传统农民经济受到威胁，加图主义就会出现，这种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反对社会变革，呼吁回到古风时代。摩尔认为，俄国农民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在18、19世纪的俄国乡村地区，农民关于平等的概念体现为对土地周期性的重新分配，债务和税收以社区为单位厘定。甚至可以说，俄国民粹主义者采纳了农民设定的目标，也采纳了许多农民基于自身对村社共同体的理想化要求而对现代社会展开批判。^②所以，激进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和城镇里的小手工业者，无论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是俄国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因此，不是金雁所认为的官方东正教的一元化结构，或者分裂运动及民粹主义催生了激进主义与暴力，而是基层农民社会及其平均主义的认知与客观现实间的鸿沟，是18世纪以来俄国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催生了分裂运动和民粹主义。

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Happening），而不是制造的（Making）；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③所以，对革命的研究应从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入手，而不是泛泛地从意识形态、思潮、观念或“社会情绪”等主观因素来解释革命的发生。斯考切波所谓的“社会革命”，是指自下而上的结构变迁与农民造反。^④斯考切波认为，国家不仅是一套行政组织，是一种有组织的、控制政治冲突的强制力，而且是国际与国内交界面上的行动实体，亦即“国家的国际体系”。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成功，均是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旧政权的国家组织崩

①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第515页。

② 同上，第519-520页。

③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译者序》，VIII。

④ 同上，第41-44页。

溃，而新的革命性国家组织得以建立。因此，我们对革命的研究不仅要考察阶级关系，考察国家与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还要考察国家之间的关系。^①

通过比较三国各自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家与上层精英的团结/分裂程度、农民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斯考切波将三国革命的发生机制概括如下：（1）对外战争与竞争失败；（2）旧制度的国家组织遭遇危机；（3）农村结构（村社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②具体到俄国革命，一战中军事失利，加上国内落后的经济与交通状况无力继续保证战争的后勤补给，沙皇制度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俄国内部存在一个掌握土地的支配阶级，支配阶级依赖于旧制度的国家，享有官职与财富两方面的好处；乡村地区因为 1861 年的改革而成为一个动员与行动的共同体。旧制度的失败会迫使国家对社会进行剥夺，剥夺损害了支配阶级的权益并使底层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支配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挠改革，不仅致使旧制度的改革流产，而且使国家官僚机构的行动能力遭到破坏。国家强制力减弱，而村社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又使得农民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于是革命爆发。^③

但俄国的支配阶级即贵族很虚弱，并不具备破坏国家强制力的能力，那么，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斯考切波认为，俄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实在太太大，压垮了旧制度的国家组织。1861 年改革虽未彻底解放农奴，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状况继续阻滞着俄国农业产出的增长与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形成了村社团结的集体习俗，底层农民凝聚成了有组织的群体。^④人一地矛盾长期突出，加上村社共同体的形成，使得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在 1906 年斯托雷平改革前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沙皇体制的棘手难题。斯考切波对村社共同体与斯托雷平改革的评价也与金雁相反，说明了文化主义路径容易带入并掺杂主观化的道德性判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雁研究的偏颇之处也说明了 19 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之

①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 26-33 页。

② 同上，《译者序》，X。

③ 同上，第 59-112 页。

④ 同上，第 94-100 页。

间的疏离乃至隔绝状况的严重程度。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俄国工业化趋势及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格申克龙的研究提供了专门而独到的解释。

四、结构主义的解释（二）：资源禀赋与落后程度

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罗戈夫斯基研究的是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充裕与稀缺状况、各种资源所有者对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支持与反对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农民、工人、企业主与地主之间不同的利益分化格局及其后果。对于贸易保护或自由贸易所导致的收益与亏损问题，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及广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获益，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充裕要素的持有者及广泛使用充裕要素的厂商会因贸易保护而受损，因贸易自由化而获益。^①因贸易所致的变化，必然影响国家内部的分歧。

国际贸易扩张时期，资本和土地充裕而劳动力稀缺（瑞典）与资本和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德国）的国家，会引发阶级冲突；资本和劳动力充裕而土地稀缺（英国）与资本和劳动力稀缺而土地充裕（美国）的国家，则会引发城乡对立。^②当经济衰退发生时，优劣转换，城乡冲突与阶级冲突也随之发生转换。国际贸易衰落之时，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而劳工支持贸易保护的阶级冲突导向了罗斯福新政；资本所有者与劳工争取自由贸易、而土地所有者支持贸易保护的城乡冲突导向了西欧法西斯主义；土地所有者争取自由贸易、劳工与资本家支持贸易保护的城乡冲突催生了南美民粹主义；而出现劳工争取自由贸易、资本与土地所有者（地主而非农民）争取贸易保护的阶级冲突的亚洲与东欧，则普遍出现了共产主义革命。^③

17 世纪的国际贸易扩张，在西北欧出现了城市至上和农民解放的现象；

① [美]罗纳德·罗戈夫斯基著，杨毅译：《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年，第 1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③ 同上，第 7-8 页。

在东欧与俄国，则出现了城市衰落、劳动报酬增加和“第二次农奴制”现象。究其原因，正在于西北欧劳动力与资本充裕而土地稀缺，而东欧土地充裕，劳动力与资本却极为稀缺。^①到了 19 世纪，俄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是土地和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稀缺。1861 年改革和 1906 年斯托雷平改革，使得一战爆发前后俄国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小地主。这样一种状况促成了工人与农民联合，支持市场自由化进程；而资本家（即土地贵族）支持保护主义与帝国主义政策，导致阶级冲突，红绿联盟同资本家的对抗主导着政治生活。^②劳工和农民结成了具有决定性的反政府联盟，与土地贵族和资本家形成对立之势，一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便发生了。^③

罗戈夫斯基认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只存在于那些贸易扩张时经济极为落后，但劳动力又十分充裕的经济体中，如俄国与中国。贸易扩张不仅会激化稀缺要素与充裕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对立，而且还会增强“劳工和无地农民这类孤立的充裕要素所有者”。^④未能实行彻底而又明确的农业改革无疑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61 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促进了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但农民仍被固着在土地上，而农民人均持有的土地又严重不足，导致农民大量逃离乡村，于是国家又加强乡村公社制度，建立起逃离土地的壁垒，对逃离农民的家庭课以重税并收走土地，这使得俄国在 19 世纪后期“牢固地建立起拥有土地的农民阶层，而不是一个无地的劳动者阶级，并特别谨慎地使农民依附于他们的土地”。^⑤

格申克龙的研究，可以说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格申克龙认为，一国工业化启动时经济落后的程度决定了其工业增长率、工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以及工业化的精神与意识形态，与早发现代化国家有着相当大的不同。^⑥

① [美]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第 165 页。

② 同上，第 30 页。

③ 同上，第 47-52 页。

④ 同上，第 187、117 页。

⑤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141-142 页。

⑥ 同上，第 10 页。

第一，格申克龙认为，将农民束缚在农奴制下必须被理解为俄国在其西方化过程中最显著的一面。^①俄国的落后状态决定了俄国的重商主义（政治上的对应物即为绝对主义国家）特征。西欧国家的重商主义推行之时，农奴制基本上消失或处于瓦解状态。而俄国的农奴制，则是其“重商主义政策运行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齿轮”。^②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国家的军事利益引导政府发动一种快速突进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沉重的负担强加到农业人口的头上，将俄国农民置于农奴制的强制之下，是与这种经济发展政策密不可分的。^③

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俄国政府为了顺利推进工业化而避免推行任何意义深远的制度改革，这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工业化的进展，但长远来看却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持续进行。经济大爆发仅仅维持了十年左右，到 1900 年便不可避免地终结了，究其原因，农村人口的税收支付能力近于枯竭，而农民的忍耐也已达到了极限。^④但“无论是地方长官制度，还是为保留和保护乡村公社而采取的追加措施”，显然都无法与农奴制相提并论。“一个对工业化政策作出坚定承诺的政府居然破例去保护乡村公社。”村社制度实际上助长了反抗，而不是有效控制了农民的情绪。^⑤因此，斯托雷平改革绝对算得上是“对俄国农业社会主义的致命一击”，改革使得农民家庭成员向城市的不受伤害的流动的道路第一次被打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俄国巨大的农民团体也可以像他们的西方同伴那样，出卖土地并运用所得收入去在农业之外谋求他们自己的事业”。^⑥

但是，俄国知识分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谴责与道德义愤却十分强烈。“在经济政策领域，对农民生活条件的深切关注和对俄国工业发展的缺乏兴趣，似乎成为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特征。”^⑦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22 页。

② 同上，第 178 页。

③ 同上，第 154 页。

④ 同上，第 155 页。

⑤ 同上，第 156 页。

⑥ 同上，第 158 页。

⑦ 同上，第 184 页。

第二，俄国知识分子总体上与工业化过程隔绝，其反西化、反工业化的特征自 19 世纪初以来便十分显著。十二月党人对工业社会的厌恶十分突出，对农业主义的强调，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以及限制形成一种永久性工业劳动力的愿望，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遗产。^①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被粉碎和尼古拉一世政权的建立，俄国知识分子逐渐逃避对于紧迫的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他们逃进了形而上学与美学领域。^②无论是 40 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还是 60 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集大成者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都是从人道和道德的视角来讨论农奴制与工业发展问题以及乡村公社。关于农奴制的经济含义和俄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发展，则始终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③俄国人的思想与俄国的实际发展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尤以被流放西伯利亚偏远地区长达 21 年之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甚，而他又是列宁主义思想的主要源泉。

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和对农民的恐惧，阻止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工业发展可能性的任何严肃思考。^④俄国知识分子多数主张维持乡村公社并使其存续，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工业发展的社会后果批判上，尽管当时俄国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北欧国家。所以，格申克龙认为，如果不将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特殊偏好与该国的落后状态结合起来，就无法理解为何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总体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就无法理解俄国革命。^⑤俄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倾向与偏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农民的价值体系以及总体的落后状态之中。俄国政治发展的落后，使得现代形式的政府的发展滞后，没有容纳知识分子的政治舞台与空间，“俄国的专制政府有效地将知识阶层的大多数人排除于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之外。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转化为行为，他们也就始终不能影响（更不用说决定）俄国经济发展的性质。”^⑥然而，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 189-190 页。

② 同上，第 191 页。

③ 同上，第 191、201-204 页。

④ 同上，第 197、212 页。

⑤ 同上，第 213-215 页。

⑥ 同上，第 216、218-219 页。

他们虽然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施加影响，却将整个知识阶层对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脱离实际而又否定性的态度传达给了大学生与青年。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逐渐激进化。

第三，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激进的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19世纪的工业发展，并不必然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取决于一个正处于经济高涨和工业化启动阶段的国家的落后程度。法国的工业化是由一群公开声称是社会主义信条（即圣西门学说）的狂热支持者的大企业家所维系，德国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圣西门学说来推进工业化。因此，在比德国还要落后得多的俄国，这一角色由更加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来承担，^①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格申克龙认为，俄国知识阶层与工业进步之间一种“迟到而又不够稳定”的正向关联，正是通过19世纪后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它接纳了民粹主义的多数的特殊要素，但同时让知识阶层接受了俄国的工业化。^②但是，激进的意识形态与工业化之间的联系，往往只是现代经济快速爆发的第一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激进主义思潮会不可避免地消退。圣西门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如日中天，但仅仅过了25年便烟消云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随着斯托雷平改革的顺利推进也日渐衰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俄国的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从而使得日渐衰退的激进主义又一发而不可收拾。

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金雁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与东正教独特的弥赛亚情怀（包括革命的弥赛亚），与民间分裂教派及民粹主义关系最大。结构主义的研究则认为，俄国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国家间政治的作用存在，并不因其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下就能自动发生。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和基层农民社会及其平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第30-31、103、225-227页。

② 同上，第220-222页。

均主义的认知与客观现实间的鸿沟,催生了俄国的分裂运动和民粹主义,也催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西化、反工业化的特征。俄国土地和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稀缺,而有效的耕地面积也稀缺,不彻底的农业改革使得农民始终未能成为自由流动的经济因素,富余的农民也始终未能成为俄国工业化的推动力。而不断加强的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强制使得人-地矛盾凸显,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严重困扰沙皇体制和社会秩序的棘手难题,落后的经济和工业化状况才是激进主义高涨、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evaluate the causes,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rough reviewing the works of S. N. Eisenstadt and Jin Yan (culturalism path), Barrington Moore and Theda Skocpol (class as the center of structuralism path) and Alexander Gerchenkr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s center). According to culturalism, one nation's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 themselves breed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e.g. the impulse to salvage in 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 is therefore inevitable. While structuralists hold that revolution takes place due to structural context,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factor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s. Revolut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occur without structural conditions.

【 Key Words 】 Culturalism, Populism, Structuralism, Class Struggle, Industria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анализа изучающих механизм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ультурализма Айзенштадта и Цзинь Яня,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Мур и Скокпол,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классовом делении, и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Гершенкрона,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попытку ещё раз провести оценку природы и причин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 Культурализм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в сам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уже скрываютс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чувство спасения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поэтому революция неизбежна. А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же считает, что революция имеет сво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условия,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факторы, специфика внутри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есл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структурных условий или их устранить, революция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оизойдет.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ультурализм,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郝江东*

【内容提要】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关键词】雅尔塔会议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 02-0095(28)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国在雅尔塔举行首脑会议，会上达成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根据这一秘密协定，1945年8月，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两个条约基本确定了战后东亚秩序，也确立了战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战后初期，苏联对华

* 郝江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策体现出明显的“双轨”性，一方面，为了维护苏联在上述两条约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斯大林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交涉对象，并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为确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斯大林先是对抗联教导旅进行部署，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并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种战略性关系。本文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引言

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基本目的是维持与西方盟国的战时合作关系，巩固与维护苏联获得的一系列战略利益，为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意识形态、传统“不安全”感和“国际主义”的驱使下，斯大林围绕苏联周边构建起了辽阔的安全地带，巩固与确保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二是从战后重建与现实考虑出发，斯大林期望同美国保持战时形成的友好与合作关系，以获得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并赢得一段相当长的和平发展时期。^①在此对外战略框架下，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即是维护由《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构建的远东秩序，巩固得自上述两个条约的利益。

对此，有学者认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②有学者结合俄罗斯传统“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认为战后初期斯大林在远东沿用了与英美之前在欧洲的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1997;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9, Vol. 104, No.2, pp.501-524;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Зубок В.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ёва.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1.

② 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43页；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根据俄国档案的新材料）”，《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7页。

解决办法，即同美国以中国长城（包括朝鲜半岛三十八度线以北）为界，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①德国学者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也持这一看法，认为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是建立一条缓冲带，以确保“在日本、朝鲜半岛和满洲站住脚，在新疆保持一定的影响，确保对外蒙古的保护人地位，以及阻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存在”。^②

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牛军认为，战争结束前后，中共只是被“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③张盛发提出，正是基于“对共和中国革命存在着偏见”与“保障建立于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苏联“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④沈志华认为，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对于中共的态度“完全依苏联在中国与蒋介石以及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⑤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则指出，直到1948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斯大林一直认为中国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其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避免中美两国针对苏联利益而在战后结成联盟”。^⑥

本文以已解密的中、苏、美三国外交档案材料为基础，重新梳理1945年8月前后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寻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双轨”性及其形成，以及这一政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61页；徐蓝：“雅尔塔体系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双重影响”，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② [德]迪特·海因茨希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李丹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③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二期，第181页。

④ 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7-58页；《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8-99页。

⑤ 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1948-1949）研究之一”，《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3页。

⑥ [挪]文安立著：《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战后苏联：“不安全”者

研究战后初期苏联的国内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是考察斯大林战后初期对外政策的基础。对德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苏联的政治军事实力与国际威望。战后的苏联成为国际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政治、军事强国，并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国一同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苏联在战争过程中建立的辽阔势力范围也得到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认可。^①然而，战争对苏联造成的破坏也是极为惨重的。据苏联官方统计，战争几乎夺去了苏联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以及约 3000 万人的生命。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丧失了 1700 座城市，约 70000 个村庄，98000 个集体农庄，31850 个工厂企业，1135 个矿场，此外，还有 700 万匹马、1700 万头牛及不计其数的家禽。1945 年，遭到侵占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仅相当于战前的 30%。^②

战争造成的“外强内弱”，严重影响到了苏联领导人对战后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过程。其间，战后苏联国家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对外防御、对内进攻”。所谓“对外防御”，即是谋求同战时盟国在战后继续合作，维护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政治利益，包括利用战线的推移构筑起辽阔的势力范围等等。^③所谓“对内进攻”，则是因为战争对于苏联的巨大破坏，巩固国内政权的统治地位，对内进行一系列强化统治的举措。

早在 1942 年 1 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成立了莫洛托夫领导的“关于战后欧洲、亚洲与世界其他部分国家建设方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框架下有三个工作小组：负责西欧、北欧和大英帝国提案的小组；负责中欧、东欧和东南欧，以及近东、中东地区提案的小组；负责西半球、太平洋地区和东亚提案的小组。到 1943 年秋，这些小组已就战后世界的重建形成了一系列详细的方案，对苏联与美英举行的有关国际会议产生了重要的作用。^④

① Филиппов А.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8 гг.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10.

② [苏]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0 年，第 751 页；Никулин В.В, Слезина.А.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6-1991 гг.). Тамбов.: ТГТУ, 2005. С.1.

③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ВЕСЬ МИР, 2001. С.351.

④ Пыжиков А.В., Данилов А.А.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1945-1953 гг.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17.

与此同时，1943年间，在战争初期不利局面已被打破的形势下，斯大林突然解散了共产国际。这当中虽有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的意图，但斯大林考虑更多的还是着眼于战后同西方的合作。^①到1944年初，苏联政府相继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后世界的构想，比较重要的有：驻英大使迈斯基（И.М. Майский）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1944.1.11），驻美大使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的《关于苏美关系问题》（1944.7）与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 Литвинов）的报告（《关于同美国的关系》（1945.1.10）、《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1944.11.15）、《关于区域和势力范围问题》（1945.1.11））。这三份报告虽然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均强调了战后苏联与西方，主要是英、美国家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迈斯基的报告建议苏联政府“建设未来和平与战后秩序的具体目标，应当是构建这样一种状态，在未来长时间内保卫苏联的安全与世界和平——至少在欧洲和亚洲。”对于这个“长时间”，麦斯基估算为“最少30年，最多50年。简而言之，所指的是两代人的时间。”他建议在战后时期苏联的外交政策应“巩固同美英的友好关系，……推动苏联成为对所有真正民主的中小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真正的民主因素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尤其是在欧洲。”^②

在1944-1945年间，斯大林实际上也曾向美国方面正式提出了关于战后援助的问题。^③1946年，法国一家报纸披露了斯大林与罗斯福签署的一份不为人知的文件，该文件签署于两位领导人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晤期间。文件内容包括，在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将向苏联提供6亿美元贷款以缓解后者经济发展困难；此外，还将提供4亿美元作为购买食品之用。文件披露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并未直接否认该文件的真实性，而只是提请斯大林注意。斯大林的回应也耐人寻味，他说“我不记得，我曾与罗斯福签署过关于这类问题的协议。不过，可能在三国会议期间的某次单独谈话中，罗斯福曾

①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4. С.323.

② 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документ Т.1. 1944-1948. М.:РОССПЭН, 1999. С.23-48.

③ 崔海智：“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93-121页；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

承诺过什么，而这些谈话与承诺在某些备忘录中被记录了下来”。^①不过，根据该协定中其他条款均已基本兑现的情况，这份协议应该是存在的。

1944年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斯大林充分肯定了英美等西方盟国对苏联的帮助，强调苏联一贯主张与邻国保持和平与友好。他说：“应当惊奇的不是存在分歧，而是这些分歧竟是如此少，并且它们通常都被三大国以团结统一的理念与协商一致的行动解决。……苏联、英国和美国同盟的基础不是偶然与短暂的，而是非常重大与长远的利益。”^②这突出地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战后继续维持合作的想法。

然而，与此同时，1941年遭受突袭的惨痛记忆，传统的战略弱点——平坦的东欧平原、易攻难守的边界、薄弱的武力投送能力，以及战争对苏联造成的巨大破坏等等，都如梦魇般笼罩着斯大林。为此，随着战线的不断推移，斯大林沿着苏联西部边界构建了辽阔的安全地带，将自身的制度与影响力扩展到了这一地带的中东欧国家。不过，诚如美国学者沃捷特科·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所指出的，辽阔的安全地带并未给斯大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③1945年原子武器的诞生，强烈冲击了俄罗斯“以空间换时间”的传统战略思想，加深了斯大林的“不安全感”。更何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被信任的。而西方自1920年代起对苏联的干涉、封锁与孤立，也令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记忆犹新。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苏联一步步走上了冷战之路。^④

这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点，对战后苏联对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迈斯基的报告中也有涉及到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内容。

① Пыжиков А.В., Данилов А.А.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1945-1953 гг.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20-21. 黑体字为原文作者标记。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Том II. М.: ОГИЗ, 1946. С.47-48.

③ Melvyn P. Leffler,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4.

④ [美] 沃捷特科·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1页。

报告指出“在远东，苏联应当尽可能深地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尽最大可能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不过，苏联支持中国转变为真正世界强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程度，应当基本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进程。如果这一发展趋势在中国与中国政府内均真实地朝着民主、民族进步与不断加强和巩固与苏联关系，很自然，我们的援助将会加强。可以想象到的情况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推动中国强大对我们绝没有益处，因为在某种情形下，它将成为苏联的重大威胁。”他指出，中国将成为战后世界四大国之一，但却是一个“名义上的大国”。不过报告也流露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忧，“目前美国人正积极在阿富汗的西部与北部、在阿拉伯、在伊朗扩张势力。特别是，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中国”。^①这种担忧对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斯科谈判：咄咄逼人的盟友

迈斯基的报告建议“苏联应当从这场战争中获得远东的南萨哈林与千岛群岛”，而“不必在远东放一枪”。^②事实上，从此时起，随着对德战争形势的好转，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也开始认真思考远东布局。相对于西线对德战争的硝烟弥漫，苏联虽然“东线无战事”，但却始终呈现着一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苏两国实际上在这一地区也发生过两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正是由于日本关东军的威胁，苏联即便在卫国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也不得不在远东地区常年保持70个师的兵力。^③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不过，相对于在北非、欧洲以及太平洋战场上盟军部队的势如破竹，中国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战争正将这个古老的国家拖向灾难的深渊。1944年4月至12月，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地区的空军基地，日军发起了豫湘桂会战。在日军的大规模攻势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中

① АВПРФ. ф.06. оп.6. п.14. д.145. л.1-41.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документ Т.1. 1944-1948. М.:РОССПЭН, 1999. С.35-36.

② Там же. С.35.

③ [日]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150页。

国战场形势严重恶化。1944年7月，罗斯福在夏威夷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会见时正式决定，美军下一步在太平洋的作战应当在菲律宾中部，而不是台湾和中国沿海。^①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认真考虑，如何促使苏联在欧战结束之后参加对日作战。^②

1945年2月，美、英、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对日作战的主要条件，并征得了罗斯福的同意。这就是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规定：

(1) 外蒙古维持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

(2) 恢复由于日本背信弃义进攻所侵占的属于苏联的权益，包括：

甲、南萨哈林群岛及其附属岛屿归还苏联；**乙**、保持大连港的贸易自由地位，维护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恢复旅顺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地位；**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保持全部主权；

(3) 库页岛转交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征得中国蒋介石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斯大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决议，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③

根据这一协定，苏联不仅收回了沙俄政府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并且沿着苏联远东边界，构建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人则取得了苏联对日作战、以及苏联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承诺。然而，秘密协定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比如对外蒙古“现状”的解释，对东北的“苏联的优越

① [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白、曾学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24页。

②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③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 Том IV.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4. С. 261-262;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41页。

权利”的解释等等。但在1945年初雅尔塔会议举行之时，欧洲战场上战争仍在继续，关于战后秩序的安排问题又纷繁复杂，在紧张的会议日程中，罗斯福和斯大林都避免就细节问题陷入可能的无休止的争吵，而希望尽快达成妥协，将关于细节的讨论放到以后进行。但“协定的模棱两可性质很快对双方都成了一种负担”^①，并很快就体现在1945年7-8月间中苏两国基于雅尔塔《秘密协定》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

对于美苏两国而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双方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是双方安排战后东亚秩序的最终合拢一环。因此，在1945年6月15日，杜鲁门即通过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告诉蒋介石，并且同时致信斯大林，告知双方，美国将不干涉中苏之间的谈判，强调“美国政府将遵守雅尔塔协定”。对此，斯大林回信表示感谢。^②即便如此，苏联方面对美国的意图仍是疑虑重重。时任苏联驻华外交官的费德林在发回苏联的报告中指出，宋子文的苏联之行是“在美国积极与直接参与下准备的”，而美国促成中苏关系调整目的首先是“追求自身利益”，其意图在于“用任何手段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借苏俄之手战胜日本，再达到自己在太平洋的统治”。^③

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的宋子文当天晚上就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斯大林表示，“以往沙俄政府意图分裂中国。现在俄国政府尊重中国的主权与完整”，表示对双方达成协议确有把握。^④会后，宋子文即拜访了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督促宋子文“努力就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正式协议”，因为“以后不会有比目前更好的机会了”^⑤。然而，正式谈判刚开始，即陷入了僵局。苏联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关于外蒙“现状”词汇的模糊解释，坚决要求外蒙独立。斯大林强调：“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

① [挪]文安立著：《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гг. Книга 2: 1945г.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С.58-59.

③ АВГРФ. ф.06. оп.7. п.36. д.509. л.6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82-84.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71-72.

⑤ FRUS, 1945, vol.7, p.911.

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日人业已试过，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他说，“吾人对旅顺、中东铁路、库页岛南部及外蒙之要求，均为加强吾人对抗日本之战略地位，以上要求无一基于寻求利润之考虑”，“苏联已作战四年，且流血甚多，……人民谓吾人业已结束一战事，而汝又掀起一新的战争，日本人并未犯汝，而汝攻日，余将如何证明攻日之为正当乎？^①无他，余只能谓为加强吾人之力量。”^②

对此，美国方面颇为反感，但考虑到迅速结束对日战争，此时仍寄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因而不愿与苏联产生太多的齟齬。关于外蒙问题，早在1945年3月，罗斯福就曾告诉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③。不过到6月初，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对宋子文强调，外蒙问题应“暂予搁置，即目前暂不讨论”^④。7月4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诫驻苏大使哈里曼：“美国政府为雅尔塔协议中与当前中苏谈判有关的任何词句提供解释是不明智的”，并要后者转告宋子文，“虽然外蒙古‘在法律上’主权仍属中国，但主权‘实际上’并没有实行。”^⑤7月6日，贝尔纳斯再次致电哈里曼，强调要避免充当雅尔塔协定的解释者而被牵扯到中苏谈判中去。^⑥美国态度的变化，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战事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顾及到苏联方面的疑虑，而尽量谨慎。对此，宋子文表示理解，但强调“没有一个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国政府能够生存下去”。^⑦中苏谈判遂陷入僵局。

7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再三考虑，乃知斯大林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遏其欲

① 斯大林将在外蒙等地的权益要求，视为对国内民众“证明攻日之为正当”的重要理由，就战后亟待恢复社会经济的苏联也是合情的。实际上，在苏联对日作战的远东部队中，也的确补充了大量的政治委员，以从事士兵的思想工作。参见Бой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Корее: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1-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рон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Приморское краев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и полиграфии, 1945.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76-590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3-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73-82.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42-543页。

④ 同上，第555-557页。

⑤ FRUS, 1945, vol.7, pp.914-915.

⑥ Ibid, pp.916-917.

⑦ Ibid, p. 915.

望。……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①次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强调“若我国内（包括东北和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待兄回国报告后，再对苏作正式答复”。^②为谨慎起见，蒋介石紧接着再发一电给宋子文，提醒后者对苏交涉的目的为，“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为防止苏联在外交辞令上做文章，须明确要求苏联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必须剖切明白”。^③

在7月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向宋子文保证，“如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蒋介石政府”。^④9日的谈判中，宋子文决定就外蒙问题让步，表示为中苏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将“在战事结束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斯大林的“回馈”是：（1）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2）“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共产党，“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政府”；（3）同意帮助国民党政府剿灭新疆匪患。^⑤10日，中方要求苏联就上述三点提供俄、英两种文本的书面保证。^⑥至此，谈判的第一阶段结束，外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谈判的遗留问题主要集中在东北。

在7月2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为了“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地”，建立国防“求国内之统一”，必须放弃旅顺与外蒙。他指出，对俄政策的目的是“（一）孤立中共使之就范。（二）巩固统一实施建设。（三）用国际形势与政治力量制服中共。（四）使俄对东方安心专力防欧”。^⑦在同一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会谈中，蒋介石向后者表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①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2586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3-594页。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2591页。

④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19-2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86-9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8-604页。

⑤ Там же. С.105-112.

⑥ АВІРФ. ф.06. оп.7. п.35. д.506. л.33-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123.

⑦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是比波茨坦三国公报“有力与重要得多措施”。^①

1945年8月5日，中苏谈判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由于原子弹试制成功，日本战败的迹象已经显露，苏联出兵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同时，中苏谈判过程中苏联愈发明显的独占东北的态势，已经严重威胁到战后美国东亚的长远发展^②，美国人遂开始介入谈判，要求保障东北未来的“门户开放”。8月5日，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指示后者提醒斯大林不能再要求中国让步，并要求斯大林履行在东北地区“门户开放”的口头保证。^③8月7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七次会谈。在谈判中，斯大林坚决要求对大连港进行共管。在8日同哈里曼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港口和铁路都是俄国出资、俄国人建造的”，认为“大连港不能在军事区之外”，应是中苏共管，并说“中国人已同意整个半岛应是军事区域”。对此，哈里曼反驳道，“中国人建议将大连划在军事区域之外”。斯大林强硬地表示“这只是他们现在的说法”。^④此时，苏军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已基本就绪。

1945年8月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次日，日本即发出乞降诏书。形势突变给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带来极大压力。宋子文电告蒋：“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⑤斯大林也希望尽快取得谈判结果，以确保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中苏联所获得利益的合法性。因此，他警告中方代表不要拖延时间，并威胁中共部队将进入东北。在10日举行的第八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不干涉新疆内政、尊重东三省主权，以及一切援助都给国民政府等问题对中国代表团作出保证。^⑥13日举行的第九次会谈中，斯大林要求将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合并，并坚持由苏联公民担任铁路局长，强调“中

① АВП РФ. ф.0010. оп.33. д.14. п.244. л.195-19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148-149

②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③ FRUS, 1945, vol.7, pp.955-956.

④ Ibid, pp.960-965.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44页。

⑥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82-9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164-16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45页。

国将不得把大连港口设施租与第三国人士”等等。^①形势的发展迫使宋子文基本接受了斯大林的要价，谈判双方的重大分歧基本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美国政府数次要求苏联就中国东北地区“门户开放”作出声明，但均遭到后者的拒绝。^②

8月14日^③，中苏双方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附属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的三个附属协议。同日，中苏还就外蒙独立、苏联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东北三省主权以及新疆问题等，互换了照会。双方协定，苏军将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完成撤军。^④

8月24日，在条约经中苏两国批准后，双方领导人互致贺电。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强调：“深信今后两国政府根据此条约，将能表现互信互助之精神，以尽力为中苏两大国家及全球造成幸福及繁荣”。斯大林复电称：“余确信此项条约及协定，将为进一步发展贵我两国友好关系之坚固基础，藉谋两国人民利益与繁荣及远东与全世界和平及安全之巩固。”^⑤27日，贝尔纳斯在对新闻记者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称“这是联合国成员无论在平时时期或战争时期继续联合和互相帮助的实例”^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美苏远东战略框架最后合拢的一步。按照这一框架，美苏双方在远东基本实现了战略上的均势，即便是“丧权”的国民党政府，也得到了令自己满足的交换条件。然而，这一战略框架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其一，美苏远东战略的基点是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即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能否较好地处理国内事务，保持“蒋之下的和平”。事实证明，这是“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即实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种种安排

①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2. л.82-9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182-184.

②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Политгиздат, 1984. С.486.

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实际签字是在8月15日清晨6时，但因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复于15日晨2时到达莫斯科，故苏联政府对外广播中苏条约已于8月14日签订。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327-1340页。

⑤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日第2版。

⑥ FRUS, 1945, vol.7, p.981.

最终均取决于中国内部国共问题的解决方式”^①；其二，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忧惧始终困扰着苏联人，随着战后国际与中国内部局势的复杂变化，这种忧惧日益强烈。

对于苏联而言，通过这场漫长的谈判，斯大林实现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几乎所有利益，确立了战后在中国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纵观整个谈判过程，斯大林在外蒙、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远东布局的几个关键点上，从未作出过实质性的让步，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因此，此时的斯大林自然不会支持中共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他很清楚美国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扶蒋政策。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就对日作战提出一系列涉及中国利益的要求时，罗斯福就坚持加入“须经过蒋介石委员长同意方才成立”的条款，其实就是向苏联传递一种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并暗示后者也应维护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唯一领袖。因此，为了维护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保持同美国的合作关系，谋求远东的战后和平局面，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对象只能是国民党政府。

这一时期，斯大林的确也不太信任中国共产党。在他看来，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以农民为主的中共充其量只是个“农民党”，毛泽东不过是中国的普加乔夫。无论是革命形势，还是中共的性质与力量，都不足以在这一时期推动中国革命运动走向胜利。^②但斯大林固然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却也绝不允许国民党政府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毕竟，在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唯一潜在的战略盟友。这是斯大林电令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重要背景。

重庆谈判：沉默的旁观者

1945年的重庆谈判，同该年内的雅尔塔会议和中苏谈判存在着直接而内在的联系。在中苏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以在外蒙、东北地区作出的巨

① 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85页。

② [挪] 文安立著：《冷战与革命——美苏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第9页。

大牺牲，换取了斯大林不支持中共、承认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承诺。因此，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重庆谈判的意义还在于履行“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①代表国民政府同苏联签署条约的中国外长王世杰也认为：“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②。

在中共方面，直到1945年4月1日，毛泽东还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表示，不管中国共产党能否得到美国方面的援助，都将继续愿意实行合作的态度。^③不过，毛泽东也很清楚美国政府的扶蒋态度。因此，当4月5日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后，中共领导人对于来自苏联的“国际援助”的期待开始急剧增强。^④在4月24日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指出，“苏联，毫无疑问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⑤5月31日，他再次强调“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⑥对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中共方面是有预感的。6月29日，王若飞在访问苏联驻华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Т.Ф. Скворцов）时，曾询问后者是否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并表示不相信苏联会在“对中国的民主化没有专门条款与条件下”就“承认蒋介石为战时中国唯一的领袖”与“参加对日作战”。^⑦

8月9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后，局势变化非常迅速，日本迅速投降。此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都集中在遥远的西南各省，而广泛分布于敌后的中共根据地，则占据了天时地利之优势。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战略部署，要求“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①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2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5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06页。

④ [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⑤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0页。

⑥ 同上，第384、393页。

⑦ 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д.14. п.244. л.99-10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68-71.

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①。8月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连发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内的敌、伪军队缴出全部武装，电令原属东北军各部以及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贺龙、聂荣臻所部等向东北进军。^②13日，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起草致蒋介石电报，“坚决地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中共部队“驻防待命”的命令。^③因此，当8月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中央认为“全系欺骗”。

然而，在22、23日前后，斯大林通过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转来两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强调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会有民族灭亡的危险。^④对这两封电报，毛泽东非常恼怒。他对翻译师哲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⑤。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在此形势下，中国国内的“和平是可能的”，“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⑥会议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发出指示，称对大城市将“不取军事占领政策”，认为“和平建国”是可能的。^⑦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

然而，对于具体谈判过程，苏联方面却是极为冷淡。重庆谈判期间，苏

①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7-225页。

③ “坚决拒绝蒋介石的‘驻防待命’的命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3-2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15页。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1页。

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⑦ “日寇投降后华中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8册），第9页。

联外交部与驻华大使馆接到的指示均是禁止参与国共谈判。^①并且，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离、返延安时，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人员，也都未曾露面，或对国共谈判发表过意见。^②

8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А. Петров），向后者通报了谈判的具体情形以及中共对谈判前景的判断。他对彼得罗夫表示，“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与对中国当前局势的客观评价，以及相应的实际步骤所必需的建议，对我们至关重要”。对此，彼得罗夫只是表示“我认为您是在党政事务中经验相当丰富的人，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与采取正确的措施”。当周恩来询问彼得罗夫，在中苏莫斯科谈判中，有没有签署尚未公布的秘密文件时，彼得罗夫直接予以了否定。^③

9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再次拜访彼得罗夫。毛、周、王均非常关心苏联的态度，询问“在中国爆发国共内战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坚守中立”，以及“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采取何种步骤”。毛泽东非常诚恳地表示，“朋友们的建议与指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常宝贵”。对此，彼得罗夫的反应非常冷淡，仅表示“苏联希望看到中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两党的谈判应当继续下去，并将通过双方妥协而达成一致意见”。^④同日，彼得罗夫拜访了赫尔利，请求后者告知国共谈判的情形，表示“中国人应当自己进行协商，并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协定”。^⑤9月7日，彼得罗夫在同到访使馆的蒋经国谈话中，并未隐讳日前毛泽东的到访，并对蒋经国表达了同样的建议。^⑥苏联方面是以此方式，向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表明对中国事务不干涉的立场。

10月5日，周恩来再次拜访彼得罗夫。在谈话中，周恩来一再强调美苏关系作为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重要性。周恩来认为，“美国当前的统治

① [苏]列多夫斯基：“马歇尔使华与苏中美关系”，《中共党史资料研究》（第七十三辑），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

③ АВІРФ. ф. 0100 оп.33. д.14. п.244. л.205-20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1945г. С.214-216.

④ Там же. С.230-233.

⑤ Там же. С.229-230.

⑥ Там же. С.233-235.

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支持……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的作用”。周恩来还指责蒋介石企图利用美苏关系来影响中国国内形势。当周恩来和王若飞询问苏联对美军在华登陆的立场时，彼得罗夫只是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当周恩来就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寻求苏联使馆方面的保证时，彼得罗夫断然回绝了。他告诉周恩来，“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①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表达了对苏联使馆态度的不满。他说，虽然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但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②不过，据苏联外交档案显示，当日苏联驻华外交官们在向莫斯科的例行汇报中，却均“为中共领导人的所有行为辩护”，认为“他们（中共）是我们思想上的盟友，我们完全支持他们，他们从国民党那里夺取的每一座城市或者其他重要据点，我们都认为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胜利”。^③至于这种矛盾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苏联对外政策反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外交官们受到阶级原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是一种阶级自觉的体现。其二，由于苏联驻华外交官们都经历过 30 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对涉嫌同情阶级异己（国民党政府）而可能造成政治“不可靠”的“自保意识”非常强烈。^④这些极具倾向性的报告，无疑会对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苏联而言，一方面督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却对具体谈判过程“漠不关心”，尤其是，在谈判期间同中共代表团刻意保持距离，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落下支持中共的嫌疑，而招致美国及国民党政府的不满，甚而威胁到墨迹未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影响到苏联在远东地区

① АВІРФ. ф.0100. оп.40. д.7. л.248. л.120-12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年，第 82-83 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19 页。

③ [俄]А.М.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243 页。

④ 同上，第 263 页。

获得的一系列利益。不过，还应注意到的是，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苏军对陆续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部队提供了积极的援助，并与后者初步建立起一种战略性的关系。

东北战场：精明的友人

拥有背靠苏联、毗邻蒙朝的战略位置，以及雄厚的工业、农业基础的中国东北，对于长期期待“国际援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言，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早在1944年9月，中共中央就指出，东北工作“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致电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令他们各组织专门的满洲工作委员会，开展满洲工作。在10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东北工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并开始为此配备干部。^①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根据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有可能对日作战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争夺东北”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占有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立了我们的胜利”，“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②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迅速作出部署，指示靠近东北的各根据地部队积极配合进入热河、察哈尔的苏蒙军对日伪军展开战斗。其中，驻扎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分三路挺进东北。西路部队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进军，于18日与由多伦南下之苏军会师，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中路部队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20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张家口的中共部队也同苏军会师。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等抽调九个团奔赴东北，“乘红军

①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61-263页。

② 同上，第284-285页。

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①。

此时，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莫斯科的态度。中共中央关注的重心是抢占“大中城市与交通要道”。8月20日，毛泽东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中的武装起义。然而，接到斯大林要求毛泽东赴重庆的电报后，在8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分析苏联政策时指出，苏联“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但向东北“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②。8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五个团部队及干部团去东北。^③但8月27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在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的第一条即是“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条“苏联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④

在此形势下，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认为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我党我军在东三省的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指示》要求晋察冀与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以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进入东三省”。“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⑤

① “抽九个团赴东三省”（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③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④ Курдюков И.Ф, Никифоров В.Н, Перевергайло А.С.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57.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 С.205-206.

⑤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7-258页。

在进入东北的过程中，中共部分部队实际上也对苏方的态度进行了试探。9月1日，胶东军区组建的先遣队派出一个排的官兵，携带电台从烟台出发登陆东北。登陆后的先遣队于次日即发出致“斯克沃尔佐夫”请求援助的电报。在电报中，该排官兵声明自己属于“1941年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在日军的围剿下，在1944年间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渠道。“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鉴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电函还表示自己“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苏军）提供帮助”。^①

此外，据另一份苏联档案显示，在8—9月间，来自胶东军区的代表曾携信造访驻旅顺的苏联远东红军第39军。信中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击溃法西斯主义和实现世界和平，你们不顾炎热与无尽的荒漠，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困难、克服了种种困境，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来到我们东北，解放了我们的同胞，并且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败亡……”，“我们能以什么样的方式与红军建立联系，在满洲开展工作？”^②虽然笔者未曾发现苏方的复电，但从事后胶东军区的行动上，苏方的答复应该是积极的。^③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基本大部未遭到苏军的“坚决反对”。根据这些先遣部队发回的信息，9月10日，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致电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速派干部和部队由胶东赴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的判断，并指示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以“迅速发展我之力量，

①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49.2）（壹）》，第74-75页

② Архив МО. ф.394. оп.9087. д.200. л.121-122. Дубинский А.М.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Мысль»,1980. С.262.

③ 另据历史学家牛军考察，抵达大连的中共代表，是同苏军是有过非正式接触的。参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①此外，8月30日，冀东十六分区曾克林部配合苏军解放山海关后，于9月4日乘火车进入锦州。9月5日，该部队一部2000余人乘火车进入沈阳，并在苏军的帮助下成立了沈阳卫戍区。^②

此时，在长春的苏军统帅部并不了解延安中共中央的意图，而且因通讯不畅，曾克林等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未能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为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9月14日，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之命，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贝鲁罗索夫中校飞赴延安，曾克林随机同行。14日上午，任弼时、朱德接见了贝鲁罗索夫中校，后者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正式口头通知：在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介石军队与中共部队均不得进入满洲；已到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应“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决定”。^③当天15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将会见情形及苏方意见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

当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会议决定将中共全国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东北中央局。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刘少奇致各中央局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④该电指示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华中、华北等中央局速派部队、干部抢入东北。9月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与访延安的苏军代表一道飞抵山海关，转乘火车进入东北。9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我们的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⑤对此，毛泽东表

①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的部队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②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著：《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8-176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5页。

④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6-297页。

⑤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8-279页。

示完全同意。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向各中央局、分局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①

1945年9月20日，初抵沈阳的彭真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发展条件甚好，望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兼程前来”。在同日签发的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中，彭真也提到，“昨今两日与苏军方面只作非正式接触，他们表示愿接见我并给以援助”^②。9月30日美军在华北港口大批登陆后，驻华苏军对中共在东北发展的支持愈发积极。10月4日中共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称“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③。应当说，在9月中旬之前，中共部队能协同苏蒙军队对日伪作战，并在同东北苏军交涉中获得援助，多是源于苏军基层官兵的意识形态情结，以及对日伪作战的现实需要。^④至于苏军代表访问延安这样的重大决定，则无疑经过了莫斯科的授意。毕竟，对于莫斯科而言，无论是稳定战后东北秩序、肃清反苏势力的现实需要，还是防止美国势力渗透东北、牵制美蒋独占东北的长远打算，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更为可靠的伙伴。^⑤

据统计，在1945年8-12月间，中共中央陆续向东北地区派出了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其中包括2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9月前后，中共出关部队与苏军协同作战，陆续解放了热河、辽宁全省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南部和西部，先后接管了山海关、锦州、沈阳、抚顺、鞍山、本溪、辽阳、营口、安东、通化、开原、铁岭、四平、齐齐哈尔等重要的大中城市，站稳了脚跟。^⑥可以看到，在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制订与实施

① 《刘少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

②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00页。

③ 同上，第309页。

④ 一个重要的佐证是，这一时期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在同苏军的交涉时，出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场景。有的地方苏联红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很好，有的地方却是很恶劣。

⑤ [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⑥ 伍修权：“配合苏军解放东北”，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著：《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3、155页。

的过程中，苏联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①此外，据苏联档案显示，苏军陆续占领东北各大城市后，曾大量释放中共政治犯，并利用这些亲苏的政治犯组建政权，稳定社会治安。1945年8月17日，总计54名的东北地下党组织代表组建了哈尔滨临时委员会。与此同时，随着东北的解放，在沈阳、大连、旅顺、锦州等也相继出现了中共省、市委员会。在许多工厂也开始有基层党组织活动。这些重新被建立起来的组织，所进行的主要是组织工作，以及推广中共中央与冀热辽边区的文化与报纸。^②

此外，研究苏联战后对华政策，还需关注一支重要的部队：即原东北抗联教导旅。需要指出的是，由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率领的这支教导旅，在1941年前后因日军的“围剿”而退入苏联境内整训，此时就部队建制、后勤补给等而言，已属苏联远东军的一支特种部队。但因周保中等领导人的坚持，该旅始终坚称在原则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当8月9日苏军进入中国对日作战时，由八十八旅的抗联指导员组成第一先遣支队直接参加了在东北的战斗。^③然而，在8月12日，斯大林却突然电令该旅其余官兵暂时按兵不动，并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④。结合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过程以及对日作战的实际需要来看，斯大林此时发出这封电报的重要原因，除了日本关东军的迅速败亡，应该就是宋子文已在谈判桌上让步，满足了斯大林的要价。

不过此后，在8月下旬至9月初，苏军仍命令周保中部署完成了该旅部队对东北三省57座战略城市和县镇的进驻工作。其中，115名抗联指挥员

①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7; Агеенко К., Бобылев П., Манаенков Т. и др.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75.

② Архив МО СССР. ф.292. оп.6980. д.59. л.166; Архив МО СССР. ф.32. оп.11542. д.180. л.70-71. Дубинский А.М.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японо-китайской войны 1937-1945. М.: «Мысль», 1980. С.263

③ 1945年6-7月间，周保中从抗联军中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第一批先遣支队到苏军中进行统一的军事训练。8月9日，这支部队分三部分派到苏联第一、二方面军、贝加尔湖方面军作为先头部队向导，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反攻。周保中：《东北抗日游记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6页。

④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记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7页。

被指派担任了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及助手，153人进入了地方保安团等其他机关。^①9月20-23日，抵沈阳的彭真、陈云听取了周保中、冯仲云、崔庸健关于东北抗联斗争情况的汇报，并要求后者“利用有苏军身份的便利条件，控制铁路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实际上，对于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而言，这支部队也真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据抗联老战士于保合回忆，“八路军和关里来的重要干部都到周保中这里来接洽，尤其是与苏联军队联系问题、对敌斗争问题、装备部队问题，凡是要请苏军帮助的事情，都要通过周保中联系。”^③抗联的存在，对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武装、开辟根据地、与苏军沟通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苏军对日作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事先并未得到苏联方面的告知。苏联方面也并未预见到其后中共部队大批进入东北的情形。联系到苏军对抗联教导旅在东北的部署，以及周保中等人在东北地区实际发挥的作用，应该能推测，在苏军出兵东北之际，斯大林赋予东北抗联官兵的使命中，即应有牵制美蒋独占东北、至少防止东北成为苏联远东威胁的考虑。

与此同时，1945年9-10月间在东北地区中共同苏联的合作，也是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背景。9月14日苏方代表访问延安，9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变全国战略的指示，以及10月初美军登陆华北之后，东北苏军对中共部队愈加积极的援助，都无疑增强了在重庆谈判桌前的毛泽东等中共代表的“底气”。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重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从长远看则影响到了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① ЦАМОРФ. ф.2. оп.19121. д.2. л.3-5; 另参见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② 据原抗联战士王一知回忆，周保中抵达长春的当天，就得到了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的探望。当周保中提出希望苏联方面提供武器支持抗联扩军的请求后，华西列夫斯基说“可着你的力量拿，你要多少，就拿多少，你拿走的剩下的归我。这是咱们的战利品，我们分用”。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通知所有苏军所把守的武器库，“让他们只要见到你周保中批的条子，立即帮助你们运”。参加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63页。

③ 于保合：《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8年，第127页。

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 1945 年 8 月前后苏联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这一时期，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获得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的各项权益，奠定了战后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内，为维护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努力安于“现状”，包括督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然而，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又始终笼罩着斯大林，这反映在斯大林对抗联教导旅的部署，以及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援助等多个方面。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初步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变化，以及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的不断互动，中共与苏联最终建立起了实质性的战略关系。这种战略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背景，也是促使中共在建国后即“倒”向苏联阵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推动着战后东亚地区的秩序实现了一次大转型。

【 Abstract 】 Stalin'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 basically framed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signing of *Secret Agreement* in Yalta and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generally establish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post-war Soviet diplomacy with China. Under this framework, in order to safeguard Soviet fundamental interests, Stalin, on the one hand, actively fulfilled his promises during the negotiation, considering the KMT government as main object of cooperation and urg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for Chongqing negoti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U.S. and KMT's exclusive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talin, first deployed the troops in strategic posi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n provided positive assistance to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 the northeast. Therefore, early after the war, Stalin's policy toward China was characterized by “dual-track” policy, under which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PC was

gradually formed in Northeast China. Thi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PC's national strategy. Based on declassified diplomatic archiv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Stalin's China policy before an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aiming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talin's "dual-track" policy toward China early after the war.

【 Key Words 】 Yalta Conferenc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Stalin, the CPC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основные рамки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Подписание Ялтинского «тай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в основном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основные рамки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В данных рамках, с целью гаранти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алин,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активно выполнял сво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 переговора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оминьда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партнёра п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призывал китай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прибыть н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в Чунцин;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из-за опасения занят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собыми агентами США и Чан Кайши, сначала планомерно развёртывал войска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месте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а затем оказывал активную помощь китайски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войскам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лась «двойственностью». В условиях такой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ей Китая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постепенно 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оказа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реализац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ПК. Используя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итая, СССР и США, анализируя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а до и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можно изучи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Ялти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Сталин, КПК

(责任编辑 李恪)

中国领袖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 与政党利益的权衡（1921-1966年）

邱海燕*

【内容提要】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交错。从孙中山“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换取苏联最终选择扶持国民党，到蒋介石骗取苏联顾问信任，并在崛起后迅速“变脸”，抗日战争时期又力争“与苏共存”，委曲求全至忍无可忍。从苏联亲手点燃的中共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发展成燎原之势，到建立新中国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懑，决心与苏斗争到底。如果说，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是：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选中了他；蒋介石对苏联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毛泽东的不满，则是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的苏联交手，这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关键在于，他们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作出了抉择，而结果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美关系的走向。

【关键词】中苏关系 中苏党际关系 中苏领袖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5)02-0123(31)

* 邱海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的新思潮。1921-1966年中苏关系的四十五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苏联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领袖的作用则更为关键。苏联运用外交手段和通过国际共运对中国施加影响，以达到维护其本国利益和在华利益的目的。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曾先后应对苏俄上述两方面的挑战，在中国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中作出抉择。其结果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苏关系的走向。

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它具有双重概念：一是指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即政府利益或政府所代表的全国性利益，（Interest of State）。另一概念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即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在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指的是由人口、领土、政府和国际承认四要素构成的一个政治单位，是全民性的政治概念。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即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的利益。它代表的是一个政治集体的利益，而不是政治集体中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国家利益是由一国政府来代表的。在一些国家里，政府由执政党来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利益就代表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而执政党的利益是执政党追求的政权利益，是执政党主观意志的表现。在一定条件下，执政党的利益会与国家利益相重合，或与国家利益相悖离。^①

领袖是政党的人格化代表。对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来说，当他们的政党未取得全国政权之时，他们作为政党领袖，只代表本党的利益。而当蒋介石、毛泽东成为中国领袖之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需面对与苏联相同意识形态的中共的挑战；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和新中国则要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苏联的指导和批评。他们所领导的政党作为执政党，其所追求的政党利益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中国国家利益，会相互重合，也会相悖离。

① 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页。

在中苏关系中，中苏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辅线。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与国、共两党对各自政党利益的权衡，是蕴含其中的隐性因素。本文以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为研究主体，以他们对苏决策中的利益选择为主线，以 1921-1966 年中苏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为案例，对三位领袖在对苏决策过程中对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进行比较分析。

一、孙中山对苏决策中的利益选择

（一）孙中山政党利益的选择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影响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革命家，从 19 世纪末起就投身反清、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革命的成果就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孙中山奋起抗争，屡遭挫折。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①后，再次的失败令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探寻中国的建国之路。孙中山意识到“武人官僚断不可与为治，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②1919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命党部正式通告，“本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③，并随即颁布规约。孙中山开始党建的目的就是整合本党力量，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也是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政党利益目标。

同期，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正面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和协约国的联合

① 1917 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对西南护法势力进行讨伐。孙中山虽被推选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倍受军阀、政客排挤，不得不于 1918 年 5 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②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06 页。

③ “中国国民党”区别于 1912 年成立的国民党（由五个党合并组成）。1913 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1914 年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员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但并未开展党务活动。1917 年国民党总部通令党内各部恢复国民党名义，但各支部并未及时落实。

绞杀。在中国东北的中东路区^①，北京政府遣散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②后，路区出现复杂局势，反苏俄的力量大于革命力量。中东路区成为反革命力量的避难地和进攻苏俄的后方。日、美两国也加紧了对该地区的利益争夺，分别拉中国参加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1918年北京政府酝酿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联手对苏的时期，也是北京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进行镇压的时期。此时“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成为苏俄与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利益契合点。对于北京政府准备与协约国一起武装干涉苏俄，南方非常国会大元帅孙中山表示强烈反对。4月29日，非常国会就通电反对这一类的协定。列宁收到这一通电后，非常感动，称“东方的光明来了”。^③孙中山对北京政府的反对及相应的对苏倾向，必然会影响到苏俄对华政策的制定。

依当时形势，苏俄自知收回中东路无望。此时恰逢1919年举行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在会上，美国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希望以此换取日本成为在远东对付苏俄的主力。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在“五四运动”的感染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列宁看到中国人民觉醒的力量，苏俄政府进而树立了对华政策的目标：让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苏俄手中得到，与中国建立反日同盟；离间日美关系，借美国的力量削弱日本。因此北京政府成为苏俄必须联系的对象。但与此同时，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④在列宁的领导下于莫斯科成立。所以在对华政策上，共产国际和

① 为实现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1896年沙俄政府通过贿赂清重臣李鸿章，并与之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达到了“借地接路”的目的。根据1896年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和1898年的《东省铁路续订合同》，沙俄获得在中国东北修建“东省铁路”（1920年由北洋政府交通部接管后改称中东铁路）的权利。在东省铁路修筑期间，沙俄就不断违反“铁路合同”，“展地”并扩大特权，逐渐在铁路沿线形成庞大的路区，把路区变成了实际上的俄国殖民地。

②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6月在哈尔滨成立的革命组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接受列宁的指示，在路区夺权，因牵涉中国主权，导致中国干涉，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被北京政府遣散。

③ 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2期，第14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④ 1919年列宁发起建立的世界共产党国际组织，又称第三国际，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1943年解散。它的职能是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开展。

俄共决定“利用南北两方的战争促进社会革命”。^①苏俄对华政策遂按照上述方针展开。

（二）孙中山对苏政策的真实倾向

一方面，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使者走马灯似地来到北京^②；一方面，苏俄的另一外交执行部门（即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则加紧在中国南方的活动。马特维也夫·鲍德雷、魏金斯基（吴廷康）、波塔波夫、波波夫、刘谦等从不同渠道来到孙中山的府邸，向他宣传苏式共产主义或同他讨论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计划。^③面对苏俄的示好，孙中山却心向美国。1920年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后，寄往美国。但美国把北京政府视为交往与援助的对象，并不想与孙中山有进一步的交往。^④

1920年6月18-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孙中山和列宁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向孙中山发出电报，并邀请其访俄。但是孙中山的回电并未表示马上去苏俄，也未就承认苏俄等事项作出回

① “魏金斯基致佚名者的信（1920年6月）”，《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8页。

②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以“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废除19世纪90年代起的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常说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北京政府于1920年3月26日正式收到《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北京政府也开始适当地调整对苏政策。1920年3月北京政府驱逐旧俄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使苏俄重返中东路成为可能。同年9月开始的“取消旧俄使领待遇”，则为中苏建交谈判开启了大门。1920年6月北京政府派出陆军中将张斯麟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苏。10月5日张斯麟把《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电告北京政府，此次《宣言》不再提中东路“无偿归还”，而是要“另订条约”。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于1920年6月第一次来华。北京政府对优林商务使团也给予接洽。待1921年9月优林第二次来华时，苏军已占领库伦。优林对外蒙问题再三推诿。适逢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苏俄害怕中国将中东路问题提交会议，使中东路问题国际化，因此派裴克斯使团来华。此时，北京政府已基本收回中东路路权，并且根据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的《东省铁路续订合同》对铁路暂行管理。由于优林在外蒙问题上出尔反尔，北京政府对苏俄已不信任，对裴克斯也不予理睬。

③ 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

④ 参见[美]罗伊·沃森·科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英、曾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

答。^①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孙中山，要求恢复贸易关系。此信到达孙中山手中已经是1921年6月14日，此时他已就任非常大总统，正在争取各国承认。对于苏俄的建议，孙中山则表示等到他取代北京政府，执掌全国大权后再谈。^②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6月来华，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帮助中共建党期间，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情况。1921年12月马林访问正在桂林大本营的孙中山。孙中山虽与苏俄早有通信往来，并接见过一些慕名前来的俄国人。但他与同僚早年接受的是欧美等西方教育，对苏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不看好。马林却看到国民党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潜力，转而以提供军事援助的允诺拉拢孙中山。孙中山希望得到英、美援助却始终未能实现，港英当局还把他视为影响其殖民统治的不安定分子。尽管如此，当1922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访问孙中山时，孙中山仍表示出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不认同，向客人详细介绍自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并引用亨利·乔治的“民有、民治、民享”说明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借鉴。^③由此可见，即使在苏俄使者面前，孙中山的政治立场也是明确且不加掩饰的。但他还是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机关代号1001，目录2，案1362。信的俄译文公布于苏联《亚非人民》（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杂志1963年第1期，第72-73页。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61-62页。

② 薛衔天、李玉贞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71页；《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91-594页。

③ 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谨慎地向达林探询，“苏俄能不能像在蒙古一样^①，在满洲发动政变？”因为他认为，在击败吴佩孚后，出关与张作霖决战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了。^②虽然“蒙古”和“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但“打败各路军阀”是国民党政党利益的目标。综上所述，孙中山似乎更看重国民党的政党利益。既然苏俄愿意借力，那就探询互利共赢的可能性，这才是孙中山对苏政策的真实倾向，

（三）孙中山转向联苏、联共

1917年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从军事上支持孙在广东的发展。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失去了依恃的力量。孙、陈关于北伐的矛盾公开化。此时孙中山处境艰难，但他仍未放弃武力统一中国的想法。在永丰舰上，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想到了苏俄，这对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是重大的转折。他表示，“如果我没有可能到苏俄去，我现在甚至可以不去上海，而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息，但是我坚信，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③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的思想向联苏、联共迅速转变。

共产国际也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当中确认了孙中山为其联合对象。1922年8月苏俄派越飞使团来华。12日越飞抵京。马林随越飞代表团来华后，立即着手准备国共合作。15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在会见越飞时，开

① 1919年11月外蒙呈文中央，要求撤销自治，实行中央直接统治。北京政府派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督办外蒙撤治善后事宜。在徐的整治下，外蒙革命杜马被取消，当地亲日派力量大增，亲俄派力量受挫。这些情况引起了苏俄方面的注意。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建议改变对外蒙的策略，即通过与外蒙有族源关系的俄国人策划发动外蒙古革命，阻止中国中央势力和日本势力进入外蒙。远东共和国成立后，白军开始向外蒙地区奔窜。白军恩琴攻陷库伦后，苏俄加快了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步伐。3月13日，蒙古临时政府在恰克图成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赶走中国军阀和白军。1921年3月和6月，远东共和国和苏俄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出兵外蒙的要求，北京政府虽拒绝苏俄单独进剿，但并不反对两国协剿。苏俄和远东共和国的目的不仅要消灭白军，还要赶走中国军队，于是他们一起杀向外蒙，7月16日占领库伦。恩琴在逃出外蒙的途中被抓获枪毙。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外蒙。苏俄出兵外蒙的目的达到后，扶植外蒙建立政府，并在外蒙驻军，对中国军队进军外蒙古形成威慑。

② C.A.达林：《中国回忆录》，莫斯科1981年版，第136页。

③ 同上，第149页。

宗明义地讲，如外蒙撤军问题“能迅予办理，其他各问题亦必易于解决”。越飞辩解说，苏俄驻军外蒙是应当当地“华人、俄人和蒙古人”的请求，并申明，他此次来华的双重宗旨之一，是“对于凡是能自立之国家，尽力予以扶助”。这里所说的“自立之国家”，一是指外蒙，二是指孙中山代表的南方政府。^①

（四）《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对苏决策中国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

如前文所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政党利益目标就是打败各路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甚至可以向苏借力，互利共赢。在陈炯明叛变后，他为坚守这一利益目标，完全转向联苏、联共。但其实早在1918年孙中山就萌生了联合德俄，从中国西北进军攻打并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还曾派遣当时在德国的曹亚伯向德国外交部转达了中德俄联盟的想法。1920年，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党员刘谦曾至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过南北夹击共同推翻北京“反动政府”。^②1921年底马林访问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时，孙中山也曾表露过希望苏俄帮助国民党在西北建军。但这一计划在陈炯明叛变后，一度因“孙吴联合”没有重提。

1922年春夏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吴佩孚开始控制北京政府，改良政治和南北罢兵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改变因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而僵持的中苏关系状况，苏俄开始设想促成孙中山、吴佩孚组建联合政府。对于苏俄的建议，吴佩孚表示赞同。而且，吴已经准备了一个师的精锐兵力，拟在1923年春占领外蒙古。尤为重要的是，吴及其幕僚表示“亲俄”。^③

① 外交总长顾维钧会晤苏俄代表越飞，1922年8月1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转引自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② [德]郭恒钰：“孙中山与德国”，《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3期，1997年12月，第83-110页；“刘谦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22-24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③ “越飞致加拉罕的信（1922年8月25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79页。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2-123页。

在苏俄筹划孙、吴联合的过程中，尽管吴佩孚表示“如有所就，必以中山总其成”^①，但孙中山对吴并未怀有好感。越飞致信孙中山，提出孙、吴联合的前提是张（张作霖）、孙分手。孙回函说他不能背叛朋友张作霖，他有能力向张施加影响，所以劝越飞不要把张作霖“推向日本方面去”。^②9月初孙中山派遣张继到北京与吴佩孚、越飞联系。

9月26日，越飞使团军事顾问格克尔携带越飞致孙中山的信件抵沪。在孙、格会谈中，鉴于中东路的情况和吴佩孚的实力，格克尔劝说孙中山弃张联吴。而孙中山坚持他有能力说服张作霖。在此次会谈中，孙中山还提出了“西北计划”的雏形，即在中国西北边界或新疆省，由苏俄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建立一支由孙中山指挥的军队。至于武器装备等的运输路线，孙认为最可行的是经过新疆。^③

就在各方为孙、吴联合等事积极奔走之时，苏俄远东局却开始秘密筹划武力占领中东路。孙中山担心苏俄援吴灭张后，吴佩孚会转而对付他。于是针对武力攻占中东路的计划，孙中山致函列宁、越飞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称颂苏俄对华宣言的作用，希望列宁不要作出占领北满的举动，否则不仅“中国人民定会将其视为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而且还会授人以柄，给北京政府内敌视苏俄的人以口实。^④孙中山的上述想法显然把对立面确定为北京政府，怕苏俄援吴灭张的计划影响国民党的生存。孙中山认为：苏俄与其派兵至东北占领中东路，不如派兵去占领新疆，并可在那里建立“苏维埃制度”。^⑤但如果当时苏俄果真派兵进入新疆，那就是对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的严重侵犯。可见，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在孙中山心中的分量。

此时已至1922年底，吴佩孚不仅影响力下降，而且其对俄立场发生了

① 《白坚武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8页。

②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8月22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82页。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5-126页。

③ “格克尔与孙中山的谈话（1922年9月2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105页。

④ 参见“孙中山致列宁的信（1922年12月6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16页。

⑤ 参见“越飞致契切林的电报节录（1922年11月10、13日）”，《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29-130页。

明显的变化。吴批评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有悖其前期宣言。^①虽然孙、吴联合的形势发生变化，但越飞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他向马林表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作占领中国的打算”。^②

在1922年年底，越飞同北京政府谈判的僵局已无法打破。在中国地方实力派中，只有孙中山同意苏联可以暂不撤退外蒙军队。^③为了挽回外交失败的面子，越飞希望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得到孙中山的帮助。^④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通过越飞向苏俄请求援助。他表示他能调动十万兵丁，“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最终可在由西北进军北京这一传统的路线上占居优势”。^⑤同年底，越飞和马林在联合提交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中提到，苏俄不能采取任何使人联想起沙皇俄国侵略的举措，“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⑥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针对中国问题，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越飞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并决定有关费用从共产国际后备基金中支出。会议决定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列宁的名义”复信孙中山，针对“请苏俄不要出兵中东路”，“指示远东革命委员会，令其不要干预对外政策”。^⑦

1922年10月，日本干涉军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港撤离。11月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联与北京政府已无亟需谈判的议题。1923年1月17日，越飞南下上海，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其中，越飞向孙逸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孙博士声明，“中东铁路问题要在中俄会议上解决，解决之前同意现行管理办法。”“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撤

①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46，第45页。转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29页。

②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93页。

④ 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39页。

⑤ 同上，第141页。

⑥ 《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参见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1页。

⑦ 参见《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8页。

退”。^①孙中山对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一锤定音。1923年8月，鲍罗廷随加拉罕使团来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走入正轨。

二、蒋介石对苏决策中的利益重心

（一）蒋介石的真实对苏倾向

蒋介石在1923年代表孙中山出访苏俄后，就对苏俄极度反感。在蒋回国后交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就有反共、反苏的言论。但孙中山坚持联苏、联共。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反苏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真正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显露。当时汪精卫的表现比较左倾。国民党右派便把希望寄托在骨子里反苏、反共的蒋介石身上。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②，蒋介石在无意中得逞，使他看到苏联和共产党的弱点，于是更加变本加厉。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百般迁就，使共产党人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所有重要职位，国民党右派取得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纵容蒋介石等人在反共、反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③后，一度下野。1928年1月蒋在南京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位，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10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并在此后逐步建立起其个人的独裁统治。蒋介石的政党利益目标就是在中国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二）中苏“断交”与“复交”——蒋介石对苏决策中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

① 《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民信日刊》1923年1月28日载世界新闻社最初的译文。参见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第152-153页。

②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借舰至黄埔候用。中山舰驶抵黄埔，引起蒋介石误会。蒋认为有人要陷害他。海军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在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牵涉进去。3月20日，蒋介石采取对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苏联顾问、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行动。

③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联合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帮会组织进行的清党反共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至1928年6月已进抵京郊。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从北京撤回东北的途中被日本军人炸死，这就是所谓的“皇姑屯事件”。张学良子承父业接管东三省大权。同年12月东北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下令对苏联驻各省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苏联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业。于是苏联领事馆和商业机构很快撤退，只有东北地区还保留苏联领事馆。为了与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为了响应蒋介石“革命外交”的主张，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警察当局以“第三国际在领事馆开会”为借口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逮捕了与会人员。中东铁路上的苏籍领导几乎全部落网。

事情发生后，张学良及时向南京作了汇报，其做法得到积极的肯定，并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解决善后问题。而苏联政府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提出严重抗议，递交照会，要求按照外交惯例放人、归还被搜去的文件钱物。6月上旬，苏联在与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搜捕、迁移华侨，表明其在为动武作准备。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苏联一直对蒋介石、张作霖的挑衅隐忍退让，使蒋介石认为苏联不会动武。在蒋看来，如果与苏联断交，则能切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有利于巩固他的全国政权。如真能如此，当然符合蒋介石认定的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和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

于是，7月10日，蒋决定武力接管中东路，甚至不惜与苏断交。蒋介石说，鉴于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必担心中苏开战。^①当天下午，张学良就采取了行动。在中东路事件^②发生后，蒋介石对苏方的抗议一口回绝，至7月20日，中苏断交。蒋介石仍说，据苏联国内国际关系观察，苏联未必遽敢向我宣战。^③所以蒋介石一直对苏采取强硬态度，使中苏通过谈判解决

①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② 7月10日下午，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达了早已准备好的夺取中东路及其设施的命令，逮捕铁路苏籍员工，捣毁铁路工人组织和合作社，逮捕了路方200余名苏联公民，其中包括中东路正副局长在内的60人被驱逐出中国国境。苏方空缺下来的职位由中国人或白俄分子充任。同时东北当局还控制了中东路的通讯系统，接收了苏联远东贸易公司、纳夫瑟信托公司和苏联商业汽船公司。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③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冲突成为泡影。而在东北，由于对外交涉权已交还中央，张学良只能与苏联进行“局部交涉”。在蒋游说众列强无效^①后，允许张学良自行解决善后交涉，不必拘泥于中央。但这时苏联已做好了战前准备。1929年10-11月间，苏联发动了旨在夺取中东路的中苏边境战争。这场战争以东北军战败而告终。

中东路事件引发的边境战争使东北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恢复作战能力，并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使日本有机会趁虚而入。1931年日本爆发经济大危机，为了转嫁阶级矛盾，日本加紧了侵华的步伐。而关东军则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南满。由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边境战争后中苏之间的敌对，苏联采取了“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无所惧怕，1932年2月5日占领了中东铁路枢纽地区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被日军占领。同年3月9日，在日本策划、主导下，以长春为“首都”、以前清废帝溥仪为“执政”，建立了伪“满洲国”，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及东蒙各盟纳入其管辖范围。至此，关外广大“满蒙”地区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的建立鼓励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侵华的矛头由关外指向关内。同时，以前的中苏边界变成了实际上的日苏边界。苏联的远东领土继十月革命后又一次面临日本的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直谋求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遭到日方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检讨其对华政策。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宣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才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延续这一政策。一方面对红军进行围剿，一方面对日本推行“不抵抗主义”。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党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权衡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纵容了日本，日本因而变本加厉，在上

① 蒋曾想通过美国等“非战公约”签字国对苏联施加压力，使之接受既成事实。但南京政府一直没有拿出服人的理由，使本来就反感中国“革命外交”的列强更加不满，更不可能帮蒋介石了。参见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2页。

②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译印，第185页。

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突袭闸北，挑起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但面对日本优势兵力的进攻，终因孤立无援，于3月1日晚被迫撤退。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在英、美列强的调停下，3月4日日军停战。经过谈判，中日双方于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而日军可以留驻上海。19路军的浴血奋战，却换来国民政府出卖中国主权的停战协定。而日本则达到了它转移国际视线和以上海作为基地的目的。而蒋在谋求国联和英美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转而与苏和谈。在日本对华步步紧逼的形势下，蒋介石只能暂时搁置对苏的成见，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闪电复交。蒋介石的对苏决策朝中国国家利益方向倾斜，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对国民党政党利益的追求，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三）蒋介石对苏决策中国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案例

中苏复交后，双方在1933年开始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因原则上立场的对立，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不久，苏联不顾中国的抗议和谴责，坚持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中苏之间的谈判暂停。1934年起，面对东西方日、德法西斯势力的崛起，苏联的外交政策由推行世界革命转向与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关系，希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为了统一意见，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还特意把会议推迟到1935年举行。1935年春，日本与德国商讨建立反苏同盟，使斯大林更感到问题的严重。为了保持苏联东线的安全，斯大林更加关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起初对将国民党包括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不理解，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逐渐转变了态度。到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于8月25-27日召开的会议上，王明与共产国际的态度已转变为有条件的“联蒋抗日”。

这一时期蒋介石继续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红军进行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国民党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9月上旬，红军失去了内线打破

“围剿”的可能，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在这一路上，蒋介石集结兵力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共中央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因此，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没有及时准确地传达到中共中央。

中东路风波过去之后，中国大使颜惠庆于1935年2月重返莫斯科。4月，蒋介石的亲信邓文仪作为首席武官抵苏。此时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步步退让，而日本则步步紧逼。1935年夏，日本逼迫华北当局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①。中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广田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广田却要求中国“依从日本、追随日本、听任日本独霸中国，然后才可以讨论其他”。^②在《何梅协定》签订的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就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中苏缔结互助同盟条约。以此次会谈为契机，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同年秋，邓文仪向蒋介石提供了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蒋介石从中看出共产国际的政策在向反法西斯转变。据此，10月18日蒋与孔一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与苏订约和共同抗日的决心。

12月28日，苏联政府电令鲍格莫洛夫，同意与中国以互助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并强调“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关系”。电报说，“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该电还明确指示，不同意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建议蒋介石同中共直接谈判。^③此电表明，苏联政府确定了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共抗日”政策，并把与共产党讲和作为国民党得到苏联援助的先决条件。对于蒋介石而言，国民党的政党利益是一党专政，中共是他的眼中钉。即使在中国大半落入敌手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苏联的签

① 1935年6-7月间中日之间有关解决察哈尔省和河北省问题的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中国失去了在上述两省的大部分主权，禁止全国的排日行动，促使日本两年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

③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5年12月28日）”，载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4-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约条件就是对他所认定的国民党政党利益的严重挑战！

1936年1月22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根据指令的精神会见了蒋介石，向他逐条转告了来电的内容。苏联大使最关注的是中日就广田三原则谈判的问题，但蒋介石却不愿意明确回答，他两次重复这样一个支支吾吾的回答：“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应该同意，因为日本强大。可是，如果我们与贵国签约，我们同日本的一切谈判就毫无意义了。”蒋介石的关注点却在红军问题上，他认为这是中苏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蒋表示，“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态度是，“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自己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对于苏联大使所作的“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的答复，蒋介石未有任何反应，而是继续重申上述观点，并热情地论证苏联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他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对于鲍氏坚持苏联不担任调停角色的立场，蒋同孔商量后说，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原则是：“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鲍氏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但蒋介石仍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此外，蒋介石还就苏援问题和互助条约承担的义务与鲍格莫洛夫交换意见。^①在此次会谈中，苏联大使的目的是弄清中日妥协的可能性，而蒋介石的重点却放在国共关系上，自认为红军问题是解决中苏关系的锁钥。在苏联大使反复重申不介入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蒋介石仍把对苏关系等同于对中共的关系，想借苏联压制中共，想以中苏国家关系友好为条件得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希望得到他所认定的中华民国国家利益与国民党政党利益的双赢。

1935年11月，王明发表《新形势与新政策》一文，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共愿与蒋介石共同抗日。邓文仪回国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该文的摘要。12月蒋派邓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关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的谈判。1936年1月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就多方努力争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

① “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1991年，总79号，第227-229页。

联系，双方会谈良好，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达成了共识。1月23日，邓文仪再次找到王明，说明不能与中共代表回国谈判，并表示蒋介石想在莫斯科达成协议，然后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所以希望能在莫斯科商谈具体条件。王明表示不能代表毛泽东和朱德签协议，但他可以与其讨论谈判原则。^①

促使蒋介石变卦的原因就在于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会谈。如上所述，蒋介石希望借苏联对中共施压，但苏联大使反复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与中共讲和又是国民政府得到援助的先决条件。这样，国共即使在莫斯科会谈，苏联也不会插手。相比于在国内谈判，国民政府也不会多有受益。而且王明坚持由毛泽东和朱德谈判合作条件。所以邓文仪再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也没有太大意义了。

于是1936年1月，在南京政府同意下，宋庆龄在上海联系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交给他一封国民党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2月27日，董健吾同上海地下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瓦窑堡，会见博古。博古立即报告给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作战的中共中央。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复电，表示欢迎国民党的建议，并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国共两党高层恢复联系。尽管一方面蒋介石在国内外压力下迈出了国共谈判的第一步，另一方面，1936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草案，明确了团结蒋介石和国民党、建立以蒋介石政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而且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恢复电讯联系后^②，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强烈批评中共的“反蒋抗日”路线，但在中国国内，中共还是经历了一个“逼蒋抗日”的阶段。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一边向莫斯科示好，一边却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围剿红军。红军连生存都保证不了，何谈“联蒋抗日”。

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出团结中共、一致抗日的意图。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已明确将“反

^① 参见杨奎松：“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实录”，《炎黄春秋》1997年第2期，第3-9页。

^② Otto Braun, *Comintern and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London: C. Hurst, 1982, pp. 168-169. 转引自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从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确立“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施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期间，蒋介石曾建议苏联政府向中共施压，苏联政府虽然拒绝充当调停人，但苏联领导人给共产国际的指示却间接达到了这种效果。实际上，从1935年12月京津学生发起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就风起云涌。国民党统治阶级上层也发生了分化，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起的要求北上抗日的两广事变、8月国民党晋绥将领傅作义率部击溃进犯的日伪军，已把蒋介石的抗日之箭逼在弦上。但蒋介石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是坚守他认定的国民党的政党利益。此时华北大半已落入敌手，国民政府却继续妥协退让。迫于“苏援”的压力，蒋介石开始启动国共谈判，但国民党对中共一直边打边谈。蒋介石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间的权衡显而易见。

尽管1936年11月中共表示不会主动出击国民党，并开始与其谈判，然而蒋介石却提出了连国民党负责谈判的陈立夫都认为过于苛刻的条件。蒋介石的谈判条件，1936年初还是抗日合作，到11月以后却变成了剿共收编。这其中，国际形势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5年末，德日开始在柏林秘密协商，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①。此时，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良好。德日的结盟使苏联担心中国的政策倾向会受到影响。该协定使苏联真正感受到来自东西两方的威胁，蒋介石则趁机抬高了价码。在11月7日鲍格莫洛夫与张群的谈话中，张群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团体，它的直接目的是武力改变中国现存制度和用军事手段推翻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以我国政府不得不用军事镇压的特别办法对付共产党。所以这个问题整体上说纯属中国内政问题。我们不允许任何别的国家对此进行任何干预。”他指出，在国外“防赤”问题上，“日本心目中的真正目标恰正是苏联”。张群同时表示中国决不会对日作出让步。张群的一番话，恰好说出了此时蒋介石的对苏立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借机威胁苏联向中共施压，态度日趋强硬。

而驻扎在陕西关中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却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

① 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24-1933）》，第111页。

张抱有共鸣。1936年初，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拜访张学良，与之秘密商谈，效果良好。同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督查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并有一批高级将领随行，准备随时取代张、杨。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①。正当中共积极策划“反蒋抗日”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却不容乐观。“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②其实张学良本人并不打算伤害蒋介石。最终西安事变在国际、国内舆论、共产国际和苏联“保蒋”的呼声中得到和平解决。但在事后一段时间里，尽管中共表现出极大诚意，蒋介石仍未放弃其反共立场，在国共谈判中对中共提出苛刻条件，实质就是要剥夺中共对党、红军和边区政府的领导权，尽可能地削弱中共的力量，这样的条件中共无法同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振臂疾呼团结抗日。7月1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提出：中共愿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③7月17日国共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仍然坚持改编后红军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等问题。会谈仍无结果。

7月30日北平失守，8月1日天津沦陷。8月4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赴南京谈判。在最后时刻，蒋介石放低了价码，谈判迅速达成协议。国共两党在进行了十年内战后，再次合作。8月21日，蒋介石接受苏联的条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以签订。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9月22

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来西北督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军政大员，解除蒋系武装，逼蒋抗日，又称双十二事变。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十七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9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8页。

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蒋介石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终于在国民党的政党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间寻求了平衡。

（四）“外蒙古独立”——蒋介石对苏决策中国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权衡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便不再向中国提供援助。随着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援助进入中国。中苏关系逐渐转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要求中苏两国同时对日宣战，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却要求中国立即对日宣战，不必等待苏联。因为罗斯福已通过苏联驻美大使了解到，苏联之所以不立即对日宣战，“乃因远东军事准备尚须增强，时期一到，即宣战无疑，惟此消息万勿稍有泄漏”。^①此后蒋介石一再要求苏联对日宣战，斯大林不为所动。1943年蒋介石对苏参战已不抱太大热情。但同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期间，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0月30日，即会议结束当天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斯大林的译员别列日科夫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转达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译”的话：“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②蒋介石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年11月1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如果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中国准备与苏联结成任何种类的联盟。^③但这只不过是蒋介石在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上争取中国外交主动。其实，国民党对苏联是不信任的。中共与联共（布）拥有共同信仰——马列主义，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美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2-43页。

② 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③ [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两次与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谈话时，吴都乘机表示了苏联的不信任。在提到国共谈判问题时，吴表示，“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为每逢一次新提案，共方就提高价码。他‘个人的看法’是，共产党从莫斯科得到精神方面的支持”。赫尔利侧面了解到，吴对这些事情的“个人看法”自然是紧密遵循宋子文的看法，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也反映了委员长的观点。^①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结束后，面临即将到来的中苏会谈，蒋介石与宋子文以极其坦率的态度探询苏联对此事的立场。因为前一年赫尔利访苏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表示：1、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根本不是共产党；2、苏联政府没有援助中国共产党；3、苏联不希望中国内部出现分歧或内战；4、苏联不满意中国人对待在华苏联公民的做法，但是坦率地表示愿与中国有更亲密和谐的关系。中国渴望证实苏联的态度是否仍和去年9月莫洛托夫所略述的那样。^②在启动中苏谈判前美国特使访苏时，斯大林表述了如下观点，迎合了蒋介石的心理：关于委员长，元帅说他对任何中国领导人所知甚少，但是他感到蒋介石是其中最好的，将是完成中国统一的人。他说他看不出还有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其他领导人，而且，例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不相信他们有那么好的本事，或有能力统一中国。并表示蒋可以派他的代表到苏联军队到过的地区去建立国民党政权。^③霍普金斯和杜鲁门在美国向宋子文转述了这一观点。在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命交给蒋介石的雅尔塔协定的备忘录中，也对此点作出了书面保证。

在中苏缔约谈判第一阶段伊始，谈判就因苏联坚持外蒙古独立而陷入僵局。经过蒋介石与其同僚们的商讨，蒋介石就外蒙古独立的条件电示宋子文：1、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1）旅顺军港之行政和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2）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皆归我领土主权国主管。（3）铁路干线可与苏共同经营，而决非双方共管，但苏应予中国租借物资或经费，以为报酬铁路股款。（4）其期限照

① FRUS.1945, Vol.7, pp.856-857.

② Ibid, pp.851-852.

③ Ibid, pp.887-891.

苏英与苏法同盟条约为例。2、新疆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中国必须统一至如此程度，则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由国会正式通过后，政府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此可作为我对苏之诺言，惟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待兄回国报告后，再对苏作正式答复。^①7日，蒋介石又两次明确电示宋子文：1、舍一北（外蒙古），保二北（东北、新疆）。2、约束中共的谈判原则。蒋介石再次在中国国家利益和国民党的政党利益间作出了权衡。

在中苏缔约谈判休会期间，美、苏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彼得罗夫在中国围绕中苏签约也进行了会谈。第一次会谈，赫尔利谈到了中苏缔约谈判第一阶段，蒋介石让他看每一份从莫斯科来的电报，并同他商议。赫尔利声称，应将建立中苏友谊的许多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上。第二次会谈，赫尔利再次表示了对二蒋的好感，并说，如果宋子文妨碍莫斯科谈判的进程，他将建议蒋介石通过蒋经国拿掉宋子文，尽管这会引来一场吵闹。一是宋子文自认为伟大人物，斯大林向蒋介石的继承人蒋经国举杯祝贺时，触及了他的自尊心。二是宋子文想把中苏条约的责任推给蒋介石。他举了宋影响谈判的例证，他确信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不让步性就是宋子文的影响。关于条约，赫尔利进一步透露并强调：如果我们在港口问题上同意蒋介石的意见，蒋准备同意外蒙古独立。只要提前绘制好地图和写好不损害中国尊严的措辞。条约不要给英国人提供提出自己要求的理由。^②

在中苏缔约谈判的第二阶段，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0日，宋子文等听到伦敦BBC电台广播日本求降的消息后，即约集中方成员详商。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第593-594页。

② АВП РФ. ф.0100. оп.33. п.14. д.244. л.192-194.（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经商定，仍表示愿与苏联继续商订条约，但对尚未解决事项，决不作重要让步。^①在当晚的会谈中，斯大林显然因为苏军出兵东北，对宋子文等人采取了威胁和警告的态度。在讨论有关外蒙古事宜时，斯大林威胁宋说，如果中国不同意（外蒙古独立），“内蒙古的兄弟们会加入外蒙古组成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②斯大林还警告说，如果今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将进攻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政府未必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这种支持将是困难的。斯大林说，“根本问题是我们不想干涉，可是共产党的军队同中央政府的军队一旦发生冲突，苏联要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将非常困难。”^③在谈判最后，他劝告宋最好快些同意，否则“共产党就要进入东北了”。^④

8月13日，关于与外蒙古划界问题，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蒋介石：“外蒙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成果”。“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王世杰在电报中分析了与外蒙疆界的现状，并无太大争议，所以恳请蒋介石授予权易处置之权。^⑤同日，宋子文、王世杰与斯大林进行中苏第九次会谈。关于外蒙问题，宋子文表示，蒋介石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现有边界内的独立。^⑥时至8月15日6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

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苏决策的反弹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苏决策中中国国家利益凸显

1922-1943年，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其领导。二战后初期，毛泽东认为，美苏虽然存在分歧，但相信全世界“都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

① 参见《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0日。

② FRUS. 1945, Vol. 7, pp. 967-969.

③ АП РФ. ф. 45. оп. 1. д. 332. л. 82-91.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④ FRUS. 1945, Vol. 7, pp. 967-969.

⑤ 台湾“外交部”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 第二册 中苏关系卷》，台湾“外交部”，2001年12月，第48-49页。

⑥ АП РФ. ф. 45. оп. 1. д. 322. л. 93-97.

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①中国内战开始初期，“中间地带”理论随之提出，其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但美国在冷战思维的指引下，加大了扶蒋、反共的力度，全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出台。此计划表明美国将欧洲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通过对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援助、协助重建，在欧洲建立起反苏阵线，遏制苏联的扩张。作为反击，苏联于同年9月成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称国际政治力量已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在中国，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共胜算的把握更大。随着冷战的升级，苏联彻底放弃了与美蒋的合作。国、共、美、苏四方都完成了对彼此的战略调整。美苏彻底对立，国、共两党也明确了各自的对立方。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中共。此时中共的政党利益与苏联对华政策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

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共胜利已成定局。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问题开始提上日程。斯大林派米高扬访华。在会谈期间，毛泽东策略地表示了对旅顺、新疆、外蒙古及中长铁路的看法。在2月4日的会谈中，关于外蒙问题，毛问道，中共应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合并，并说，“如果外蒙和内蒙领导人赞成这一主张，可以并合入中国的国家版图”。毛认为，“有这种可能”。“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相当强大并一切进入良好状态，那时外蒙宣称，他们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国家才从中国退出”。“而现在共产党掌权，外蒙愿意和内蒙合并成为中国国家的组成部分”。但米高扬认为这不可能。关于新疆问题，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了白崇禧”。“后者告诉他，在伊犁州，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②毛借此暗示苏联与疆独分子有牵连，以及中共捍卫新疆领土的决心。在当天会谈的最后，毛泽东策略地把话题引到外国列强

①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0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参见牛军：“论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АП РФ. ф.39. оп.1. д.39. л.54-63.

的条约上。毛说，中国民主人士头面人物曾解释了废除蒋介石的卖国条约其涵义是什么。他们不要求废除蒋介石所有的条约，因为其中也有带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毛还列举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其中之一。米高扬问，如何论证其爱国性质。毛说，苏联来旅顺是为了中苏共同抗日，在中长铁路和旅顺港，苏联是作为捍卫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并进一步对米高扬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保存力量是为了防御日本法西斯主义”。“当中国壮大起来，并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的威胁，那时苏联就不再需要旅顺港基地”。“这时，毛泽东顺便说，一个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的中国女士宣称，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从俄国人那里把旅顺收回中国，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说，这位妇女不懂政治。”毛再次强调，“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一边”。^①中共与苏联就修改 1945 年的中苏条约达成了共识。

同年 6 月刘少奇访苏，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了修改中苏条约的三种方法：1. 新中国政府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继续使其生效，不作任何修改；2. 参照原有条约文本，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作某些文字和内容上的修改；3. 两国政府代表换文，说明本条约暂时保留原样不变，但他们准备于适当时候重新予以审议。”斯大林批示道：“待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②刘少奇访苏奠定了中苏结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同盟关系的基础。毛泽东未等其访问结束，就宣布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要追随社会主义国家的盟主苏联。苏联也希望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此时，在中共的政党利益与苏联对华政策大目标趋于一致的情况下，中苏国家利益的矛盾却凸显出来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12 月毛泽东启程访苏。毛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重签中苏新约。但毛泽东访苏的初期，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对此大失所望。^③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没有公开露面，只

① АП РФ.ф.39. оп.1. д.39. л.54-63.

② АП РФ.ф.39. оп.1. д.328.л.32-50.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8 页。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 1949 年 12 月 24 日会谈的材料。

是在别墅里看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以消磨时光。^①1950年1月1日，毛泽东表示，他打算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估计2月6日回到北京。罗申表示次日即报告政府。^②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便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原因是“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慌”。^③2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再次拜访毛泽东，并表示，“苏方同意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④经过一番周折，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附属协定得以签订。

斯大林虽然为放弃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在华利益而感到不快，但在此后不久的朝鲜战争中，中国毅然出兵朝鲜，使斯大林消除了疑虑，新的中苏同盟得到巩固。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虽然有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但中朝一江之隔，唇亡齿寒，中国如坐视不管，美国就会得寸进尺，威胁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更何况美国已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赫鲁晓夫为了使自己在苏共党内的斗争中得到中国的支持，主动提出撤出在旅顺口的苏军和解散中苏合营公司。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给了中国巨额援助，中共也协助赫鲁晓夫处理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⑤。波匈事件的发生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目的之一就是消除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实现以苏联为首的阵营的团结。莫斯科会议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向了高峰。

1958-1959年苏联的做法再次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的民族自尊心。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引起毛的不满。毛泽东认为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9页。

② АВП РФ. ф.0100. оп.43. п. 302. д.10. л.1-4.

③ 《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171-172页。

④ 参见中国中央档案馆1950年1-1：6/6。

⑤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的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被拒绝后举行罢工和游行。波兰政府出动了部队和坦克镇压游行群众，造成多人死伤。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来到华沙，并派军队包围华沙。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共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坚决反对苏联出兵波兰的做法，并派出代表团到达苏联，与苏共协商对策；周恩来则出访波兰。在中共的协调下，波兰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赫鲁晓夫亲自来华解释，但并不能弥合裂痕。同年，中国为反击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图谋，牵制美国的全球战略，连续对靠近大陆的金门岛和马祖岛发动炮战（简称“金门炮战”）。“金门炮战”事先没有向苏联通报，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违反了盟友的规则，他们并认为“金门炮战”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破坏了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①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9月，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把中苏意见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同年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进行了激烈辩论。中苏友好的气氛荡然无存。

（二）中苏大论战——毛泽东对苏决策中中共政党利益的凸显

斯大林逝世后，中苏党际关系中的矛盾也逐渐显现。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赫在会上提出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为标志的对内对外总方针，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毛泽东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的忧虑。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表现也给赫鲁晓夫带来忧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毛泽东信心十足，高调宣布中国超英赶美的经济发展目标，这也使赫鲁晓夫心境难平。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方则批评苏方倡导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战略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苏两党的观点针锋相对。1959年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用老子党的口吻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对一下表”。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共实行突然袭击。为了对中共施压，赫鲁晓夫于1960年7-9月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

^①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1945-1980）》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43页。

赫鲁晓夫进一步系统化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同时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①之后，中苏大论战愈演愈烈，中苏关系逐年恶化。1963-1964年，中苏两党间因意识形态分歧引起的争端延伸到了国家关系中。到1965-196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彻底分裂，中苏两党断绝了关系。

中苏大论战的特点是双方直指对方的领导人。争论的焦点是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资格当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这就涉及到领导人的政治生命。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升。由于中苏大论战关系到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命运，所以论争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此也不难理解毛泽东在这段时期的对苏决策中共的政党利益凸显。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表象上看，中国领袖们在对苏决策中都把政党利益放在首位。领袖是政党人格化的代表，政党的生存对领袖具有首要意义。而一旦政党的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中国领袖们真正的对苏情感就会流露。而实际上，究其根源，则有本质的不同。

孙中山虽然以苏俄不必立时从外蒙撤军来换取苏俄支持国民党，但他始终没有改变革命的初心：再次举起护法大旗，进行北伐，建立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国家。虽然毛泽东也曾根据苏联的对外政策，制定对国民党和美国的政策，但他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压在旧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非执政党的领袖，他们的政治表态不会给民族国家的利益（National Interest）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却为其政党实现国内

^①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62-563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4、83页。

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家利益（Interest Of State）带来了发展的良机。

在国际政治中，蒋介石为了政党利益支持张学良武装夺取中东路，本以为可以借此切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有利于巩固他的全国政权，不料却因此引发了中苏边境战争，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借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到对日本的幻想彻底破灭的最后一刻，决不放低对中共和苏联的价码。到了抗战末期，蒋介石舍一北，保二北，以其政党利益至上，以允许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在国内政治中，他为了政党利益，反苏、反共，不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思想始终是其对苏决策中权衡国民党政党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障碍。

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时，适时提出了修改 1945 年条约的要求；为签订新约，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亲赴苏联；在基本收回中国主权的同时，又使苏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额援助。之后，面对苏联领导人妄图把本国内外政策强加于中国，毛泽东坚决捍卫中国主权。虽然中苏大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受到一定的伤害，但却为之后中苏（俄）两国的平等交往，作了历史的铺垫。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党共同的意识形态，促使中苏两国在当时冷战的历史环境下结成联盟。但意识形态的联盟不能长久，是因为它不能代表结盟国的实际利益，而中苏意识形态的联盟又要求两国在内外政策上保持一致。中苏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不同。而赫鲁晓夫以“老子党”的态度把观点强加给中国，必然会引起毛泽东和中共的不满。所以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凸显必然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必然延伸到国家关系方面。毛泽东捍卫的中共政党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反对苏联干涉新中国，其对苏决策中所追求的中共政党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是相契合的。

【 Abstract 】 From 1920s till 1960s, Sino-Soviet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nter-party relations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Sun Yat-sen “held that Russian troops do not have to retreat from outer Mongolia” in exchange for the Soviet Union’s final choice of supporting the KMT. Then Chiang Kai-shek cheated Soviet advisers out of trust, and quickly “turned hostile” after rising,

eventually striving to “coexist with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afterwards became easily compromised till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Under guidance of Mao Zedong, the spark of communism, lit by the Soviet Union, made a great fire. Howev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o Zedong turned resentful against Soviet chauvinism and became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it. If we may say, Sun Yat-sen’s faith in the Soviet Union came from the victorious Soviet’s choice of him among various Chinese warlords; Chiang Kai-shek’s aversion to the Soviet Union largely origina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n Mao Zedong’s discontent derived from chauvinism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complacency.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and Mao Zedong ha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matter of fact, during all their political careers, China, in a weak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had to deal with the Soviet Union which maintained it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The difficulties within can be imagined. Nevertheless, the key is that they made a choice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arty interests. The result decid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as well.

【 Key Words 】 Sino-Soviet Relations, Sino-Soviet Inter-Party Relation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1920-х гг. до 1960-х гг.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межпартий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есно переплетались. Сунь Ятсена высказался о том, «что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не должна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тступать от Внеш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в обмен на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ешил поддержать Гоминьдан, однако затем Чан Кайши подорвал доверие советских советников, и после быстрого роста «стал враждебным», во время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опять наблюдалось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развитие шло от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до потери терпения. От зажжённой самим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скры КПК и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е во главе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 гнева из-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шовинизма посл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и до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я бороться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до конц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оверие Сунь Ятсена к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заключалось в выборе победившим в революци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его среди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ов в Китае; у Чан Кайши отвращение к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было из-з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зногласий; а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ж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было из-за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го шовинизм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артией себя как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й партии». Поним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было различным у живших в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ремена Сунь Ятсена, Чан Кайши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в 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рьере Китай дл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уязвим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должен был бороться с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защищающим сво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в Китае, данную запутанность можно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Но ключевым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были приняты реш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и интересов партии, чт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пределило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партий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е и советские лидер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经济·人口

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荷兰病”*

伊万·沙拉法诺夫 任群罗**

【内容提要】根据 Corden 和 Neary 提出的“荷兰病”理论模型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章分别从世界石油价格波动是否直接影响哈萨克斯坦货币的汇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更倾向于能源部门、能源行业是否存在工资上涨效应三个方面，对制造业等非能源型行业是否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已经存在“荷兰病”的征兆。为此，对目前哈国政府所采取的建立哈国国民基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应对“荷兰病”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哈萨克斯坦 荷兰病 去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 D736.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5)02-0154(24)

一、引言

“荷兰病”(Dutch Disease)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977年 *The Economist* 杂志上第11期，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安全机制比较和整合研究”(项目批准号: 14ZDA088)，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能源与贸易互联互通建设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13AZD083)的阶段性成果。

** 伊万·沙拉法诺夫(Ivan Sarafanov)，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任群罗，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①20世纪50年代，作为主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的荷兰，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荷兰因此而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产业，出口剧增，一开始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在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荷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而从天然气出口中获得大量收入，这些收入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天然气出口的增加，荷兰盾的汇率也随之上升，劳动者薪水也同时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农业和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滑；而大幅提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政府财政产生了巨大压力，财政赤字也随之急速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模型由 W. M. Corden 和 J. Peter Neary 在 1982 年给出。该理论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见图 1）。^②

该模型的思路可以概括为，假定某国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1）一是劳动和资本向资源出口部门转移，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2）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提高，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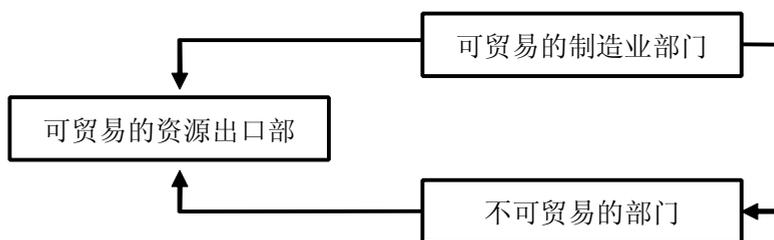


图 1 W. M. Corden, J.Peter Neary 的“荷兰病”模型

① Paul Krugman,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7, Vol. 27, pp.41-55.

② W. M. Corden, J. P.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 Vol.368, pp.825-848.

与“荷兰病”相关联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概念,1993年首先由Richard Auty提出。他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甚至是停滞的。^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与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与此同时,自然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即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最终没有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经济发展。为此,J. D. Sachs和A. M. Warner收集到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的数据,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分析,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关系。^② Гуриев, Плеханов 和 Сонин认为“资源诅咒”意味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自然资源在经济结构当中占主导地位。^③ 此外,Полторевич等发现,“资源诅咒”经常出现在经济政治制度体制不完美的国家,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石油资源)阻碍、甚至严重威胁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④ 例如,前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新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工业企业中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曾经使苏联经济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⑤但是,“新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很快被60年代中期开始开发的西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所抵消。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苏联成为典型的能源出口大国,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经济转型步伐和改革方向。与此相反,S. Harber与V. A. Menaldo对于能源出口国的资源丰裕度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表示怀疑。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轻微的正相关性。为此,他们

① Richard Auty,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12-15.

② J. D. Sachs, A. M. Warn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Vol. 45, pp.827-838.

③ Гуриев С., Плеханов А., Сонин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сырьев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0. №3. С.4-23.

④ Полторевич В.М., Попов В.В., Тонис А.С.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доходов,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2009. №1. С. 15-29.

⑤ Косыгин А.Н.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4.

专门提出了“资源赐福”这一新的概念。^①

二、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现状与潜力

（一）前苏联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哈萨克斯坦的自然资源得到广泛开发。1940年，第二产业产值已占到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其中重工业占主导地位。1931-1934年间，哈萨克斯坦铜的开采量和冶炼量在苏联仅次于乌克兰，居第二位。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和试钻工作取得了卓越成绩。在厄木巴罗含油区（Embinskaya oil-bearing region）发现了大规模的石油储量；在厄木巴（Emba）河谷地区、捷米尔（Temir）地区和阿克秋宾斯克（Aktiubinsk）地区发现了新矿藏。^②由此而建立的新产业开始逐步改变哈萨克斯坦的产业结构。

这种片面的发展造成了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的单一化——采掘业发达而制造业薄弱，机械制造工业、加工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极为落后。长期以来，绝大部分工农业原材料要运往俄罗斯进行加工。

（二）独立后

苏联解体之后，1991到1996年间，哈萨克斯坦经济经历了大幅度衰退。但是雄厚的采掘工业维持了各种资源的大量出口，为哈萨克斯坦经济最终实现恢复和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2003年成为独联体中第一个将工业生产恢复到1991年解体之前水平的国家。

（1）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备和开采

无论在苏联时期或者是现在，石油一直是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根据BP公司在2014年公布的《全球能源统计回顾》（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4），哈萨克斯坦拥有全球第七大的石油储量（占

^① S. Haber, V. A. Menaldo, “Do Natural Resources Fuel Authoritarianism? A Reappraisal of the Resource Cur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Vol.105, pp.1-26.

^② O.P.拉扎罗斯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莫斯科：国家地理出版社，1957年，第30-33页。

全球的 1.8%)，以及第七大的石油生产量（占全球的 2%）（见图 2）。哈萨克斯坦的能源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油气出口占哈国外汇收入的 60%–7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目前哈萨克斯坦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 300 亿桶，已探明油气田 223 个，其中 81 个正在开发，另有 57 个凝析气田。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储备与开采位于哈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油田包括田吉兹（Tengiz field）、卡拉恰干纳克（Karachaganak Field）、加纳着力（Zhanazhol field）、乌兹尼（Wuzen field）以及结提拜（Zhetibay field）。上述的陆上油田占哈国已探明储量的 50%以上，而哈萨克斯坦里海地区的卡沙干（Kashagan field）里海油田估计至少蕴藏有 150 亿桶石油。

2013年哈萨克斯坦石油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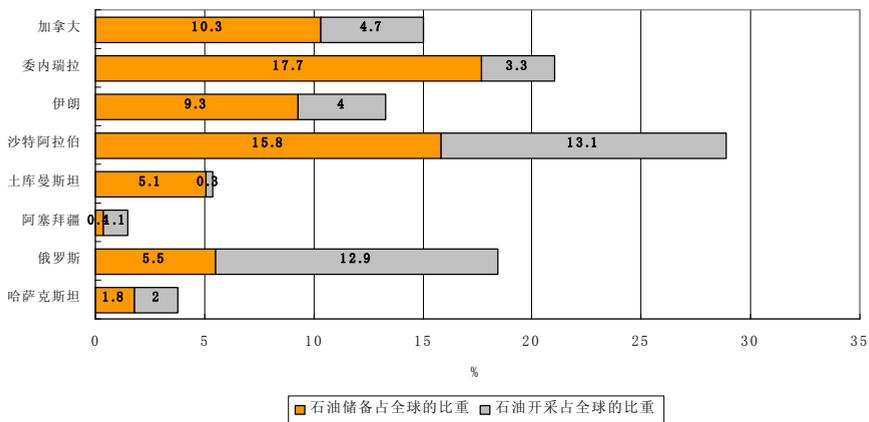


图 2 2013 年哈萨克斯坦石油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资料来源：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4.

(2) 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储备和开采

根据 BP 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哈萨克斯坦在全球天然气储量中占比近 0.8%，列全球第 20 位。此外，哈萨克斯坦在全球天然气开采中占比接近 0.5%（见图 3）。目前哈国正在开发的主要伴生气储量分布于卡拉恰干纳克：1.35 万亿立方米、田吉兹：7.0 亿立方米、卡沙干：4.9 亿立方米、加纳着力：1.33 亿立方米、结提拜：990 亿立方米、乌津（Uzen）：430 亿立

方米。主要非伴生气储量位于伊马舍服斯阔耶 (Imashevskoye): 1,290 亿立方米、乌里克套 (Urikthau): 400 亿立方米、阿曼盖尔德 (Amangeldy): 250 亿立方米。

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和预测资源量主要位于西哈州、阿特劳州和曼格斯套州里海盆地盐下层系，埋藏较深（超过5000米），且富含硫化氢（H₂S），需要复杂的开发工艺和特殊的硫化物处理设备，硫磺的商业利用已成为制约天然气工业发展的主要难点之一。

2013年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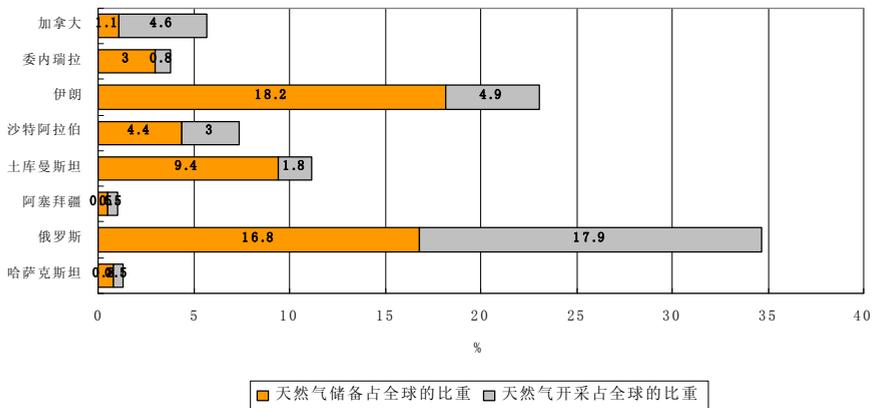


图3 2013年哈萨克斯坦天然气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资料来源: 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4.

(3) 哈萨克斯坦其他矿藏资源的储备和开采

哈萨克斯坦的固体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有 90 多种矿藏、1200 多种矿物原料，已探明的黑色、有色、稀有和贵金属矿产地超过 500 处，是独联体国家中最丰富的。部分矿藏资源的储量占全球储量的比重较高，如钨 50%，铀 37.8%，铬矿 23%，铅 19%，锌 13%，铜和铁 10%等（详见图 4、图 5）。

哈萨克斯坦各种矿藏资源储量占全球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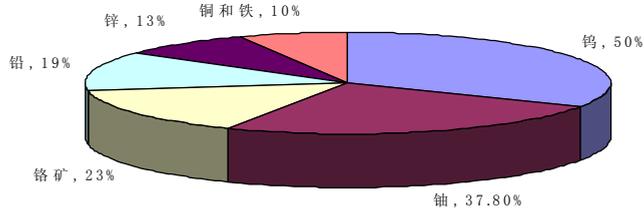


图 4 哈萨克斯坦各种矿藏资源储量占全球的比重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013年哈萨克斯坦铀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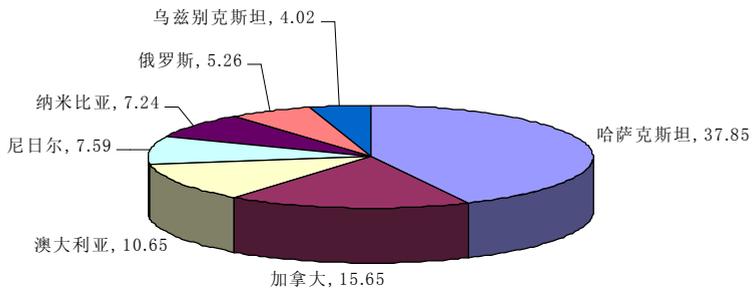


图 5 2013 年哈萨克斯坦铀储备和开采占全球的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Global Nuclear Fuel Market Report, June 2014

三、哈萨克斯坦“荷兰病”的分析

(一)“荷兰病”的特征与结果

根据 Corden 和 Neary 提出的“荷兰病”模型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荷兰病”的特征总结为三条，这些特征的共同作用，

最终导致制造业出现“去工业化”：

1、油价上升导致本国汇率上升：由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易受世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且由于国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金融和货币体系，因此世界能源价格波动与本国的汇率变化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2、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行业：对国外投资者而言，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主要分布于矿业、采石业与地质勘探。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当中绝大部分投资集中在能源型行业，这表明该国正处于一种片面的、倾向于能源型经济的发展状态。

3、工资上涨效应：如前所述，如果某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这将引起该国能源领域的工资增速快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此外，能源丰富地区的工资上涨幅度也远高于以制造业或服务为主的地区。

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世界油价的上升，能源部门对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大，使该部门的工资与投资回报率大幅上升。这将会导致资源转移效应，即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其他各种资源从制造业部门流入能源部门，同时制造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力大幅减少，造成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去工业化”现象。

（二）石油价格波动对汇率的影响

油价上升是否导致汇率上升，是荷兰病重要的表现之一。图 6 显示哈萨克斯坦 1994-2014 年间美元兑坚戈汇率与布伦特（Brent）油价之间的时间序列图。图中数据显示：大约从 2003 年 1 月开始，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与坚戈的持续升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相应的，2008 年 7 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石油价格暴跌对应着坚戈的贬值。

哈萨克斯坦汇率与石油价格 (Brent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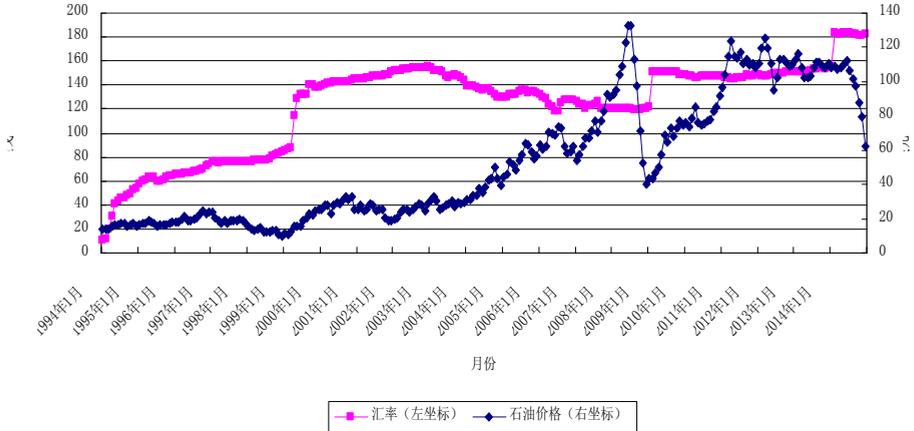


图 6 199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汇率与石油价格 (Brent 牌) 变化

资料来源: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Europe Brent Spot Price FOB (Dollars per Barrel); Статисти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www.nationalbank.kz

然而, 汇率的涨跌除了与石油价格波动有关, 也与政府干预等因素相关, 即政府干预同样会造成汇率变化, 如中央银行外汇的购入和储备也能够减轻汇率上升的压力。基于此, 本文将汇率 (LN_EXRATE) 作为被解释变量, 石油价格 (LN_OILPRICE) 和外汇储备 (LN_FORRESERVES) 作为解释变量, 拟建立反映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 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第二, 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 检验通过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三, 进行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分析石油价格波动与哈萨克斯坦国内汇率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 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 经过一阶差分以后原序列均为平稳序列, 即三个变量都符合一阶单整条件 (详见表 1)。

表1 单位根平稳性的ADF检验

变量	检验的形 式 (c,t,k)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5%	D.W.值	结论
LN_EXRATE	(c,0,1)	1.0381	-1.9420	1.5780	不平稳
△LN_EXRATE	(c,0,1)	-7.7829	-1.9421	1.5879	平稳
LN_OILPRICE	(c,0,1)	0.5303	-1.9421	1.9793	不平稳
△LN_OILPRICE	(c,0,1)	-12.5299	-1.9421	1.9814	平稳
LN_FORRESERVES	(c,0,1)	3.4283	-1.9421	1.7607	不平稳
△LN_FORRESERVES	(c,0,1)	-14.4029	-1.9421	1.9896	平稳

注：△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段。

(2) 协整检验。运用迹检验 (Trace Test) 和最大特征值检验 (Maximum Eigenvalue Test) 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表明在 5%的置信水平上，方程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即数据协整是可信的 (详见表 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迹统计量	迹检验 5%的 临界值	最大特征值 统计量	最大特征值检 验 5%的临界值
0.077635	40.56004	32.26837	25.99219	21.13162
0.049659	14.43727	17.98038	12.78337	14.26460

(3) 建立模型。ADF 检验表明，在 95%的置信水平下，汇率、石油价格和外汇储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标准化后的长期均衡方程输出结果见表 3：

表3 标准化协整方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LN_OILPRICE	-1.720	0.598	-2.876	0.002
LN_FORRESERVES	1.037	0.370	2.803	0.006
C	-7.980	1.322	-6.036	0.079

由表 3 得到协整方程为：

$$\ln_exrate = -7.980 - 1.720 \ln_oilprice + 1.037 \ln_forreserves \quad (1)$$

由式（1）可得 \ln_exrate 关于石油价格和外汇储备的弹性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石油价格和外汇储备的长期弹性分别为 -1.720 和 1.037，说明石油价格增加 100%，导致汇率平均下降 172%；外汇储备平均增加 100%，导致汇率平均上升 103%。从协整系数来看，石油价格对汇率的影响超过外汇储备对汇率的影响，前者的系数为 -1.720，后者的系数为 1.037。这表明外汇储备增加对坚戈升值的抑制作用较小。此外，方程结果显示哈国汇率与石油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即油价的上升导致汇率下降，由于汇率采用的是直接标价法，这意味着油价上升导致坚戈升值。外汇储备与汇率的关系是正相关的，表示外汇储备的上升对应着汇率上升，表示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了促进坚戈升值的作用。

由于汇率的波动与石油价格和外汇储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 ECM）来反映短期波动。向量修正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4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参数估计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ECM _{t-1}	-0.622	0.008	-7.413	0.000
LN_OILPRICE _{t-1}	-1.889	0.697	-2.710	0.017
LN_FORRESERVES _{t-1}	1.144	0.431	2.655	0.046
C _{t-1}	-8.348	1.549	-5.390	0.062

由表 4 得到协整方程为：

$$Dln_exrate = -8.348 - 1.889Dln_oilprice_{t-1} + 1.144Dln_forreserves_{t-1} - 0.6ECM_{t-1}$$
 $R^2=0.75$ ，修正的 $R^2=0.60$ ，标准差较小，为0.035，表明整个模型拟合优度比较合理。上述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当哈萨克斯坦国内汇率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方程时，受到石油价格和外汇储备变化的影响，将以0.6的速度回归到长期均衡方程，调整力度比较大。

表5 Granger-Causality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期		1	2	3
LN_OILPRICE 不是 LN_EXRATE 变化的原因	F 统计量	1.329	1.030	0.948
	P 值	0.250	0.359	0.418
LN_EXRATE 不是 LN_OILPRICE 变化的原因	F 统计量	4.729	3.649	4.331
	P 值	0.031	0.027	0.005
LN_FORRESERVES 不是 LN_EXRATE 变化的原因	F 统计量	0.121	1.219	1.544
	P 值	0.729	0.297	0.204
LN_EXRATE 不是 LN_FORRESERVES 变化的原因	F 统计量	4.487	3.504	3.330
	P 值	0.035	0.032	0.020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表 5 结果表明，滞后期 1-3 年内，石油价格波动对汇率的因果关系以及外汇储备变化对汇率的因果关系不明显；但汇率对石油价格与外汇储备的波动影响显著。这一结论说明了，1994 年以来，坚戈汇率波动与世界油价和外汇储备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油价的上升导致哈萨克斯坦外汇价格下降，即坚戈升值；相反油价下降导致哈萨克斯坦外汇价格上升，即坚戈贬值。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上升则使外汇价格上升，抑制坚戈的升值。但是，如第 (3) 点所述，石油价格波动对哈萨克斯坦汇率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外汇储备对汇率的影响。因此，目前哈萨克斯坦货币汇率的变化严重依赖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这是“荷兰病”的表征之一。

（三）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苏联解体以来，哈萨克斯坦的丰富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使大量的外资纷纷涌入到国民经济当中。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从1993年到2012年，哈萨克斯坦共吸收了73.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其中矿业、油气开采为主的采掘业，地质勘探业等与能源、资源领域相关的行业吸收外资最多。譬如2008年地质勘探、矿业与采石业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6%和18.7%，同期制造业、冶金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与保险业分别吸纳了10%、7%、1.7%、9.2%的投资（见表6）。

2013年哈萨克斯坦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中，矿业与采石业占FDI的比重从2008年的18.7%上升到30.1%，地质勘探业则从2008年36%下跌至2013年的22.5%。同期的制造业、冶金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与保险业投资分别为11.7%、9.5%、4.41%、3.88%，其中前三个行业与2008年相比有所增加，然而金融业与保险业的比重略有所下降（见表6）。

表6 2008、2013年哈萨克斯坦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单位：%)

项目（行业）	2008年	2013年
地质勘探	36	22.5
矿业与采石业	18.69	30.1
制造业	10.01	11.7
冶金工业	7.04	9.5
金融业与保险业	9.24	3.88
建筑业	1.65	4.41

资料来源：Статисти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Банк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www.nationalbank.kz

综上所述，矿业与油气开采为主的采掘业在FDI结构中不断增加，表明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该国的能源领域。即便其他行业的投资比重略有增加，但是其增加的幅度远远低于能源以及与其相关的领域增长，而这种投资倾向也是“荷兰病”的表征。当然哈萨克斯坦投资结构的变化不仅与国际市

场能源供需和价格变动有关联性，该国投资结构也受政府投资政策的影响。

（四）工资上涨效应

由于数据有限，本文采集到的是 2008 年至 2011 年的工资增长率数据。从现有数据可以看出，2010 年之后所有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均出现了正增长。但是很容易看出石油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几乎每年都超过制造业、服务业乃至采矿部门的工资增长率（详见图 7），这也完全符合“荷兰病”的病症。

2008-2011年哈萨克斯坦四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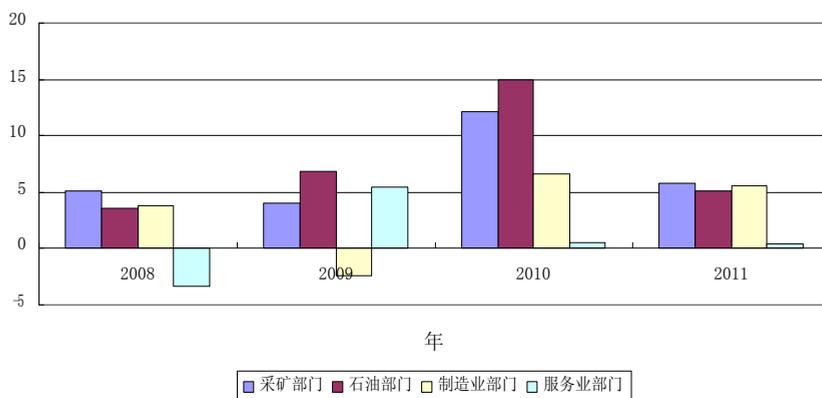


图7 2008-2011年哈萨克斯坦四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http://www.stat.gov.kz/>; Оплата труд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8-2012

此外，哈国石油天然气丰富区域的人均工资水平和人均工资增长率高于其他区域（详见表 7）。

比如阿特劳州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一直排名第一，在 2011 年为 106 960 坚戈、2012 年为 114 413 坚戈、2013 年则为 118 043 坚戈。2013 年阿克托别州人均工资增长率为 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5 个百分点）。2013 年曼格斯套州的人均工资增长率达到 109.5%，高于全国 1.05 个百分点。可见，从工资上涨效应看，哈萨克斯坦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荷兰病”。

（五）哈萨克斯坦制造业的“去工业化”现象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哈萨克斯坦的汇率变化严重依赖于石油价格波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并且存在着能源产业工资上涨效应。根据这些结论可知，目前哈萨克斯坦经济具有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的特征，容易出现制造业“去工业化”现象。因此，为了更客观地分析哈萨克斯坦是否存在由“荷兰病”导致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引用该国经济各部门的产出和就业数据进行分析。

表7 2011-2013年哈萨克斯坦各州人均工资 （单位：坚戈/月/人）

州级	2011		2012		2013	
	人均工资	增长率 (%)	人均工资	增长率 (%)	人均工资	增长率 (%)
阿克莫拉州	40 532	28.4	45 002	11.0	46 895	4.2
阿克托别州	44 929	15.9	52 847	17.6	57 954	9.7
阿拉木图州	35 003	28.3	40 243	15.0	45 312	12.6
阿特劳州	106 960	19.8	114 413	7.0	118 043	3.2
西哈萨克斯坦州	49 941	9.9	56 344	12.8	61 287	8.8
江布尔州	30 944	7.2	34 974	13.0	36 898	5.5
卡拉干达州	51 588	22.6	57 565	11.6	64 422	11.9
科斯塔奈州	39 604	26.1	44 832	13.2	49 097	9.5
克孜勒奥尔达州	40 451	11.8	45 163	11.6	48 256	6.8
曼格斯套州	73 188	16.1	82 203	12.3	90 005	9.5
南哈萨克斯坦州	27 972	15.6	33 152	18.5	35 461	7.0
巴甫洛达尔州	49 116	25.0	55 867	13.7	61 367	9.8
北哈萨克斯坦州	40 394	25.6	43 581	7.9	47 874	9.9
东哈萨克斯坦州	41 238	20.8	47 034	14.1	51 640	9.8

注：字体加粗的州为石油天然气丰裕的区域

资料来源：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раздел: зарплаты

哈萨克斯坦2000-2012年三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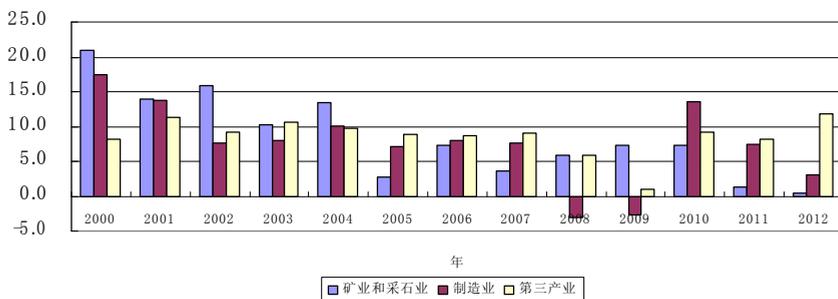


图8 哈萨克斯坦2000-2012年三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率

资料来源: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http://www.stat.gov.kz/>;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000-2013

从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角度来看, 哈萨克斯坦制造业部门并没有出现“绝对去工业化”(制造业部门负增长)的现象。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 制造业部门负增长仅出现在2008—2009年(详见图8)。然而, 哈萨克斯坦制造业部门“相对去工业化”的现象是存在的。2000年至2004年, 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均低于矿业的产出增长率。2005至2007年, 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低于服务业的产出增长率, 而服务业的实际产出增长率经常高于矿业和采石业, 这表明哈萨克斯坦的支出效应远远强于资源转移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矿业已经占到哈萨克斯坦GDP的20%和出口的79.8%, 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 但是由于矿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其就业人口的比重仅占总就业人口的2.5%左右。很明显, 该行业不可能过多地吸纳从农业、制造业等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因此这并不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从就业结构来看, 哈萨克斯坦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91年的12.5%下降到2000年的9.2%, 2011年又下降到了6.5%。制造业

占 GDP 的比重从 1991 年的 23.7% 左右，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16.5%，2011 年又下降到 11.4%。与此同时，2000 年以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不断提高，并且已经超过矿业和制造业的比重（详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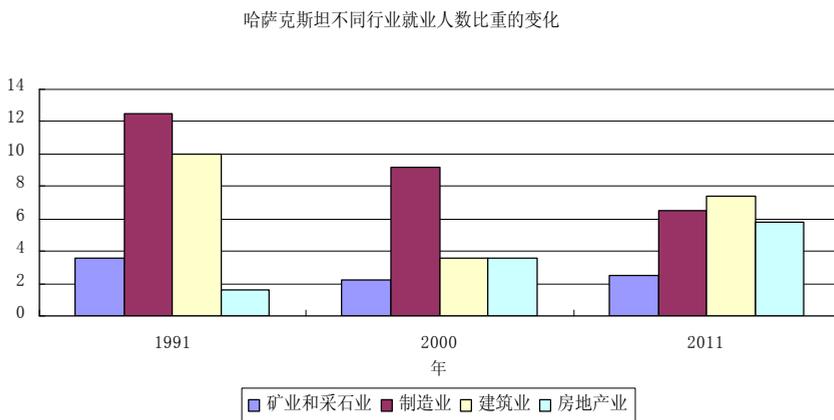


图 9 哈萨克斯坦不同行业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http://www.stat.gov.kz/>; Труд и занятость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0-2013

从劳动力雇佣情况来看，2009 年到 2010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采矿与石油部门劳动力雇佣率呈现出负增长趋势，同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劳动力雇佣率在上升。到 2011 年哈国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采矿业与石油业的雇佣率已恢复并且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年均增长率为 6—8% 左右，表明石油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高于制造业部门。同时 2011 年制造业部门雇佣率呈现出负增长趋势，到 2012 年呈正增长趋势，达到 0.23%，远低于服务业、采矿业与石油业的水平（见图 10）。

采矿石油部门和服务业的雇佣率不断增加，进一步证明哈萨克斯坦已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转移效应，这也是“荷兰病”的特征，表明哈萨克斯坦正在面临倾向于能源行业的就业结构。

哈萨克斯坦三部门劳动力雇佣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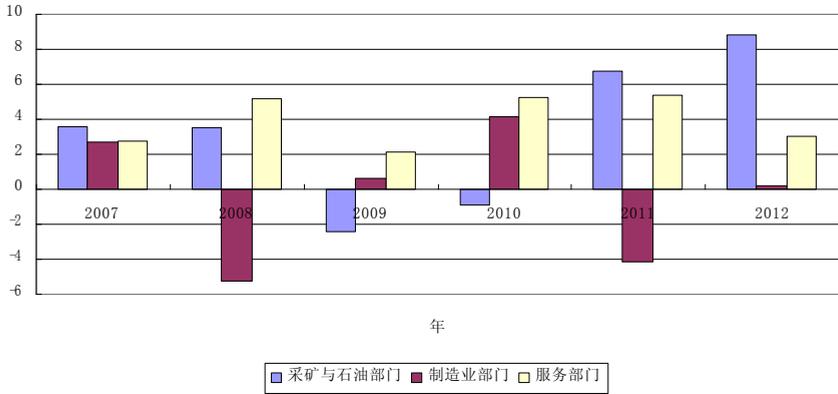


图 10 哈萨克斯坦三部门劳动力雇佣增长率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http://www.stat.gov.kz/>; Труд и занятость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00-2013

可见，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处于劳动力从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不断涌入服务业、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趋势。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哈萨克斯坦将会面临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局面。这主要因为制造业是提供和培养高技能和熟练劳动力的部门，只有这种劳动力才会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目前哈萨克斯坦已出现了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特点，表明哈萨克斯坦制造业部门“相对去工业化”的现象是存在的。

四、哈萨克斯坦摆脱资源依赖型经济的现行措施

(一) 借鉴挪威经验，哈萨克斯坦已建立共和国国家基金

世界上并非所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都经历过“荷兰病”，比如挪威和澳大利亚，就通过将大量的石油收入放到“石油基金”，确保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建立“石油基金”之后，虽然挪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石油天然气生产的增长率为 19% 左右，但是其制造业部门增长率一直维持在 30% 左右，远高于能源生产增长率。

表 8 2014 年主要能源出口国世界主权财富基金排名

国家	国家 基金名称	资金额 (十亿美元)	成立 日期	林纳堡—迈达艾 尔透明度指数
挪威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 Global	893	1990	10
沙特阿拉伯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773	1976	5
中东	SAMA Foreign Holdings	737.6	---	4
科威特	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	410	1953	6
卡塔尔	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	170	2005	5
俄罗斯	National Welfare Fund	88	2008	5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National Fund	77	2000	2
阿塞拜疆	State Oil Fund	36.6	1999	10

资料来源：SWFI, <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

2000 年，哈萨克斯坦借鉴挪威等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哈萨克斯坦国民基金”（Kazakhstan National Fund），并赋予其“储备和稳定财政”的功能，主要用于国家预算的平衡与转移支付、偿还外债、项目投资、为子孙后代储蓄发展资本等。国家确定了一个“地下资源使用者”名单，规定了他们应向中央政府支付的资源使用税等应交款项全部纳入国民基金管理。需要强调的是，该基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确保哈国经济正常运行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根据（SWFI）在 2014 年公布的世界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林纳堡—迈达艾尔透明度指数，2013 年哈萨克斯坦的国民基金透明指数为 2（与 2012 年相比下降了 3 个单位），表示该国基金透明度正在下降（详见表 8）。^①

① 林纳堡—迈达艾尔透明度指数（Linaburg-Maduell transparency index）是 10 分制的评价体系，其中 10 分表示透明度最高，1 分表示完全不透明。

（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目前哈萨克斯坦以能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系遭遇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以原料为主导、生产设施落后、科技与生产脱节等问题，很难通过能源收入带动前苏联保留下来的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业。因此，为了克服这个局限性，哈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具体包括：

1、“工业化路线图”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在2018年前，通过使在2010年—2014年实施的哈国工业化路线图框架内投产的企业达到设计能力，实现机械制造业生产的增长。与此同时，提高工业各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将使得现有或重新投产的生产能力的使用效率得到提升。该计划覆盖哈萨克斯坦整个国土面积，具体包括101个项目。

2、“商业路线图”计划。该计划是为了保障非能源领域的区域性中小企业稳定平衡发展，并维持现有的和新创造的就业岗位。

3、“生产力2020”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化重组，自2011年开始实施以来，已经有12个行业的200多家代表性企业参与，并且有27个项目获得了总金额达400亿坚戈（2.7亿美元）的国家资金支持。

4、“2010-2014年加速产业创新发展国家”计划。该计划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综合经济竞争力，建立科技创新发展、行业和区域创新发展管理体系，为发展高工艺水平的中小企业、提高国家的科学管理潜力和发展相关基础设施而成立的。具体包括两大政策：

（1）新能源的发展。2013年5月30日第577号总统令，批准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转向绿色经济》的构想，确定了转向绿色经济的基本原则、方式和政策措施，具体包括：有效管理水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节能和提高能效，发展电力，循环利用废弃物，降低空气污染水平，保护和有效管理生态系统。^①

根据已制定的哈萨克斯坦再生能源分布图可知，目前具有发展风能潜力的区域，包括史烈克走廊、准噶尔大门、他因替、卡尔嘎立、夜里门套山、阿尔卡里克山、卡拉波坦区、舍夫陈阔堡垒、廓尔达和蛛丝姆尼迪克等区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 концепции по переходу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к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30.05.2013. www.online.zakon.kz/Document/?doc_id=31399596

域。^① 水能潜力可以在恩斯克河、巴斯看河、阔凯斯河、舍列克河、列普斯河和克列斯河等流域发挥。^② 太阳能发展空间主要分布在阿拉木图州和其他的南部地区。^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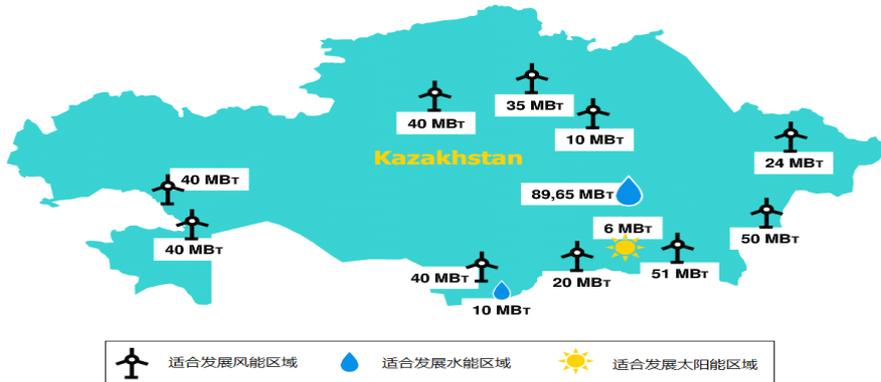


图11 哈萨克斯坦再生资源（太阳能、风能、水能）分布图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о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и развитию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 经济特区的建设。根据 2011 年 7 月 21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的《哈萨克斯坦经济特区法》，目前在哈国境内已设立了 9 个经济特区。^④ 第一个是设立于 2001 年、位于阿斯塔纳市的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Astana New City）。该特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吸引大量的外资，建立现代基础设施，进而带动产业和研发。第二个是设立于 2002 年、位于阿克套的阿克套海港经济特区（Sea port Aktau），设立的目的在于使本区域通过港口经济的发展，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欧亚重要的运输走廊。第三个是设立于 2003 年、位于阿拉木图市的信息技术园经济

① Эрик Лундтанг Петерсен. Ве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Джунгарских ворот и Шелекск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Дат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лаборатория: Riso, 2013.

②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Зелёный Мост». Гидроэнергетик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8.07.2013. www.gbpp.org/gidroenergetika/

③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Зелёный Мост». Солнеч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12.04.2013. www.gbpp.org/solnechnaya-energetika/

④ Закон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О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ах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захстан. 21.07.2011. www.online.zakon.kz/Document/?doc_id=31038117

特区 (IT Park)，目的是提高当地的创新和研发水平，从而达到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目标。第四个是设立于 2005 年、位于南哈州的奥恩图斯季克经济特区 (Ontustik)，设立的目标是保证哈国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良好发展势头。第五个是设立于 2008 年、位于阿克莫拉州的布拉巴伊经济特区 (Burabay)，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大力发展国内和国际旅游业，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第六个是设立于 2007 年、位于阿特劳州的国家工业石化技术园经济特区 (Petrochemical Park)，目的在于使用创新技术，发展以碳氢化合物为原料的石化生产深加工，从而达到在当地进行能源加工的目标。第七个是设立于 2011 年、位于阿拉木图州的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 (Horgos)，主要目标是建立开放的、现代物流和工业中心，促进与邻国的贸易往来。第八个是设立于 2011 年、位于巴甫洛达尔州的巴甫洛达尔经济特区 (Pavlodar SEZ)，其目标在于大力发展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第九个是设立于 2011 年、位于卡拉干达州的萨雷阿尔卡经济特区 (Saryarka)，其目标在于大力发展冶金工业，使金属加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产并出口高质量的、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重工业产品。



图12 哈萨克斯坦设立的经济特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о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и развитию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进行的研究表明,目前哈萨克斯坦经济已存在一定程度的“荷兰病”现象,主要表现为:

1、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对哈萨克斯坦货币的升(贬)值造成较大的影响,表明哈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有很大的关联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这显然会阻碍哈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非能源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严重不足,其投资额远远低于能源行业。

3、石油与其相关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每年都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和采矿等部门。此外,传统能源和资源丰裕地区的人均工资水平高于以重工业、制造业或服务为主的区域。

4、由“荷兰病”导致的资源转移效应使得哈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造业及其他非能源领域处于欠发达状态。尽管采掘业实际产出增长率经常低于服务业,但远远高于制造业。制造业增长率一直处于最低,而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部门。这表明哈萨克斯坦的支出效应强于资源转移效应,经济正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

5、在农业就业比重有较大下降的同时,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就业比重也在下降,采掘业(主要是能源矿产)、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表明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正从制造业等部门向能源矿产等部门转移。制造业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制造业地位的下降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由于能源矿产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也不利于就业。

当前,哈萨克斯坦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将来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哈萨克斯坦非能源经济部门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逐步摆脱对能源经济的依赖。这将有助于哈国经济消除一部分由“荷兰病”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Dutch disease” proposed by Corden and Neary, in addition to related research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de-industrialization” exists in non-energy industry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respectively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whether global oil price fluctuations direct influence Kazakhstan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wheth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more inclined to the energy sector, and whether wages increase in energy sector.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signs of “Dutch disease” has already existed in Kazakhsta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analyzes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Kazakhstan government’s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fund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ition.

【Key Words】 Kazakhstan, Dutch Disease, De-industria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редложенной Корденом и Нер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ью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и» 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 эт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анализирует: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прям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колебания мировых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на обменный курс валют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клонны ли прямые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к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у сектору; 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эффект повышения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секторе — оказывают ли данные три аспекта влияние н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явления «де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в отрасля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других не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отрасл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ход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наружено, чт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уже есть симптомы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и». Проводится также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ки и мер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азахстана, таких как,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он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и т.д.,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голландской болезн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азахстан, голланд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де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张昕)

基于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的 俄罗斯人口变化通道

顾乐民*

【内容提要】用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可以构建一条俄罗斯人口变化的通道。基于该原理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俄罗斯的人口发展经历过3个拐点、2个极值点的曲折变化；(2)人口变化率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3)前苏联解体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率是下降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双降”效应，致使俄罗斯发生了人口危机；(4)俄政府的新人口政策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重要条件，在人口变化率呈上升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双升”效应，使得俄罗斯有了初见成效的人口恢复性增长；(5)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暂时脱离了下降的通道，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并将延续到2020年；(6)如果能经受住2016年出现的拐点的考验，使2020年的高点不成为“峰”值点，那么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迎来可持续增长的一轮新局面；反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将重返下降的通道之中，并形成新一轮的人口危机。

【关键词】俄罗斯 人口变化 切比雪夫 极小极大 预测

【中图分类号】D751.2;C924.3/.7**【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5)02-0178(15)

* 顾乐民，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

引言

俄罗斯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数据表明，1992年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基本是处于下降的通道之中。影响人口下降的因素有很多，如出生率偏低、死亡率偏高、人口老龄化因素^①；卫国战争、生育观念、生活习惯等造成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因素^②；地广人稀的地理抑制因素^③；苏联解体后社会的动荡因素^④；酗酒、离婚率的社会背景因素等等。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普遍认为俄罗斯未来的人口还将继续下降。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预测，21世纪上半叶，其人口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国民总数将处于1.32亿至1.38亿之间。据联合国人口组织推算，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的数量将减少到1.21亿。而著名网站“世界人口回顾”（world population review）给出的预测则更为悲观^⑤：2050年俄罗斯人口只有1.11亿，2070年将减至0.91亿，2100年将仅剩0.67亿。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俄罗斯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人口危机下的俄罗斯，未来人口会不会出现增长？俄政府历年来推行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其效果何时显现？处于下降通道中的俄罗斯人口近几年出现了微弱的人口增长，是否释放出一种“绝地逢生”的信号？处于十字路口的人口通道，未来是掉头向上，还是继续向下？

人口数据是离散的，孤立的，数据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数据的来源是有一定统计误差的。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人口数据背后，仿佛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数据的变化，有人称这只无形的手为“隐函数”。或许这只无形的手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人口发展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人类因素”；或

① 彭文进、张晓青、卢华：“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2年第6期。

② 卢茂辉：“俄罗斯第四次人口危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③ 韩全会、张军华：“俄罗斯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分析”，《西北人口》，2013年第1期。

④ 石人炳：“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影响——以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⑤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 <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russia-population/>

许存在，但目前难以找到，不过这不影响探讨的本质。任何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物，都存在其本质的内在规律，都存在影响数据变化的外部条件，都可以从曾经走过的“道路”中找到。这就给出了一个启示，是否可以构建一条“人口通道”，从中找到某些答案？

切比雪夫(P.L.Chebyshev, 1821-1894)，俄罗斯著名的数学家，他所创立的“最佳一致逼近原理”，最早源于十九世纪机器的机械运动按理想设计运动的研究。将该原理运用于当今俄罗斯人口变化，就可以构建一条切比雪夫最佳逼近意义下的人口通道：

(1)切比雪夫最佳逼近的核心是最大绝对值误差的极小化，在回归分析的xy平面图上，将切比雪夫最佳逼近所获得的曲线作为中心线，最大正误差点的连线作为上界线，最大负误差点的连线作为下界限，就构成了一条有一定宽度的，容纳了所有人口变化数据的通道，简称为“人口通道”；

(2)通道的中心线称为人口函数，是得到所有数据支持的，是所有数据依据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准则产生的；产生出的人口函数反过来又成为控制数据、指导通道前行方向的理论路线；

(3)数据产生了曲线，也服从曲线，是沿着曲线给出的方向，在偏离和纠正偏离中前行的；数据与曲线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同存于通道之中。

由于数据还存在统计学上的随机误差，所以找到的是一个近似的隐函数，即“人口函数”，通过这个人口函数就可以找出数据所反映的某些规律，或近似规律。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使人口通道的建立有了理论上的依据。

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创立至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如何在最佳逼近原理基础上建立并实现回归算法，特别是对于非线性回归的算法，是个难题。这是一个困扰数理界长达100多年的未解的难题，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对最佳逼近原理的各种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以该原理为基础的极小极大逼近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极小极大逼近解的实现问题有了大的突破，它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得以实现^①，这使得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在数据处理的回归分析中得以实现，并迅速得到应用，成为继最小二乘法之后又一个新的方法。这

① 顾乐民：“最小二乘法”，《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2013年第1期。

使得用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建立的人口通道, 不仅有了理论依据, 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零误差型切比雪夫最佳逼近”^①是切比雪夫最佳逼近的一个推广, 是设定端点数据为零误差数据条件下的极小极大逼近, 从而使未来预测的基点建立在 0 的基础上。它克服了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方法不适宜用于预测的局限, 这从切比雪夫多项式的基础理论中可以看出, 切比雪夫多项式在端点处的误差都是最大的, 在端点之外是发散的, 这与预测需要得到最小误差的结果是矛盾的^②。

指数多项式是指数意义下的多项式^③, 本文将用一个八次指数多项式作为通道中的人口函数, 这使得通道不仅误差很小, 而且由于指数多项式的 $n+1$ 阶导数不为零, 克服了多项式模型中 $n+1$ 阶导数为零的缺陷, 更符合客观实际。对于人口变化而言, 只要人口在变化, 人口变化率或高阶变化率都不会是 0, 因为 0 意味着变化的停止。

本文采用曲线拟合分析的方法, 配以图表的直观方式, 论述半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口变化的过去和现在, 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数据处理

表 1 是 1960-2013 年俄罗斯人口变化的数据, 其中第 1, 4 列 i 是序号, 共 54 个; 第 2, 5 列 x_i 为年份; y_i 是实际人口数(万人)为母系列, $i=1,2,\dots,m$, $m=54$ 。其中 1960-1996 年的数据来自百度文库^④, 1997-2011 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⑤, 2012-2013 年的数据来自俄罗斯国家统计局^⑥。

① Lemin Gu, “Zero-Error Type of Chebyshev Polynom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Vol3, March 2013, pp.272-277.

② 顾乐民: “预测型切比雪夫多项式”,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2 年第 7 期。

③ 朱洪: 《指数多项式曲线的理论及应用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硕士论文, 2012。

④ 百度文库, 世界概况-各国历年人口数,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PIQimDlnVCMSN4bPtr6cD95ITK66XHhyschKIXmUvGnQEEhNVfwDa6U0DA1SKPu0kGR8HpI8YWiNZv_QZ1Px0JnK6RhBrZ4nOAm7ezKqNuy

⑤ 国家统计局, 国际数据-人口-俄罗斯联邦, <http://data.stats.gov.cn/>

⑥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main/

表 1 1960-2013 年俄罗斯人口变化数据及数据处理

序 i	实际值		拟合值		序 i	实际值		拟合值	
	x_i (年)	y_i (万)	$f(x_i)$ (万)	r_i (万)		x_i (年)	y_i (万)	$f(x_i)$ (万)	r_i (万)
1	1960	11989.7	11946.6	43.1	28	1987	14590.8	14595.8	-5.0
2	1961	12123.6	12136.2	-12.6	29	1988	14685.7	14671.0	14.7
3	1962	12259.1	12299.6	-40.5	30	1989	14772.1	14734.8	37.3
4	1963	12396.0	12439.1	-43.1	31	1990	14829.2	14786.1	43.1
5	1964	12534.5	12557.7	-23.2	32	1991	14862.4	14824.1	38.3
6	1965	12674.5	12658.8	15.7	33	1992	14868.9	14848.3	20.9
7	1966	12746.9	12745.9	1.0	34	1993	14852.0	14858.7	-6.7
8	1967	12819.6	12822.4	-2.8	35	1994	14833.6	14855.5	-21.9
9	1968	12892.8	12891.6	1.2	36	1995	14814.1	14839.6	-25.5
10	1969	12966.4	12956.7	9.7	37	1996	14773.9	14811.8	-37.9
11	1970	13040.4	13020.3	20.1	38	1997	14730.4	14773.5	-43.1
12	1971	13115.5	13084.9	30.6	39	1998	14689.9	14726.4	-36.5
13	1972	13190.9	13152.2	38.7	40	1999	14630.9	14672.3	-41.4
14	1973	13266.9	13223.8	43.1	41	2000	14630.3	14613.4	16.9
15	1974	13343.2	13300.7	42.5	42	2001	14595.0	14551.9	43.1
16	1975	13420.0	13383.6	36.4	43	2002	14530.0	14490.0	40.0
17	1976	13514.7	13472.5	42.2	44	2003	14459.9	14430.1	29.8
18	1977	13610.0	13567.4	42.6	45	2004	14385.0	14374.4	10.6
19	1978	13706.0	13667.6	38.4	46	2005	14315.0	14325.0	-10.0
20	1979	13802.7	13772.4	30.3	47	2006	14250.0	14284.0	-34.0
21	1980	13901.0	13880.5	20.5	48	2007	14210.0	14253.1	-43.1
22	1981	13994.1	13990.5	3.6	49	2008	14195.0	14233.7	-38.7
23	1982	14082.3	14100.9	-18.6	50	2009	14191.0	14226.8	-35.8
24	1983	14166.8	14209.9	-43.1	51	2010	14238.9	14233.2	5.7
25	1984	14274.5	14315.7	-41.2	52	2011	14296.0	14252.9	43.1
26	1985	14385.8	14416.5	-30.7	53	2012	14300.0	14285.5	14.5
27	1986	14489.4	14510.4	-21.0	54	2013	14330.0	14330.0	0.0

基于零误差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下的八次指数多项式的准则是:

$$\begin{cases} y_m - f(x_m) = y_m - \prod_{j=0}^8 e^{a_j x_m^j} = 0 \\ \max_{1 \leq i \leq m} |r_i| = \max_{1 \leq i \leq m} |y_i - f(x_i)| = \max_{1 \leq i \leq m} \left| y_i - \prod_{j=0}^8 e^{a_j x_i^j} \right| \rightarrow \min \end{cases} \quad (1)$$

因极小极大逼近解的实现是一个十分繁复的计算,文中略去所有的计算过程,只给出计算的结果。在该准则下获得的八次指数多项式方程为:

$$\begin{aligned} f(x_i) = & e^{9.3698212} \cdot e^{1.97647624 \times 10^{-2}(x_i-1959)} \cdot e^{-1.4152365 \times 10^{-3}(x_i-1959)^2} \\ & \cdot e^{2.706375 \times 10^{-5}(x_i-1959)^3} \cdot e^{3.1635926 \times 10^{-6}(x_i-1959)^4} \cdot e^{-1.904765 \times 10^{-7}(x_i-1959)^5} \\ & \cdot e^{4.1602523 \times 10^{-9}(x_i-1959)^6} \cdot e^{-4.042794 \times 10^{-11}(x_i-1959)^7} \cdot e^{1.457097 \times 10^{-13}(x_i-1959)^8} \end{aligned} \quad (2)$$

对数据处理的结果见表 2 第 3 列和第 5 列,其中 $f(x_i)$ 为拟合值, r_i 为误差(万人)。位于 $i=1,4,14,24,31,38,42,48,52$ 的 9 个点是 e 点,也称为切比雪夫交错点,其中 5 个为正误差点,相应的年份是 1960,1973,1990,2001,2011 年;4 个为负误差点,相应的年份是 1963,1983,1997,2007 年,在这些点上获得的极小化最大绝对值误差值为 $E^* = 43.1$ 万,见表中黑体所示。位于 $i=54$ 的点为零误差点。数据处理结果表明,最大绝对值误差为 $E^* = 43.1$ 万,最大相对误差为 0.36%,曲线拟合误差,即平均绝对百分误差 $Mape$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 \left(\sum_{i=1}^m |r_i / y_i| \right) / m \times 100\% = 0.20\%$,都是很小的。

二、曲线拟合

图 1 是表 1 数据及数据处理结果的曲线形式转化,图中横坐标为年份,纵坐标是人口数(万人)。图中曲线 1 是俄罗斯人口函数曲线,是式(2)在去掉下标“i”后的函数表达式,定义区间为[1960, 2013]:

$$\begin{aligned} f(x) = & e^{9.3698212} \cdot e^{1.97647624 \times 10^{-2}(x-1959)} \cdot e^{-1.4152365 \times 10^{-3}(x-1959)^2} \\ & \cdot e^{2.706375 \times 10^{-5}(x-1959)^3} \cdot e^{3.1635926 \times 10^{-6}(x-1959)^4} \cdot e^{-1.904765 \times 10^{-7}(x-1959)^5} \\ & \cdot e^{4.1602523 \times 10^{-9}(x-1959)^6} \cdot e^{-4.042794 \times 10^{-11}(x-1959)^7} \cdot e^{1.457097 \times 10^{-13}(x-1959)^8} \end{aligned} \quad (3)$$

以曲线 1 为中心线,最大正负误差 ± 43.1 为宽,形成了曲线 2 和 3(虚

线)，这3条曲线构成了一条俄罗斯人口通道，用符号“channel(x)”表示：

$$channel(x) = f(x) \pm 43.1 \quad (4)$$

曲线4是俄罗斯人口变化率曲线，即 $f(x)$ 的1阶导函数 $f'(x)$ 曲线

$$f'(x) = f(x) \cdot \begin{bmatrix} 1.976 \times 10^{-2} - 2.83 \times 10^{-3}(x-1959) + 8.119 \times 10^{-5}(x-1959)^2 \\ + 1.265 \times 10^{-5}(x-1959)^3 - 9.524 \times 10^{-7}(x-1959)^4 + 2.496 \times 10^{-8}(x-1959)^5 \\ - 2.83 \times 10^{-10}(x-1959)^6 + 1.166 \times 10^{-12}(x-1959)^7 \end{bmatrix} \quad (5)$$

式(4)和式(5)中的 $f(x)$ 由式(3)给出。因只涉及定性说明问题，略去了曲线4的纵坐标数值标定。

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4是一条有2个极小值,1个极大值的波浪形曲线。计算知,2个最小值分别在 $x=1969.6$ 和 $x=2001.1$ 处出现,简记为1970年和2001年出现;1个最大值在 $x=1981.2$ 简记为1981年出现;此外还有2个点, $x=1993.4$ 和 $x=2009.0$, 简记为1993年和2009年(下文均用简记年份)。

图1曲线说明了人口变化依次在1970年出现了第1个拐点;1981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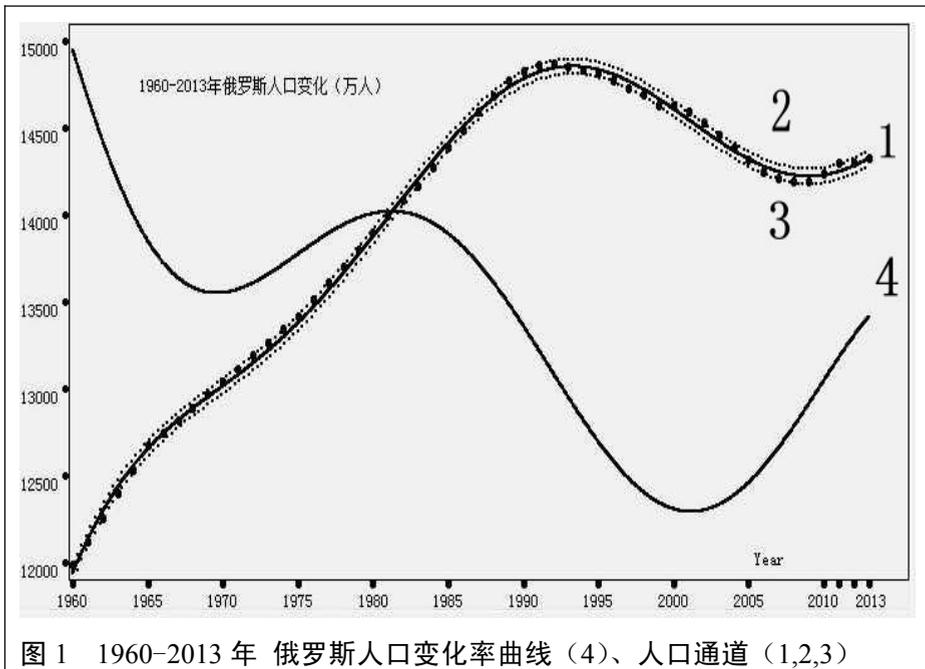


图1 1960-2013年俄罗斯人口变化率曲线(4)、人口通道(1,2,3)

现第 2 个拐点；1993 年出现了极大值点；2001 年出现了第 3 个拐点；2009 年出现了极小值点。在这些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展开如下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以拐点区分，俄罗斯人口变化分为 4 个阶段

拐点是 1 阶导数的极值点，以拐点区分可分为 4 个阶段。

（1）1960-1970 年俄罗斯人口是增加的，但变化率却是下降的，是逐渐减慢中的人口增长；

（2）1970-1981 年俄罗斯人口是增加的，变化率也是上升的，人口是逐步加快中的增长。变化率上升伴随人口增加的效应称为“双升”效应，双升效应是人口增长的机遇期；

（3）1981-2001 年俄罗斯人口变化率是下降的，这种连续 20 年减慢的趋势在目前人口变化史上实属少见，并带来严重的后果，1993 年的人口出现“峰”值，是下跌的标志。变化率下降伴随人口减少的效应称为“双降”效应，是人口减少的危机期。

（4）2001-2013 年俄罗斯人口变化率是上升的，这种上升有效制止了人口继续的减少，2009 年人口的“谷”是人口上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之后人口出现了恢复性的缓慢增长。

（二）人口变化率是影响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

人口变化的背后是人口变化的速率，简称变化率；变化率的背后是高阶变化率，存在无穷阶，高阶和低阶之间相互影响而不可能中断，从而构成变化链体系；无论是低阶还是高阶变化率，可以瞬间为 0 而不可能一直为 0，因为 0 意味着变化的停止；高阶和低阶变化率之间有时是同步的（同时递增或同时递减），有时是不同步的（一个递增，另一个递减）；人口增长伴随变化率的增长称为“双升”，再伴随 2 阶变化率的同步增长称为“三升”，人口下降伴随变化率的下降称为“双降”，同理也存在“三降”，一般而言，对变化率的分析进行到 2 阶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步现象中的双生效应促使人

口的增长，双降效应减缓了人口的增长甚至会使人口的减少；非同步现象形成了各阶变化率之间的矛盾，产生波动，构成交替，形成动力，推动了人口数量的变化，是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变化率对人口数量的影响有多种形式，主要有以下3种。为简化论述，只讨论增长；同理，可以推论下降。

(1) 同步效应影响下的人口增长。近百多年来，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一些新兴的人口大国不断出现，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特征，是人口增长伴随变化率增长的双升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口变化率控制得非常好，所谓非常好是指变化率曲线不存在极值，这使得人口的增长不存在拐点，人口的稳步递增是这种变化的特征。例如美国220年（1790—2010），日本百年（1872—2000）的人口增长就属于此类增长。对于这种增长将需要研究它的2阶或以上变化率状况，才能得出有价值的信息。

(2) 拐点效应影响下的人口增长。当变化率曲线出现“峰”或“谷”，在人口变化曲线上就形成了拐点。拐点的形成将人口的增长分为逐步加快的增长与逐步减慢的增长两种状况。人口的增长是在积蓄增长动力和释放增长动力的交替中，以加速或减速方式进行的。中国64年（1949—2013）的人口增长就属于这类增长。一般而言，增长过程中无极值出现，仅通过拐点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健康的增长。

(4) 极值效应影响下的人口增长。当变化率出现0时，意味着变化率是产生了由正到负（或由负到正）的过渡，在人口变化曲线必然形成了“峰”或“谷”的波浪状，人口将由增加变为减少。由于存在惯性和滞后效应，人口的减少将延续几十年，甚至有可能形成人口危机。当极值一旦形成，“双降”效应是其主要特征，具有大的下降力度，伴随“峰”的出现，向下寻找新的平衡。同样，当加速的力度很大，会形成“双升”效应，具有较大的上升力度，伴随“谷”的出现，使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人口变化过程中的极值现象应尽量避免，因为这将引起社会动荡，国力衰退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三）人口变化周期

变化率的极小值与极大值之间、极大值与极大值之间的时间跨度的变化周期，呈现一定的规律。对各国人口数据的计算和分析得知，这个周期的上

限为 20 年，下限为 28 年，在这范围之内的波动属于正常或比较正常，小于或超过这个范围都属于不正常，必定有特殊年代的特例之因。这个周期可能与人类生育年龄有关，所以称之为“人口变化周期”，是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具有不可抗拒性。在和平、无动荡时期是严格遵循的。这个周期可以被破坏，但必定存在某些破坏的外部因素。如战争、动乱、瘟疫、灾害等。

一些新兴的人口国家，由于没有产生过，或经历过拐点，极值点，所以不遵守这个周期。“人口变化周期”将人口变化的原因作了分离，分离出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主要的，但外部条件在某些时候可以起到大的制约或促进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会出现反常现象。就如农作物的生长，种子是主要的，但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甚至会产生绝收。用“人口变化周期”可以解释人口变化过程中出现“峰”和“谷”的主要原因。

（四）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人口变化率持续下降的内因，加上前苏联解体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动荡的外因

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其内在原因是人口变化率的持续下降，下降过程中又恰逢前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与动荡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所带来的伤害。从图 1 曲线 4 看，1970 年的极小值到 2001 年的极小值之间，周期为 31 年，超过了“人口变化周期”界限，使拐点演变成了极值点，一发不可收拾地继续下滑，造成了人口危机。人口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也涉及到人口迁移变动、人口素质、人口质量、以及恶性循环导致的其他一系列问题。

正如普京所说，这一时期是“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①。“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苏联的解体，是 20 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②。

① 弗拉基米尔·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30 日。

② 王小石：“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新商务周刊》，2013 年，第 17 期，第 79-81 页。

（五）俄罗斯即将走出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变化率上升的内因，加上俄政府一系列新人口政策成效的外因

面对人口危机，俄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变人口状况。比如普京 2007 年签署命令，批准了 2025 年前俄罗斯人口政策，要求政府达到以下两个目标：到 2015 年，要使俄罗斯的人口数量稳定在 1.42 亿~1.43 亿人的水平；到 2025 年时，要使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增加到 1.45 亿人。俄罗斯人口政策还要求采取措施降低死亡率和提高出生率，这包括提高孕妇和新生儿的福利待遇等。在这之前，俄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为鼓励多生的人口政策，同时还有降低死亡率、吸收外来移民、提高养老待遇等方面的措施。

“人口变化周期”的内在因素，加上俄政府采取的各项有力的人口政策的外因，是俄罗斯即将走出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由图 1 的曲线 4 知，2001 年人口变化率由下降转变为上升，是俄人口变化的一个拐点，遏制了“双降”势态。虽然之后人口依旧在减少，但下降的动力逐渐减弱。2009 年人口变化的“谷”点，是人口上升的一个重要转折，意味着将进入人口增长伴随变化率增长的“双升”阶段，无疑，这是一个人口恢复性增长的机遇期。

四、预测

（一）预测的条件

把基于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原理建立的人口通道用于预测，需要建立预测的条件：端点数据的误差是零误差，即 $r_m = y_m - f(x_m, \theta) = 0$ ；假设未来不存在大的随机误差；短期预测的范围是最接近零误差的未知数据 (x_{m+1}, y_{m+1}) ，预测的结果是有保障的，其误差不大于极小化的最大绝对值误差 E^* ；中短期预测可以继续延伸，只要预测的误差不大于 E^* 都是有效的预测结果。一旦出现预测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大于 E^* ，则需要重新计算。

（二）俄罗斯未来人口（2014-2019 年）可能的变化

基于切比雪夫极小极大原理的数据处理结果，获得的极小化最大绝对值误差值是 $E^* = 43.1$ 万。分别将 $x=2014, 2015, \dots, 2019$ 代入式（4），考虑到误差，将得到的结果列于表 2。

(三) 在 2016 年左右将出现一个新拐点，这是一个关键点

计算表明，图 1 曲线 4 将在 2015.6，相当于 2016 年，出现一个极大值点，它与 1981 年出现的极大值点之间隔了整整 36 年，而两个极小值点之间是 31 年，这使得“人口变化周期”被拉长至 31-36 年，是少见的不正常的周期。该极值点也是人口变化的拐点，也就是说，2016 年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将进入减速的增长阶段，拐点形成是“人口变化周期”所决定的，是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提前或延后，但不可能消失。

不排除受该拐点的影响，俄罗斯人口的变化又将出现一个新的极大值点。这使得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危机，所以说，这个拐点是一个是否会形成极大值点的关键点。

如果这个拐点之后形成了一个极大值点，那么 2020 年以后将是人口的连续下降，一些权威机构给出的人口预测，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如果这个拐点之后没有形成极大值点，则说明了俄政府之前采取的一系列人口增长政策是初见成效的，俄罗斯的人口将在减速中继续增长，时间约为 10 年并迎接再下一个拐点的出现，所以这个拐点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点。

表 2 俄罗斯未来（2014-2019 年）人口变化可能的趋势

序	年	人口（亿）	序	年	人口（亿）
1	2014	1.438±0.01	4	2017	1.458±0.03
2	2015	1.445±0.02	5	2018	1.464±0.03
3	2016	1.451±0.02	6	2019	1.468±0.04

结 论

切比雪夫极小极大原理的核心是最大绝对值误差的极小化，在设定端点数据 (x_m, y_m) 为零误差数据条件下构成了零误差型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俄罗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口变化，可以用一个八次指数多项式来描述。将二者结合起来，用零误差型切比雪夫极小极大逼近对八次指数多项式进行拟合，可以产生 5 个等值的最大正误差点，4 个等值的最大负误差点，1 个零

误差点。将最大正误差的连线作为上界线，最大负误差的连线作为下界线，就可以构建一条有一定宽度的、连续光滑的、涵盖了全部数据的俄罗斯人口通道，并获得最大绝对值误差不大于 43.1 万、最大相对误差不大于 0.36%、曲线拟合误差 $\text{Mape}=0.2\%$ 的最佳逼近的结果。在这基础上，通过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可以给出如下结论：

(1) 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是人口变化率，是一个反常的变化。

俄罗斯的人口变化率是一条曾出现过 1 个“峰”和 2 个“谷”的交替波浪状的变化曲线；峰和峰、谷和谷之间的相隔时间约为 31-36 年，违背了“人口变化周期”固有的 20-28 年的内在规律，是一种反常的周期律。

(2) 前苏联的解体，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外部条件，在内在因素作用下，促使形成了“双降”效应，使俄罗斯发生了人口危机。

当俄罗斯的人口变化率处于下降阶段时，又发生了前苏联的解体，在巨大的冲击和震荡下，形成了“双降”效应，只能向下寻找新的平衡，是人口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1993 年的人口“峰”值是人口危机的标志。

(3) 俄政府的新人口政策，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在内在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双升”效应，使俄罗斯有了初见成效的增长。

受“人口变化周期”影响，俄罗斯人口在 2001 年出现了拐点，使人口变化率出现了上升；俄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人口新政策，其核心是多生，外部条件在内在因素促使下产生了新的效应，制止了人口的下降。2009 年的人口“谷”点是人口危机结束的一个重要标志。

“双升”效应是俄罗斯初见成效的人口恢复性增长的机遇期，预计 2014 年俄罗斯的人口将为 1.438 ± 0.01 亿，2015 年为 1.445 ± 0.02 亿，……，呈现缓慢递增趋势，并在 2020 年左右达到理论高点。

(4) 俄政府的新人口政策是否到位，将由时间来检验，至少需要一个或一个以上“人口变化周期”的检验才能知晓。

预计 2016 年将迎来走出低谷后的第 1 个拐点，俄罗斯人口发展将进入减慢的增长期，将面临一次重要考验，也是对新人口政策是否成功的检验；如果在这个拐点之后没有再形成新的“峰”点，表明俄罗斯的人口将进入稳定的增长期；如果在这个拐点之后再次形成新的“峰”点，表明俄罗斯的人

口没有摆脱下降的通道，一些权威机构给出的预测有可能成为现实。

任何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事物，都存在其本质的内在规律，也都存在受各种影响形成的外部条件，人口数据是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依据人口数据，构建了人口通道，构造了人口函数，通过变化率，将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作了分离，在阐述各自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再将其捏合在一起，以期较为准确地描述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原因，及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切比雪夫是著名的俄罗斯数学家，用切比雪夫最佳逼近理论来寻找当今俄罗斯人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继续沿着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大偏差极小化来保证人口发展按最小偏离的轨迹运行，是一定能走出困境、找到最佳的、符合俄罗斯基本国情的人口发展之路的。

【 Abstract 】 According to Chebyshev Approximation, a Russian demographic change passage could be constructed.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include: (1) For Russian demographic evolution, it has experienced three turning points and two extreme points. (2) The change rate of population is an internal factor affecting Russian demographic changes. (3)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n external condition for demographic changes in Russian popu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ate of population change is on decline. Influenced by these two factors, a population crisis occurred in Russia. (4)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new popula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Russian demographic changes,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rate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accordingly Russian population gradually increased. (5) Russian population temporarily stopped decreasing and a slow upward trend will continue till 2020. (6)If it withstands the challenge of turning point in 2016 and the high-point of 2020 does not become a "peak" point, Russian demographic change will usher in a new situation for sustainable growth; otherwise, Russian population will decrease again, forming a new round of demographic crisis.

【 Key Words 】 Russia, Demographic Changes, Chebyshev, Minimax,

Forecast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олинома наилучшего приближения Чебышёва можно выстроить пут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ого полинома пришли к следующим выводам: (1)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пережило три перегиба, и два поворотных изменения в крайних точках; (2) скорость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им фактором, влияющим н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3)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ился внешним условием, повлиявшим н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мпы изменения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снизились,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удвоенный» эффект,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му кризису в России; (4) нова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тала важным условием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внутренних факторов увеличения скорости роста населения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удвоенный» эффект и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л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й успех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роста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5)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ременно сошло с нисходящего пут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медленного роста, которая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до 2020 г.; (6) если Россия выдержит испытание точки перегиба в 2016 г., и высшая точка 2020 г. не станет «пиковой», т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ступят в новую стадию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оста;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пойдёт по пути снижения, и окажется на новом этапе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Чебышёв, минимум-максимум, прогноз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192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